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2卷

亲历记忆

主 编 潘 光

副主编 虞卫东 周国建 周晓霞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2卷

亲历记忆

Sources on Jewish Refugees in China Vol.II

Witness and Remembrance

主 编 潘 光
副主编 虞卫东 周国建 周晓霞



内容提要

本卷主要汇集了以下一些方面的亲历记忆资料：宋庆龄、何凤山等人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通过发签证救助犹太难民的文章和记录；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劳拉·马戈利斯、王替夫等人关于设法救助犹太难民的回忆；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关于自己暗中给犹太人通风报信而遭逮捕、迫害的回忆；M.W.贝克曼关于天津犹太难民的记述；犹太难民的中国邻居们的回忆；瑞娜·克拉斯诺、岗特·诺贝尔、汤亚汀关于美国飞机轰炸虹口，犹太难民中的左翼人士，犹太难民的音乐生活等方面的回忆和记述；N.A.帕尔阔维茨、伊萨多尔·马吉德关于战后犹太难民状况的回忆和记述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二卷，亲历记忆 / 潘光等主编. —5版.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13-16557-2

Ⅰ.①来… Ⅱ.①潘… Ⅲ.①犹太人—难民—史料—中国—现代 Ⅳ.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9272号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二卷）：亲历记忆

主　　编：潘　光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郑益慧
印　　制：上海春秋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2
字　　数：165千字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16557-2/K
定　　价：68.00元

谨以此书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1937.7.7）

淞沪会战爆发80周年（1937.8.13）

犹太难民来华避难80周年（1937-1939）

前　言

7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它们对每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的拒绝，等于是扼杀了一个生命。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大都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为救助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难民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也有少数人从其他城市进入中国，其总人数达到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等城市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中国、上海当作他们的“诺亚方舟”，其人数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当600万犹太人在欧洲被屠杀之时，来华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艰难岁月，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目前，仍然健在的前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代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强烈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公认为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所做出的一大“善举”和贡献，受到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我记得，20多年前，在

欧洲举行了许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活动，但只有一个活动直接与中国有关，那就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研讨会。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并作主题发言，见到了许多当年在上海避难的犹太老人。会后几天，奥地利议会决定设立基金，对纳粹暴政给犹太人造成的苦难给予赔偿。现在，每年都有奥地利"大屠杀纪念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来到我担任主任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

1994年，上海市和虹口区政府在战时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霍山公园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施奈尔拉比激动地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 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进入21世纪，上海正式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馆。不仅以色列总统和总理、各国犹太名流，而且其他领导人如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美国第一夫人等来上海时也来该馆访问。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也纷纷来到纪念馆"上课"。

现在，"上海"一词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和"避难地"的代名词。上海救助犹太难民和中犹人民互相支持的难忘历史成了学术研究、纪念活动、艺术创作的一个持续发展的热点，关于这个题材的论文、著作、小说、电影、戏剧、展览会不断涌现，因为这个题目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再次泛滥，有人公然出来否定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这就使来华犹太难民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越发突出。同时，这个题目因其特有的中犹友好内涵又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

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成果，还通过研讨会、展览会、系列讲座、媒体和影视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然而，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我们对该历史事件的基础研究还是十分欠缺的，特别是对许多还健在的犹太难民尚未进行采访，对一些第一手资料也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剖析。

2010年底，由我担任首席专家的“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使我们的研究质量和水平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提升。6年多来，我们以争分夺秒的精神采访仍然健在的前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前犹太难民的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及档案资料。经过对这些材料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我们课题研究的资料和理论基础，为推出质量更高的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5年，我们推出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使用的完全是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抵达上海和走进中国、在中国土地上闯荡和拼搏、在虹口“隔离区”度过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等难忘经历，以及离开中国后始终难以割舍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这一力作，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将已收集到的大量与来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报刊、记忆、人物、评析等各方面资料整理出版，为课题最终成果的完成作好准备。正当我们在2015年推出若干“犹太难民与上海”著作之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决定开始实施“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我们双方一拍即合，建立

了密切合作关系。这样，我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今后的一系列著作都将纳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之内。《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便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共分四卷：第一卷是文件报刊资料；第二卷是记忆资料，包括口述和文字记忆；第三卷是关于犹太难民中杰出人物的资料；第四卷是本课题组专家和其他国内外学者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和评析的汇集。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二卷）：亲历记忆》主要汇集了以下一些方面的资料：宋庆龄、何凤山等人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通过发签证救助犹太难民的文章和记录；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劳拉·马戈利斯、王替夫等人关于设法救助犹太难民的回忆；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关于自己暗中给犹太人通风报信而遭逮捕、迫害的回忆；M.W.贝克曼关于天津犹太难民的记述；犹太难民的中国邻居们的回忆；瑞娜·克拉斯诺、岗特·诺贝尔、汤亚汀关于美国飞机轰炸虹口，犹太难民中的左翼人士，犹太难民的音乐生活等方面的回忆和记述；N.A.帕尔阔维茨、伊萨多尔·马吉德关于战后犹太难民状况的回忆和记述等等。

需要指出，《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二卷）：亲历记忆》并不能包括与来华犹太难民有关的所有事件和人物的记忆资料。比如，关于犹太难民在哈尔滨等中国其他城市的情况，我们就缺乏第一手的亲历记忆资料，而有些犹太难民自己的回忆录涉及中国其他城市，但已经在去年出版的《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中刊发。不过，我们却在关于犹太难民中杰出人物的研究和专家学者的评析中找到了这方面的材料，因此它们将被编入《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的第

三、第四卷。还要指出，包括本卷在内的《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四卷只是发表了我们收集的资料中的一小部分，将来我们当然还要把其他所有资料奉献给读者，也许不是通过出书的形式，而是要建立一个资料库或数据库。为此，我们正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各级档案馆、上海市政协等相关单位进行商议和协调。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历史上那些难忘篇章仍然闪烁着诱人的光彩。包括我们课题组成员和交大出版社编辑在内的许许多多普通人长期以来辛勤工作，收集、整理、研究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记忆中的鲜活资料，就是要为后世保存重要的历史记忆，使子孙后代能记取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使世界更美好而奋斗。

但愿我们这本书以及我们的工作能够通过宣扬人类历史上友好互助、抗歪扶正的感人业绩，以及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真善美价值观，为努力构建一个和谐、包容、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潘　光

2016年9月4日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目　录

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抗议书

宋庆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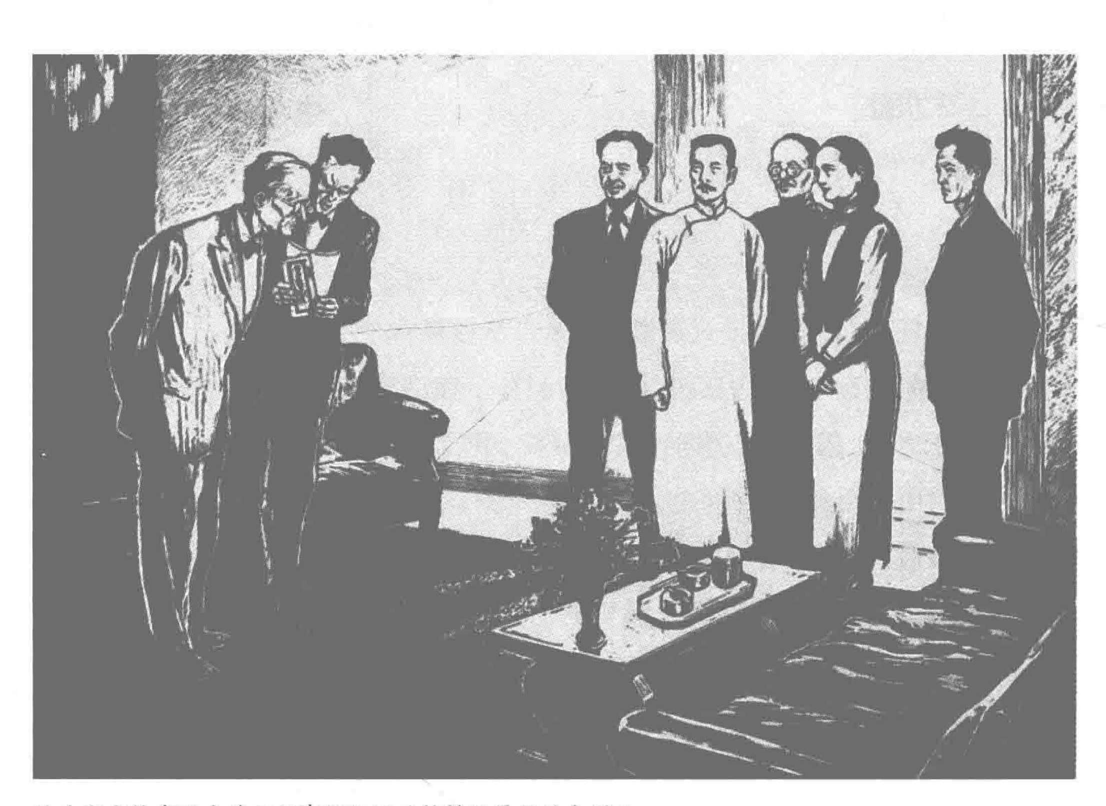
本同盟[2]由各国报章所载、得悉自法西斯政党得权以来、被捕之工人、已达三四万、而知识分子横遭压迫者、亦在数千之数、囚犯施以惨刑、或加虐杀、事后诬为自尽或谓逃亡时中弹殒命、林中河上、时常发现尸身、工人团体解散、产业没收、文人学者、以犹太种族关系或政见左倾、迭受种种侮辱、科学家如恩斯坦[3]、赫史非而 (Magous Hirschfield) 等被迫出国、有名作家、如任卢微 (Ludwig Reun) 、福史王葛 (Leon Feuchtwanger) , 及曼多马士 (Thomasmann) 等、或被迫离国、或横受侮辱。大美术家如利伯曼 (Max Liebermann) 、音乐家如华尔得 (Bruno Watter) 家遭捣毁、书稿被焚、中世纪窘迫科学家之黑暗行为、及二千年前焚书之祸、不图重见于今日、出版言论自由、全被剥夺、即谈美术文艺之杂志、如Weltbuchne亦被封禁、最右派之纽约泰晤士报[4]、(三月十五日、二十日、二十一日) 亦有以下报告、"维也纳报逐日披载共产党·社会党·进步党·及犹太议员记者、作家律师受惨刑之故事"、议员沙尔曼 (Sollmann) "打至昏倒、胸骨折断、复以火焚其足、醒后再打"、有名主笔"乌西爱斯基

1_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就纳粹的反犹暴行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代表团成员包括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中外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关于这次事件的原始记录已无法找到，因此我们选择了宋庆龄次日在《申报》上刊登的抗议文，相信该文基本表达了她在德国驻沪总领事馆表达的愤怒和抗议。

2_这里即指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是同盟领导人。

3_这里即指爱因斯坦。

4_即《纽约时报》。



反映宋庆龄率团去德国领事馆抗议纳粹排犹暴行的木刻画

(Ossietsky) 之齿被手枪打落”、“海恩慈波罗 (Heinz Pohl) 之小说稿、被撕毁后、复命其吞咽……在囚营中、囚犯被迫相殴、打至昏倒、其中竟有父子被迫相打者……柏林附近林中、每晨常发见死尸、上星期竟于一天发见二尸身……”以上事实、皆迭见欧美政党不同之各报、决非一方之辞、本同盟认为此种惨无人道之行为、不特蹂躏人权、且压迫无辜学者作家、不啻自摧残德国文化、兹为人道起见、为社会文化之进步起见、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

(引自《申报》,上海,1933年5月14日,第10版。原文为中文繁体字,编者将其转为简体字,并作若干注解。)

文明世界反对希特勒主义
——致宋庆龄的感谢信

埃兹拉[1]

亲爱的夫人，——我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对你们代表身处纳粹德国骇人恐怖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感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其谴责暴力和压迫的无畏方式充分显示了其存在。希特勒德国的反犹主义正在弥漫，唯有文明国家的呼声才能予以制止。文明国家必须认识到，反犹主义运动是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威胁。希特勒德国已经在文明的法庭面前遭到了谴责，在世界各地遭到了抨击。……我希望您勇敢的抗议能够唤醒德国冬眠的灵魂……”

(摘译自《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1933年6月2日。)

1_埃兹拉 (N. E. B Ezra) 是上海犹太社团领导人，《以色列信使报》总编辑。

何凤山颁发“生命签证”[1]

何凤山在维也纳担任总领事期间，维也纳全城有18万多名犹太人。德军占领维也纳后，这些犹太人的命运十分悲惨，许多犹太人的店铺都被纳粹的黄衣挺进队砸毁，老板被捕入集中营，反犹太运动在奥国肆无忌惮地展开。德奥合并尚未满一个月，第一批犹太人已被押送至达豪 (Dachau) 和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 集中营。纳粹当局发出指令，犹太人只要能马上离开奥国即可释放。因此，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于各个外国领事馆之间，想获取一张能够离开维也纳前往他国的签证。许多奥国犹太人想前往美国，但美国对奥国移民名额已满，而且申请人还须具备财务保证宣誓书；英国政府在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下也严格限制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断绝了他们的后路；1938年7月13日，参加法国埃维昂 (Evian) 会议的国家均没有承诺收容犹太难民，使奥国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1938年8月1日，纳粹当局成立犹太人外移中央办公室，开始对犹太人实施赶尽杀绝的政策；11月9日、10日在德国及奥地利爆发了反犹太人暴动，200多所犹太会堂被毁，7 500间犹太人商店被抢掠一空，30 000名德国及奥国犹太人被押送到集中营，这就是著名的“碎玻璃之夜”事件。“碎玻璃之夜”事件以后，犹太人的命运更加悲惨，为了得到一张签证，他们

1_何凤山1938—1940年担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通过发放签证的方式拯救了至少数千犹太人，成为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的第一位中国人。他本人对自己拯救犹太人的事情极少提及，也没有留下多少书面记忆，因此编者只能从蒋作斌先生和何凤山女儿何曼丽的记述中摘编相关内容。



国际义人何凤山

每天心急如焚地在各国领事馆前大排长龙，但多数国家拒绝伸出援手。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德堡（Eric Goldstaub）为了替自己和家人取得签证，在数月内奔走了50多所外国领事馆，最后怀着一线希望向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中国总领事何凤山为其一家20口人签发了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虽然艾瑞克与父亲在“碎玻璃之夜”暴动中被捕，但由于他们持有中国签证，仅几天后即被释放并前往上海，幸免于难。消息一传开，大批的犹太人都争先恐后地在中国领事馆门前排队等候，他们都急切地想获得一张到中国上海的签证（虽然当时上海在日军控制下，不需签证入境，但犹太人必须持有签证以证明目的地，才可获准离开奥地利）。大屠杀幸存者基尔达·克劳斯回忆说，当时她丈夫跟许多犹太人一样站在中国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漫长队伍里，这时，他看到一辆轿车驶抵领事馆大门，便急忙把申请表扔进轿车窗户里，很幸运的是，总领事何凤山接到了这张申请表，所以，克劳斯的丈夫很快便拿到了去中国上海的签证。

中国政府对给予犹太人签证，态度不一致，何凤山得到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训令，即对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但当时中国驻德大使馆的态度则不相同。驻德大使陈介迫于纳粹德国的淫威，认为希特勒既然反犹太人，中国为维持中德邦交，不能与之唱反调。因此，他打电话给何凤山，指示其应对签证加以限制。何凤山告知他外交部的训令并非如此，而是采取开放政策，他听后极不以为然地说：“外交部那里我去关照，你依我说的话照办好了。”不过何凤山并没有依陈大使的话去办，他后来回忆道：“看到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在人道立场

上，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因此，他仍然采取开放政策，继续为犹太人签发签证。在德奥合并后的两年里，在何凤山总领事的督导下，驻维也纳的中国领事馆发出成千上万份签证，这些签证后来被世人称为“生命签证”，让获得签证的犹太人逃脱了纳粹的迫害。

何凤山继续给犹太人发放签证这一举动让驻德大使陈介非常恼火，当时也有人造谣，说领事馆有人出卖签证，贪赃枉法。陈介正好借着这一把柄，派遣丁文渊参事前往调查。丁参事在未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抵达维也纳领事馆，首先查卷宗，查明外交部来电指示对犹太人签证是否真如何凤山所说的持“开放政策”，然后再查账目是否有舞弊的事情。经他一再详细核对之后，没有查出丝毫问题。于是丁参事问：“何以外传护照签证有弊？”何凤山答道：“谣言不足信。据事理推测，所谓‘开放政策’即依照普通条律人人都可以得到签证，那么还有什么人愿意另外出价来买签证。相反来说，若签证限制甚严，而上海又如美国一样，素为犹太人向往的地方，则贿买之事，还可以说得过去。然而，现在的事实，并不是如此，所以贪污之事为莫须有之诬告无疑。”听何凤山回答得这么有道理，丁参事自觉无话可说，也就只好打道回府了。不过事虽如此，外交部仍在1939年4月8日，也就是在开始发放签证一年之后，对何凤山作了记过处分，但何凤山并没有畏惧。事实上，中国总领事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这一举动也让纳粹当局非常恼怒。因此，他们就以领事馆所使用的楼房属犹太人财产为由，强行没收。何凤山在向政府申请迁移经费未果的情况下，自己掏钱在附近的约翰巷22号租下一间较小的公寓，继续发放“生命签证”。

“签证！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有关签证的消息中，我们醒来，就被签证问题缠绕。我们时时刻刻在谈这个问题，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获得必要的证件、意见、印戳。晚上，在床上，我们做梦，梦里是长长的队伍，官员！签证！签证！”这是一位在奥地利大屠杀中的犹太人幸存者在绝境下想获得一张生命签证的希望和迫切心情。由此可见，在那样人性沦丧的年代，一张能摆脱死亡的生命签证是何等的珍贵啊！那么，中国总领事何凤山到底签发了多少这样的生命签证呢？至今尚无准确的数字，但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至少有数千份。一位幸存者于1938年6月得到的签证号码为200多号，而艾瑞克·歌德斯德堡于1938年7月20号获得的签证号码为1 200多号，汉斯·克劳斯的签证日期为1938年10月27日，号码为1906号。“碎玻璃之夜”以后，申请中国上海签证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从中国领事馆发出来的签证平均每月有500多个，有时甚至达到900多个；到1939年9月，上海收容的犹太人就达到1.8万人。照此推算，中国总领事何凤山至少签发了数千份这样的生命签证。

当然，并不是所有持生命签证的犹太人最终的目的地都是上海，何凤山对这一情况非常清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奥籍的犹太人，大都想离开奥国前往美国，然而，美国容纳移民的数量有限，而且条件苛刻。所以，大多人来中国领事馆签证，前往上海，实则心存观望，仍然是等待美国或英国的签证机会。”事实上，许多取得签证的犹太人逃离维也纳后，从上海转道去了其他地区，如巴勒斯坦、菲律宾、古巴等。据古巴当地的一本书中说，当时有4 000多名维也纳的犹太人拿着到上海的签证逃到了巴勒斯

坦。这些由中国领事馆发放的签证也帮助许多犹太人取得意大利等国的过境签证，这些国家都要求过境者出示最终目的地证明。目前定居在以色列的塞尔维娅·多伦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何凤山，她回忆说："何凤山与我们家比较熟，他亲自把我护送回家，并对我们说，只要他还有外交官的身份，只要他还待在我们家里，纳粹就不敢伤害我。为了保护我们，自那以后，何凤山经常到我们家坐一坐，看一看。"后来，多伦的哥哥被捕，并被带到另外一座城市，庆幸的是，他手里握着何凤山给他办理的中国领事馆签证，所以他很快被释放。多伦和哥哥、姐姐于1939年逃出维也纳，多伦和姐姐来到巴勒斯坦，哥哥去了英国。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兼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副主席辛格的父母当时也是拿着何凤山发放的签证逃到了古巴。在1938—1940年间，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拿着何凤山总领事发放的签证逃离到了包括中国上海在内的世界各地，过着新的生活，延续着新的生命。

据统计，二战期间纳粹一共杀害了约600万犹太人，这个惊人的数字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犹太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如今，岁月沧桑，斗转星移，也许痛苦的回忆已经渐渐远去，不再清晰，但摆脱痛苦，获得新生，让生命得以延续的那种喜悦却是永恒的，"生命签证"的故事将如人类的生命，代代永相传！

(摘编自以下著述：蒋作斌主编：《国际义人何凤山》，岳麓书社，2007年版；何曼丽编：《生命签证——何凤山博士拯救犹太难民义举图片展》文本；《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何凤山博士专题》相关资料。编者按国际惯例对若干文字和译名作了修改，并加了注解。)

刘冠初先生回忆何凤山救助犹太难民的若干细节

简介: 刘冠初，1934年7月出生，1957年就读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期间与何凤山为师生关系。后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就读国际法专业，毕业后长期在IBM公司任职，退休之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国际法课程。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何凤山研究课题组于2006年11月23日采访了刘冠初先生，通过他了解何凤山在奥地利任职期间发放签证救助犹太人的相关情况。以下是采访记录摘要。

问: 你是如何认识何凤山先生的，他何时当过你的老师，为什么向你讲述自己在奥地利给犹太人发签证的经历?

答: 我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时，从驻外大使职务卸任不久的何凤山先生来给我们讲授外交课程。那时讲课老师们均无专车，早上坐班车来校，下午5点左右再坐班车回去。这样，他在讲课后到班车来之前就有较多空闲时间，经常与我们这些学生聊天。他十分平易近人，经常买一些甘蔗与我们分享，边吃边聊。我们问了他许多关于担任驻外大使期间工作的问题，他基本上有问必答。隔了这么多年，有些事记不清楚了，但关于他在奥地利发签证救犹太人的事，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所以也记得特别清楚。

问：何凤山先生当时在德国、奥地利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德国方面对他给犹太人发放签证没有过度刁难？

答：何凤山先生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负责军购。之前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原国民政府兵工所所长、弹道学专家俞大维先生。早在国共两党在江西进行围剿与反围剿作战时，俞就预料到中日必有一战，因此积极采购军火，事后证明他是对的。后来中日战争期间，重庆山里兵工厂生产的步枪（中正式步枪），所用的枪管就是那时从德国采购来的。当时，德国需要中国的金属钨，俞就用中国的钨矿和钱，与德国进行军购方面的合作。俞离开德国后，军购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何凤山。由于何凤山与德国军方高层能够经常接触，并且建立起了比较好的关系，德国人对他较为宽容，就他给犹太人发签证的问题，即使到了最后也没撕破脸皮。上述情况有的并非何凤山本人所讲，而是我们从各方面了解所得。

问：何凤山先生究竟给犹太人发放了多少签证？当时获得签证的犹太人主要去了哪些国家？

答：当时何凤山到底给犹太人发了多少签证，确实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根据签证收费情况做一推算。当时每份签证收费1.5镑，总共发了10 047份，估计其中大部分给了犹太人。当时何凤山所发放的签证主要是一张离开纳粹控制区的凭证，获得签证的犹太人之后去往哪些国家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数千人，也可能近万人去了中国，基本上都是先到达上海的。

问：曾有人举报何凤山卖护照谋利，你能否谈一下当时

的具体情况?

答:当时在整个纳粹控制区有300多个有钱或有地位的犹太人,他们已被剥夺了公民身份,因此希望获得其他国家护照或公民身份。何凤山确实给了其中一部分人中华民国护照。他这样做一方面出于同情犹太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当时,中国与欧洲几乎断绝联系,驻外使领馆活动经费匮乏。尤其是在1937年,中国外交部没给何凤山一分钱。当时申领一本中国护照大概要付180英镑,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这项收入约为6万英镑。何凤山用这些钱维持了工作人员的日常经费。总领馆关闭后,剩下的钱后来交给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上述情况有的也不是何凤山本人所讲,而是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所得。

问:在当时的情况下,何凤山给犹太人办理签证和护照一定受到各方的压力,他有没有向你们谈到是如何想方设法克服这些困难的?

答:何凤山当时在办签证时也是有所顾虑的,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德国方面和中国方面,但实际情况并没那么严重。德国方面当然有反犹政策的因素,但是迫使犹太人离开也是纳粹的目标。所以,如有国家给犹太人发签证,使他们得以离开,德国人并不阻拦。至于中国方面,尽管驻德大使陈介指示何凤山应对发给犹太人签证"加以限制",但也没有强力阻止。不过,当时领事馆门口整日排着长队,德国秘密警察又严密监视进出人员,倒是使前来申请签证的犹太人感到不便和不安。面对这样的情况,何凤山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领事馆后门小巷内有一个酒吧,

何凤山便派了一位实习领事坐在那里接待犹太人，给犹太人办理签证。据何凤山说，他本人也曾在那里接待过犹太难民。这种方法既快捷又安全，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办理上百份签证。

问：当时国民政府一方面不明确支持何凤山给犹太人发签证，但另一方面又有计划在云南建定居区安置来华犹太难民，您是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答：对这一情况，要摆在当时的时空来谈。当时国民政府一直忙着应对“剿共”“西安事变”，以及后来的抗战等，根本没有精力来管这些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侍从室，也一直没把这当回事。面对大量来华犹太难民，国内当时有各种反应，有同情的和主张提供帮助的，也有不赞成的。在云南划区安置犹太难民只是一些空谈而已，实际上是无法实施的。

问：作为何凤山先生的学生，您是如何看待他的？

答：何凤山没有把他救助犹太人的事告诉其他人，直到他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他的这一大善举，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他是一个学者型的、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在官场上可能不太适合。外交部对他的训令，他经常不理，部里的人对他微词很多。他是一个大好人，但不适合做公务员。

问：何凤山的义举得到以色列方面的认同，但台湾方面一直没明确表态，连他的葬礼也没派人参加，您对这个情况是如何看待的？

答：台湾这些年的问题是台独走势明显，执政当局对

蒋时代的事情不正面回应，认为那是外来政权的事。李登辉执政时期是这样，陈水扁执政后也是如此。所以不难理解，何凤山的义举虽得到以色列的认可，台湾方面却避之不谈。

（根据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周国建、汪舒明、刘锦前等采访刘冠初先生的记录整理。采访时间：2006年11月23日。）

特别使命
——帮助犹太难民进上海

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1]

一

1941年3月7日，初到上海不久，我在给妻子的明信片上这样描述我对上海的印象：

总的看来，上海是一个令人感到压抑的地方。……在街头每天可以收拾到约40～50个小孩的尸体，他们的父母为了逃避安葬费而把他们抛尸街头。在冬天，每天约有80～100个人冻死。上海的劳动力不值钱，一个熟练司机月工资为35元，合4美元，而一个店员月工资只有30元。

白天经常能看到乞讨、偷窃和抢劫。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地方能看到如此明显而令人不安的社会差距。苦力与百万亿万富翁一起生活，街上到处有歌舞餐厅、夜总会等，穿着名贵服装、坐着豪华轿车的富人和衣着褴褛、打着赤脚的穷人混在一起。我走进一个中国家庭的住房，吃惊地退了出来，它还不如一个狗窝。

想起我们打算把难民带到这个城市，我的内心就充满着不安。

1_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Zorach Warhaftig)，20世纪30年代波兰宗教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与波兰犹太经学院师生一起逃到立陶宛，后经苏联到日本。1941年以犹太代办处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帮助仍滞留在立陶宛和日本的犹太难民来沪。后来，他本人经北美前往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全国宗教党领导人，1962—1974年任以色列宗教部长。

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和港口，上海当时被划分为4个区：① 华界，由中国政府管辖，居民都是中国人，没有外国人，也不允许外国人（包括外国难民）迁入；② 日租界[1]，由日本直接管辖；③ 法租界，是上海的高级地区，建有租金昂贵的豪华住宅。多数犹太人住在这个区，有塞法迪犹太人，也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法国投降纳粹德国，并建立了维希政权以后，该区就不准犹太难民居住了；④ 公共租界，由包括几个西方国家领事在内的上海工部局管辖。

上海的犹太人在1941年组织良好。塞法迪犹太人有700名，俄罗斯犹太人约4 000名[2]。塞法迪犹太人来自巴格达等中东地区，其中有些人已得到了英国国籍。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是富有的沙逊家族，掌握着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维克多·沙逊领导着沙逊家族[3]，是上海的富豪，也是远东最富的巨头之一，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举足轻重。他继承家族传统，为本国人做了很多事，也为上海的城市建设做了许多事。除沙逊家族之外，还有哈同和亚伯拉罕家族，他们富起来后，就有能力去帮助那些伊拉克犹太移民。

塞法迪犹太人为他们那壮丽的犹太教堂而自豪，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拉比，宗教上的事务就委托给阿什肯纳兹拉比。

4 000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来自俄国。俄国每次爆发战争或革命，都有零零星星的逃亡者穿过边境，进入满洲，再到达国际城市上海。俄国犹太难民在经济领域站稳了脚跟，成为有一定成就的中产阶级商人。他们也建立了运行良好的宗教和社会机构——会堂、俱乐部及一个浸礼池[4]。上海的首席拉比梅耶·阿什肯纳兹[5]是个俄国难民，身为阿什肯纳兹社团的拉比已近20年，同时也被塞法迪社团承认为宗教权威。

1_上海并无正式建立的日租界，这里指的是日本人集中居住区。

2_大多数材料认为当时上海有塞法迪犹太人800～1 000名，俄国犹太人5 000名左右。

3_维克多·沙逊（1881—1961），是新沙逊洋行的首脑，上海犹太商界之首富。

4_浸礼池——正统派犹太教徒在安息日前或妇女行经期后举行洁净礼时所用的水池。

5_梅耶·阿什肯纳兹拉比（1891—1954），长期任上海犹太教首席大拉比，是上海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其姓也为“Ashkenazi”，为与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有所区别，这里译为“阿什肯纳兹”。



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

上海的犹太教育水准并不高。当时有一所犹太经学校和一所犹太学校，但并没受到很大重视。较富有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英国学校，甚至送到基督教会学校。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阿什肯纳兹难民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有着强烈的修正派倾向。米兹拉基组织[1]也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核心机构，并随着波兰难民的来到而日趋成熟。

二

上海有一个相当大的德国犹太人社团，人数约有15 000名，这些人在1938年年中开始进入上海。他们曾长期等候美国或拉美国家的入境鉴证，尤其在“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10—11日)[2]后，他们竭尽全力离开德国，准备去往能居住的任何国家。那时，纳粹当局正在对犹太人施加压力，为了使他们早日离开，还提供有关日本过境签证、船票票价、付款方法及航期的详细信息。

1938年年中，德国犹太人发现上海是个避风港，这里无须入境签证，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朝上海进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年中，其后就受到严格限制了。按照新规定，只有德国当局允许出境，在旅游护照上办理许可手续后，才能得到去上海的船票或赴日本的过境签证。

对成千上万德国犹太人来说，上海本来只是一个临时避难所，他们打算从那儿再到最终目的地。但1941年初，在上海的约15 000名德国犹太难民离境受挫，只能滞留在沪。由塞法迪和阿什肯纳兹社团领袖领导的，得到以美国为总部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大力资助的上海社团委员会，安排大部分难民居住在日本人管辖的虹口。那儿生活条件很差，每个人一个月生活费仅3.3美元，只够每天吃一顿饭。

1_宗教犹太复国运动政党——精神中心党的音译，也有图方便干脆称之为米兹拉基党的。

2_1938年11月10—11日，纳粹党徒在全德捣毁犹太人的财产，到处是一片砸碎玻璃的声音，曾有人译为“水晶之夜”，近来不少译作改为“碎玻璃之夜”。

虽然不少难民刚来到时带着钱财，但一旦用完就赤贫如洗了。一部分人寻找能雇用他们的任何工作，其他人则干乱七八糟的活。

在我们到达上海之前，下列一些组织和人士就以电报形式给我们发来了介绍信：耶路撒冷的犹太办事处、纽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瓦德·哈扎拉营救委员会、神户犹太人社团、波兰驻东京大使以及在东京的波兰救济战争受害者委员会。神户犹太人社团给了我一份介绍信：

致有关人士：

兹介绍瓦尔哈夫蒂格先生，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犹太办事处的一位可信赖的代表，代表我们前往上海，以寻求帮助欧洲犹太难民离境的渠道和可能性，特此证明。对给予他的任何帮助，我们将非常感谢。

一封从耶路撒冷犹太办事处移民部发往上海犹太人社团的电报也具有相同的内容。

在上海，我们很受欢迎。我成了梅耶拉比家的常客，这位拉比在犹太人社团中受到人们的高度敬重，他风度极好，其整个家庭成员都参与社团活动。拉比的秘书塔根哈夫脱先生是经学院毕业生，也为救济活动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

我还与社团领袖托帕斯先生和托科钦斯基先生保持着友好关系，后者的儿子约瑟夫·托科以后曾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1]。这两位先生在俄国犹太人中十分活跃，随时愿意对犹太人提供帮助。

我拜访了几位犹太人社团领袖，发现他们都富于同情

1_约瑟夫·托科（Yosef Tekoah）曾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国大使，离开政府后曾任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校长等职。

心。我们与亚伯拉罕先生曾有一两次一起过安息日。亚伯拉罕先生是犹太社团的一位领袖，是个观察力敏锐且富有的犹太人。他的家充满着高尚的文化气氛，在他家过安息日令人难忘。犹太人社团的领袖们在我们与当局谈话时一直陪在身边。

德国犹太难民组织平时开展充满生机的文化活动，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广播电台，用德语播音。我应邀对他们发表演说，介绍波兰犹太人的悲惨处境，离境时的艰难困境，他们的烦恼与希望，以及有关以色列的情况。德国难民显然被我的发言所打动，几星期后，我又应邀访问了他们的住所。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患难兄弟似的欢迎。无论是在考纳斯还是在上海，我们都经常亲身体会到犹太格言中表述的真理："全体以色列人都是同志。"

三

同日本当局接触时，我们与负责上海犹太难民事务的帝国海军犬冢先生和负责治安事务的领事小拔上尉进行了会谈。谈判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让逗留在立陶宛的难民进入上海；另一个是将滞留在神户的难民接来上海临时居住。

犬冢对犹太难民的态度是暧昧的。据后来的报告证明，犬冢大佐是个对日本外交和国防事务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隶属于一个赞成日本与德国之间发展亲密关系的政治派别，该派别也赞同纳粹德国疯狂的"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犬冢本人翻译过反犹小册子，甚至匿名发表过反犹文章。当时，日本正在寻找一条与美国联系的途径，特别是在贸易方面，但这也许是一个假象，以便掩盖日德之间越来

越亲密的关系。犬冢深信《锡安长老议事录》中传播的荒唐说法，即犹太人是美国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所以他试图利用所谓他与犹太人发生的关系，提高日本在美国人眼中的地位。当会见犹太人社团领袖们，尤其是美国犹太人时，犬冢总是尽量使谈话显得亲切和谐。他书桌上放着一个烟盒，上面刻着几行字："向犬冢大佐致谢，感谢他为美国正统派拉比联合会的成员所作出的贡献。普珥节，1941。弗兰克·纽曼。"我们与他会见时，他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这句赞美语。

谈判中，犬冢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有关滞留在立陶宛和神户的犹太难民的要求。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写的《河豚鱼计划》叙述了我与犬冢其中一次会见的情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犬冢被起诉1943—1944年期间在菲律宾犯下了战争罪行。在为自己辩护时，犬冢出示了纽曼送给他的烟盒，以证明他对犹太人和外国人的积极态度。最后他被宣判无罪，回到东京，甚至加入了日（本）以（色列）友好协会。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迈克尔·科根揭露了他反犹太人的过去，迫使他中断了与该联合会的关系，1965年他死于大森。1982年3月，犬冢的遗孀访问了以色列，把她丈夫的烟盒交给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以此证明他对犹太人抱有同情心。我并没有对这种姿态提出抗议，因为我认为她这样做不会得到任何形式的承认。据我所知，犬冢帮助犹太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上海的日租界大门对犹太难民是关闭的，只能通过私下用钱通融，才能偶尔得到一张迁入许可证。在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梅耶拉比和他的助手J. 塔根哈夫的帮助下，我们用这种方式拿到过几张许可证，但每张证件的

签发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非常艰苦的努力。

四

这时发生了在维尔纳的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的问题。进入华界是完全不可能的,法租界停发迁入证已很久了,现在只剩下公共租界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所有私人入境证都由公共租界签发。为了保证难民在上海的生存,我们须为每个难民交纳30美元的手续费,有时还要交纳其他费用。入境证通常邮寄到立陶宛,再由上海的苏联国际旅行社通知其在考纳斯的机构,把入境证发给在那里的难民。

有艘轮船原定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直接驶向上海,我要求梅耶拉比帮我弄两张入境证,以便转寄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两个难民。拉比答复说有些困难,需谋求各犹太组织的支持筹集经费。上海的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领导人给我们写信,同样提及经费问题,说要晚些时候才能拿到入境证。最后,我们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拿到一大批入境证,以便经苏联国际旅行社快递转送到考纳斯。只需得到苏联出境证,难民们就会很快离境进入上海。

作为犹太代办处的特派代表,我们通知上海工部局:只要按我们的名单颁发进入上海的许可证,我们可给这些持证到达的波兰难民签发到以色列的证件。我们也将负责这些难民在沪的生活,直到他们到达以色列为止。工部局官员要我们提供这些保证的正式确认文件。我们打电报给犹太办事处:

我们能够为至今在维尔纳的犹太人搞到300张上海入境证。现要求你们发急电给上海工部局的菲利浦,告诉他按我们的名单签发入境证,难民来沪路费由你们负担。

我们还打电报给纽约的内厄姆·戈尔德曼博士，要求他通知菲利浦，联合巴勒斯坦呼吁会[1]，承担难民到以色列的路费。

犹太办事处和联合巴勒斯坦呼吁会都难以允诺我们需要的经费，因此我们成立了驻上海的巴勒斯坦办事处，3月18日写信通知上海工部局秘书兼督察长G.G.菲利浦先生：

耶路撒冷犹太办事处愿在联合巴勒斯坦呼吁会和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协助下，对于将转移到巴勒斯坦，但现滞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生活费及后来去巴勒斯坦的路费承担责任。

3月24日，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团也发出类似的信件，其内容大致为：本社团将接济300名波兰犹太难民，直到他们去以色列为止。

那时，我们已与各国领事分别进行了会谈。一天，我们应邀参加了一次领事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我代表犹太办事处到会，同去的还有几位上海犹太社团的高层人士。呼吁书由地方社团的一个成员递交，写得较平淡，似乎并未给领事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意识到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以一个难民的身份要求发言，想用我那拙劣的英语，为我们的特例再做一次呼吁。我描述了波兰被占领后犹太人突然面临的灾难，以及几千个难民成功地逃脱占领区后所遭到的困难。我泣不成声，几乎不能结束发言。我讲完后，大厅内死一般寂静。我觉得至少有几个领事已被感动。经过短短的商议以后，领事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我成功了！

这一决定由1941年3月24日的一封信所确认：

1_美国犹太人组织，专为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筹款。

先生们，

收到你们1941年3月18日的信，关于允许300个波兰公民进入上海，转道去巴勒斯坦的问题，鉴于巴勒斯坦犹太办事处将承担有关人士留在上海的生活费以及去巴勒斯坦的路费，本局同意给予入境证。

秘书兼督察长

G.G.菲利浦谨启

我们立即准备好了3份名单，每份100个名字。第二天，我们把第一份名单给菲利浦，副本交给警察局副督察长J.罗伯逊。在给罗伯逊的信中，我们再次表明，这些难民将在上海住一段日子，然后去以色列，在上海期间，犹太人社团会向他们提供一切所需物品，不会给城市增加负担。入境证终于签发了。

经苏联国际旅行社，入境证转送到了在考纳斯的难民手里。在空邮入境证的同时，还发电报通知了他们。拿到入境证的人，在当地旅行社代办处收到电报通知后，就可以安排离开立陶宛了。

办理入境证的费用和个人开支由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支付，但该组织负责人伯尔曼耽搁了提供入境证名单的时间，当时任何拖延都可能丧失最后逃脱的机会，为此我们拍了急电。最后在我们搞到需要的金额并转送到上海以后，5月3日，组织才打来电报："入境证费收到。100张入境证分4批空邮寄出……"

我们要求梅耶拉比和委员会帮助难民并监督发送300张入境证。与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的协作极为困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回到横滨和神户，设法实行我们的下一步

计划。

编制人员名单也不是容易事。申请避难者人数庞大，我们在很大压力下工作，不得不尽快作出决定。许多（如果不是太多的话）入境证送到了拉比和经学院学生手中，但也给了一些立陶宛公民。我们从苏联国际旅行社那里得到某种暗示，一旦大多数难民离开立陶宛，苏联当局也可能考虑让立陶宛人出境。另外，我们在立陶宛的同事们要我们把他们也列入名单之中，有了外国的入境证，对他们最终离开苏联会有帮助。

从4月到5月，在办理过境签证申请高潮期间，许多犹太人和机构要求拿到上海入境证，其中有以色列阿古达特组织[1]领袖，有华沙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前高级官员，有东京的波兰救济组织，有波兰的米兹拉基组织前领袖，有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神户办事处，以及许多其他组织。按照名单，共有400张入境证，其中300张基于3月24日的申请，约100张在上海由梅耶拉比和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取得。大部分入境证依照我们的明细单发放，包括40名流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难民，他们在4月底离开苏联，乘阿克地达号轮船到达上海。

考纳斯的苏联国际旅行社每次收到我们的名单，都会引起更多人来申请上海的入境证。有些人离开立陶宛后打算到以色列或其他地方，至少他们可去莫斯科，这样也就远离了将在1941年6月22日开辟的战场。

我们在上海的第二个目标是安置那些到了日本但又不能待下去的难民，这件事非常紧迫。我们的任务是适当地转移他们，以防日本当局采取我们难以应付的行动。我们需要决定是否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接收和救济波

1_正统派犹太教徒的组织，具有反犹太复国主义倾向。

兰难民，向他们提供单独的住所，或者安排他们住在为德国犹太难民建的现成的房子里。

斯皮尔曼先生领导的援欧在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要求波兰难民住到向15 000名德国难民供应伙食的临时宿舍中，资金由美国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提供。但有一些重要法律和社会因素要求将波兰难民单独安置。现成的房子位于日本管辖的虹口区，没有日本军事当局的同意，波兰难民无法进入。我们与犬冢和小拔的接触已告失败，波兰难民只能居住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主要住在法租界，他们极愿帮助波兰难民。此外，德国难民住房条件很差，不知波兰难民能否承受。在我们的支持下，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团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1]，下设几个小组处理有关接收难民的经济、财务、医疗卫生、法律及劳工等事务。

我们打电报给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通知他们："据日本当局要求，转移持无目的地签证的难民是不可避免了，由于法律、技术及宗教上的原因，将他们安置在虹口（日租界）德国难民居住区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成立了一个援助波兰——立陶宛难民委员会，为1 000名难民租用住房。立即电汇必要的转移费用。"

在给正统派拉比联合会的电报中，我们对马上从神户转移1 500个难民，包括几百名拉比和经学院学生的重要性作了解释。我们指明了与德国难民住在一起的不利之处，并要求他们立即考虑转移难民的迫切性。

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在法租界租用了住房，并要求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同意为接收波兰难民而作的安排。此外，还要求为每个难民每月增加6美元的资助。上海美犹

1_该委员会建立于1941年3月，英文简称为EASTJEWCOM。

联合分配委员会中负责德国难民事务的代表斯皮尔曼，打电话给委员会，强烈反对为波兰难民所作的任何单独的安排。他声称，难民之间的任何类似歧视的做法，都会遇到强烈反对。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坚决反对斯皮尔曼的主张。神户的犹太难民委员会联合上海的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表示完全支持特殊对待波兰难民的做法。

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最终接受了我们的主张，批准了特别委员会处理波兰难民问题的做法。我们着手租下了挑选后的房子，为接收波兰难民作了适当安排。

3月26日，我写信给在横滨的妻子，总结了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昨天，我们提交了100张上海入境证的第一份名单，明天我们交第二份名单，第三份名单我们将在日本提交。假如我们成功地从维尔纳救出300个家庭，就说明我们俩没有白白地长时期分离。我们还做了一些别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我们成立了一个有效的委员会，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承认它，并调拨3 500美元给我们作为第一笔住房租金。此外，我们把食物邮寄给在华沙和其他德国占领区的亲友们。"

我们回到日本时，明显感到我们的任务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

神户的波兰难民自1941年4月开始转移到上海。根据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的意见，第一批转移人数为10～15名，这样不会引起上海当局的注意。以后每批人数增加到50多名。转移于1941年11月结束，这时正好是珍珠港事变的前夕。

（摘译自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所著《难民和幸存者：大屠杀期间的救助努力》[Zorach Warhaftig: *Refugee and Survivor, Rescue Efforts During the Holocaust*, Jerusalem, 1988]，编者加了若干注解。）

沪上救难亲历记

劳拉·马戈利斯[1]

以下是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至1943年2月25日这段时期上海的事态发展和我的见闻。此后我就身陷囹圄，我的同事曼奴埃尔·西格尔也先于我几日遭囚禁。这是我俩的共同经历，大部分凭记忆所及，难免有不精确之处，有待于西格尔的更正修改。

一

我们原与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2]商定12月8日到虹口去改组行政机构，上海的战事与珍珠港事变一起爆发，这个大都会随即被占领，打破了我们预定的计划。在头一周里，属于敌国侨民的人都奉命留在家中，等待向宪兵登记。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和我们一样属敌国侨民，主席是荷兰人，其余大都是英国人，能自由活动和行使职责的只有前船长赫尔茨伯格（专职执行委员），他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无国籍侨民，父母是德国人。12月份的拨款尚未从美国方面到来，赫尔茨伯格立即把8 000名受救济难民的伙食从每天两餐改为一餐，面包从12盎司减至6盎司。以每天餐费花5 000元中央储备银行券[3]计算，他估计至少可维持到12月底。同

1_劳拉·马戈利斯（Laura Margolis），是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当时派驻上海的代表，1943年2月被作为敌国侨民监禁，后被遣返美国，战后返回上海。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简称JDC，是美国犹太人成立的专门救助世界各地穷困犹太人或难民的慈善组织，经费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犹太人的资助。本文是马戈利斯写给JDC总部的报告。

2_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Committee for Assistance of European Refugees in Shanghai）即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38年由上海各犹太社团、组织组建，主要目的是援助避难在沪的欧洲犹太难民。

3_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是日本占领时期南京汪伪政府发行的货币。

时他通知500名雇员，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可能不得不在1月份关闭，不会再发给他们工资。这在难民、雇员中引起了对饥饿和生活无着落的恐慌。

12月15日，我们被告知日本人“目前”暂不将敌国侨民禁闭，只要乖乖地遵守军事当局颁布的规章，就有在市内活动的自由。我们去见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主席斯皮尔曼和副主席海伊姆，建议他们通知日本当局，该组织至月底不再能得到资金，让日本人知道难民的困厄。斯皮尔曼、海伊姆等3人去向负责犹太人事务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犬冢大佐陈述情况，但犬冢根本不愿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在珍珠港事变前从不把他和控制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放在眼里，犬冢大佐几乎是把他们赶出了办公室。

二

当时我们收到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电报，授权我们筹措相当于6个月拨款的借款，约18万美元。此前我们已向美国红十字会请求给予可能的帮助，它允诺，只要日本人放行，就提供5 000袋面粉给我们。我们觉得最好与日本人联系一下。在提出面谈的要求后，我们受到犬冢大佐有礼貌的接待。我们用日本人爱听的口气陈述了如不能筹到款将发生的实际情况，并告诉他委员会的应急资金都冻结在银行里。犬冢要我们信赖他，答应调查冻结资金的事，说只要从中立国取得贷款就行，并同意放行红十字会的面粉，但附加条件是要我们负责解散援欧来沪犹难委员会。他对该组织极其反感，还提出要把赫尔茨伯格解职。犬冢对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这是维克托·沙逊爵士出资建立的组织）[1]也很反感。他同意继续让斯皮尔曼留任，他觉得这个

1_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Granting Relief to European Refugees)，另一个在上海的救助欧洲犹太难民的组织，曾得到沙逊家族资助。因其主席是科莫尔(Paul Komer)，也称科莫尔委员会。

人不像其他人那样瞧不起他。

12月余下的日子里我们始终与犬冢保持着联系，他的办事处就在华懋饭店里。我们也住那里，直至1942年1月15日。12月末，犬冢解冻了3万元中储券给我们，这笔钱够我们在1月份用6天。

三

与此同时，虹口难民的恐慌与日俱增。我们即到那里召集雇员开了一次会，如实说明情况，并在12月30日发放了当月的薪金，才暂时平息了风潮。

一位雇员提议我们与一个名叫野上夫人的日本女子接触，她在宪兵队中替宪兵首脑当翻译，很有势力。这个女人以同情犹太人闻名，是德国犹太人布拉恩先生的朋友。我们回答说迄今一直与日本海军打交道，不便找其他部门（日本陆军、海军、宪兵、领事馆之间存在激烈的争权夺利，利用一方招惹另一方极端危险）。

1月5日，斯皮尔曼先生在其办公室里召集30位著名的犹太富豪开会，他们属于不同国籍，包括“敌国侨民”。我们也邀请了阿什肯纳兹社团和代表难民的中欧犹太协会[1]的代表到会。斯皮尔曼先生和我们恳求这些人帮助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筹集资金。唯一肯定的答复来自两位阿什肯纳兹的代表，他们说在这方面必须做并且肯定能做一些事。一个捷克人E.坎先生以前在委员会中十分活跃，现在以“健康”为由提出辞职。亚伯拉罕先生（英国籍）代表塞法迪犹太人社团和最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说：“既然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们也会为难民问题担心。”最后决定由一个5人小组探索筹措借款的可能性。

1_中欧犹太协会（Judische Gemeinde），当时在沪的中欧犹太难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建立的组织，成员大部分来自德国、奥地利。

两天后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约我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有事相商。我们在那里见到一个名叫齐默曼的西伯利亚犹太人，他得知贷款的事，提出如能让10名左右上海最富有的犹太人背书担保，他愿意贷给我们一笔350万元中国货币的钱款。我们都为出现这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感到惊愕振奋，立即向斯皮尔曼先生转达。他开始找人作保，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因此未能得到贷款。

四

1月初，一批日后在救助难民计划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难民把我们找去会面，设法在一个"紧急计划"中就地筹措资金。为首的是普尔弗马赫先生、西尔伯斯坦先生和格拉泽先生，这些人在较富有的难民中组织了这次行动，在一周内筹到3万中储券，这样我们又度过了6天。

同时，我们与日本人、各委员会和个人的谈判都在进行。我们派秘书格卢克曼先生长驻虹口，但关闭了斯皮尔曼先生在公共租界的办事处，解除了赫尔茨伯格船长的职务。

1月10日，尽管我们费了很大力气，以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名义商借救济款，但贷款仍遥遥无期。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筹到一定数量的钱款以维持数月，这个救济组织就不得不关门大吉，将整个难民事务移交给日本人。而日本人则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能再对犹太人问题作出比其他事情更多的努力了，因为上海到处是饥饿贫穷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我们当即召集中欧犹太协会开会，告知现有的资金只够供8 000人吃4天，或4 000人吃8天了，唯一的办法是集中救济最困难的人以争取时间。在征得他们同意采取措施后，只剩下2 500名贫病交加的人（我们去除了所

有的单身汉）以及老人孩子，都是最急需救济的人，仍住在我们的营地里。我们仍使两家医院和一个妇产院勉强维持下去。当我们明白从塞法迪犹太社团和形形色色的富人行列里再也得不到帮助时，就去向阿什肯纳兹社团的头面人物比特克先生和拉宾诺维茨先生求助。两人答应想想办法。布拉恩先生也邀我们到他家去讨论此事，他说最怕的是虹口局势失去控制，日本宪兵借口平息骚动前来接管，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同意他把事情告诉野上夫人，如果她叫宪兵队的人来与我们接触，我们不反对。不久宪兵队把我们召去，听我们讲了难民的情况和筹款的打算。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日军刚占领上海时避免发生混乱，急切要在虹口保持局势平静，希望本地犹太人能帮助募款。

五

1月15日，我们实际上已囊空如洗了。虽然日本海军答应解冻银行储蓄，放行面粉，但不可能关心难民问题；宪兵队竭力要强行执法；当地犹太社团还在研究和辩论如何筹集贷款。我们明白必须让人们从冷漠状态中惊醒过来。16日下午，《上海时报》记者采访我们。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避免向报界披露救济犹太难民的内情，因为日本人不赞成对此进行宣传。现在只有冒险一试了，我们将虹口难民快要饿死的情况公诸报端。1月18日，报上出现了大幅新闻标题。宪兵队对报道上海阴暗面大为震怒，海军方面的犬冢大佐也把我们叫了去，十分冒火，日本驻沪领事馆也要我们解释。从布拉恩先生处得知宪兵队下了逮捕令，后来还是靠了野上夫人出面才撤销了命令。

电台也转播了有关难民情况的报道，并呼吁犹太社团

及社会各界捐款。我们预期的反应产生了，钱款开始涓涓滴滴地流入。然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此之前的1月16日。上海大通银行董事舒马赫认识一个名叫考夫曼的主顾，是长期驻沪的德国犹太人，最近赚了一大笔钱，舒马赫劝他把钱借给我们，这样可以避免被作为"移民的储蓄存款"冻结的命运。这个建议很合考夫曼的心意。在他来接洽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写了一张字条，说明这些钱不是移民的储蓄。我们知道这张字条会送到纽约去兑现，成为18万美元的贷款中的一部分。当天我们从考夫曼先生那里得到相当于1万美元的钱。

阿什肯纳兹社团也任命了一个财金委员会，为我们筹措借款。在他们帮助下，我们认识了一个持挪威护照的俄国犹太人J.施里罗。此人是一个巨富，急于在财产被日本人没收前把它转移到美国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他打交道容易些，他是个极端难对付的精明的生意人。由于我们急需资金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不得不在利率上作很多让步。除他之外，上海没有第二个人会拿出这些钱来借给我们。在我们筹借到的第一笔18万美元的贷款中，从他一人处就借到13.8万美元。另有几笔贷款数额仅15～20美元。

阿什肯纳兹社团的比特克先生（波兰籍），是少数对局势的严重性认识得十分清楚的人，他力主犹太人必须自觉地负起责任。他在所有的谈判中担任我们的财政顾问，对日本人把某一货币贬值的消息很灵通，使我们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1942年6月，日本人把重庆方面发行的法币全部收回去，限期以2：1的比率兑换中央储备银行券。我们事先得到比特克先生的通知，早已用所有的法币买了食物储藏起来，因此未受损失。1942年4月末，我们的18万美元

贷款已有了保证，我们制订计划使这笔钱足够维持8个月，而不是半年。5月21日接获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从南美洲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通知我们停止一切联系，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此前我们虽然已不能从纽约总部直接得到钱，但总希望与总部保持联系，可能找到最终解决办法，现在这已不再可能了。

六

同时，我们改组了援欧在沪难民委员会。我们早就注意到这个臃肿的管理机构多达500名雇员，长期以来效率不高。它的中式大厨房耗煤量奇大，但效率特别差。现决定除了主席斯皮尔曼先生外，所有的机构全部解散。我们召集所有3个难民营的代表和在营外接受救济者的代表开会，要他们自己承担起管理事务。波兰籍的犹太工程师列文斯皮尔早就主张改造厨房，他计算出难民每餐5角钱内4角是煤钱。我们采纳他的建议：花10万法币把它改成一个简单有效的现代化蒸汽式厨房，可供1万人用餐。最需要的设备是蒸汽锅炉，但这一设备在中国买不到。列文斯皮尔想起华懋房地产公司有弃置不用的锅炉，我们就到那里向他们商借使用，但遭到英国雇员的回绝。我们知道这锅炉迟早要被日本人没收，取来使用是合乎情理的，于是通过野上夫人从宪兵队取得许可证，把这些锅炉搬来了。监督华懋公司的日本人很乐意地把这些锅炉给了我们。我们立了一张借据，说明只是暂时借用，随即花10万法币为新厨房配置物品。

我们觉得有责任把事务性工作向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或者不如说向残缺不全的委员会（一些人辞职了，海伊姆先生被捕了）汇报。我们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

只有斯皮尔曼、亚伯拉罕和霍瑞斯·嘉道理[1]3位。西格尔在汇报中直率地指责委员会组织极差，贪污盛行，对待难民像对待苦力。我们告诉他们必须解散这个委员会，另行组成一个新的、更有代表性的社团委员会。嘉道理先生和亚伯拉罕先生当即提出辞职，不愿在新委员会里任职，而斯皮尔曼先生很乐意地接受批评，同意帮助我们。

新委员会要能代表在沪的犹太教的所有派别。为此我们与代表巴格达和中东犹太人的塞法迪社团、主要是俄国犹太人的阿什肯纳兹社团和代表德国犹太人的中欧犹太协会的领袖们接触。3月初，新的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在斯皮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开会，近25名委员出席。斯皮尔曼先生作了开场白后，我们就在委员会下面建立了管理住房、伙食、财金、募款、预算、采购等机构，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是由上海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是临时性的，一旦当地社团的首领来接管，我们就立即退出。委员会所作的第一个决定是批准建立新厨房。

七

1942年4月，重建复兴委员会开始与各营地里的难民一起把兆丰路营地周围几英亩的土地改造成菜园。在一个吃不饱的年代里，这些人展现的精神是惊人的。我们也请职业培训组织[2]到难民营开课，但这个组织坚持要年轻人到他们办的学校里去上课。

1942年4—6月份，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营地房舍严重破旧需要修缮，但因资金缺少未能如愿；难民们住处充满污秽和虱子；春夏伤寒流行，医院人满为患。每天有几百人申请进难民营，有些在外的难民比营内的难民更

1_霍瑞斯·嘉道理，是嘉道理家族的代表，伊利·嘉道理之子，劳伦斯·嘉道理之弟，积极参与救助犹太难民。

2_职业培训组织，简称ORT，是专为犹太人进行职业培训的国际组织。

需要帮助。我们必须对困难情况重新调查，但手头资料数字都是过时和不准确的。幸而我们找到负责住房问题的委员，中欧犹太协会的卢茨·瓦赫纳先生，他在我们的指导下学得很快，最后把接纳入营者及有关调查的事务管了起来。我们解雇了原来管账的人员，雇用了难民中一个称职的会计师埃德尔，以杜绝账目上的纰漏。列文斯皮尔负责指导园艺计划。布拉恩利用他与日本宪兵的关系帮我们随时取得搬运东西的许可证。从公共租界过桥运送几乎任何物资到虹口都要有许可证，包括每天必须的面包。我们得到了在沪公谊会（贵格教派）的全面协作，他们在熙华德路容纳1 000人的最大的难民营内工作，教导难民们自己进行民主管理，开办英语课和组织讨论会等。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忍受饥饿的年代里，难民社团中有如此之多的活动和生活情趣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这一实践使人确信：要是钱款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要是经管资金的人对难民更关怀些，这个小群体在得到温饱后能干下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八

在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总部来电嘱咐我们停止一切联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明白上海的犹太人只能靠自己了。在沪的犹太富豪现在成了敌国侨民，也不能指望他们了。小额的个人捐款已成为必要，每个人都应为之捐赠。瓦赫纳想出了一个称之为“监护职责”的主意。估计每月50元（中国货币）就够一个难民糊口，犹太社团中每一承担“监护职责”的人每月捐献50元以救助一个难民。

这里我要提一下佩雷茨。1942年2月，犬冢大佐勒令关闭了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把该委员会的资金交给佩雷

茨先生。此人是个声名狼藉的德国难民，从1937年起就与日本人勾结，出售难民许可证给那些想让亲戚移民来上海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海对外门户敞开，根本不需要许可证。他是犬冢大佐的办事人员，犬冢总是邀他出席委员会会议，我们也不好不让他与会。不过佩雷茨在代表难民而作出的努力方面也起了相当有建设性的作用。他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资金用于分发牛奶、煤，补充救济和资助幼儿园。

九

到了6月份，经费困难又趋严重。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贷款最多只能维持到9月末。两家医院每月要耗费5万中央中储券，内部问题重重。我们觉得，与当务之急相比，维持这两家医院是不必要的和耗资巨大的，我们与上海总医院联系，与医院院长意大利人维奥商定，在该院同意接收我们的病人后就把两家医院的开支从预算中砍掉。截至7月1日，所有未出院的病人都转移到了上海总医院。

同时我们又向瑞典、土耳其、葡萄牙和瑞士等中立国发电报，要求汇款。1943年，分别收到斯德哥尔摩救济欧洲犹太人组织、里斯本犹太社团委员会汇来的总数相当于977 716元中央储备银行券的瑞士法郎，稍微缓解了面临的急难。

我们觉得阿什肯纳兹社团没有理由把他们的救济仅限于帮助波兰难民，就要求他们参加资助德国难民的“监护职责”计划，但社团主席托帕斯先生拒绝考虑。这在该社团中引起了争议，一度严重到分裂的地步，甚至闹到一家中兄弟反目互不理睬。与托帕斯先生意见相左的一批人自己组织了中欧难民委员会，负责募款救济500名德国儿童。我们觉

得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表明了俄国犹太人社团对他们的德国兄弟承担了部分责任。

十

7月，我们正式提出辞职，把事务交给瓦赫纳先生等人，他们已能自己处理行政工作了。我们允诺只要能自由活动就一定给予帮助。这时日本占领当局反西方情绪明显高涨，从东京新来的宪兵军官每天光顾虹口地区。犬冢大佐已经离开上海，取代他的实吉大佐对犹太人问题不像他那样感兴趣。某天，佩雷茨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对犹太难民策划一场灾难性的事件，将把难民装在船上驶到海上去沉掉，要我们想对策。我们从其他可靠来源处也听到了同样消息。

接着好一阵子未听到佩雷茨的音讯，直至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斯皮尔曼、海伊姆（曾被捕获释）、比特克与佩雷茨及其日本朋友都被宪兵抓了起来。听说佩雷茨和他的日本伙伴在斯皮尔曼那里召集被捕的人集会，告诉他们日本人要除掉犹太难民的计划[1]。他的目的何在至今仍不清楚，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日本陆海军与宪兵确实开会讨论了关于遣返犹太难民的计划。布拉恩莽撞地向宪兵首脑询问此事，结果把他们私下开会的事泄露了出来。宪兵首脑对尚未确定的计划过早曝光勃然大怒，下令把这些人抓了起来。

斯皮尔曼等人没几天就获释了，他辞去了委员会中的职务，以免与难民问题沾上边。这时我们感到有必要组织一个当地的委员会来处理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事务。由于布拉恩与日本人的关系，让他出任主席最适宜，瓦赫纳等几个我们信得过的诚实可靠的人都进入了委员会。此前不

1_此处提到的计划指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代表梅辛格上校1942年向日本占领军提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要求日本当局将上海犹太人全部除掉，也称“梅辛格计划”，后因种种复杂原因未能实施。这里所说的“日本伙伴”可能指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此人同情犹太人，将“梅辛格计划”告诉犹太社团，结果被捕遭严刑拷打，后被押送回日本。

久，普尔弗马赫先生、西尔伯斯坦博士集中了一些境况稍好的犹太难民组成一个叫作厨房基金会的委员会，两人都是小有资产的来沪难民，已在商业上取得了立足之地。基金会由从维也纳来沪的波兰籍人贝尔格拉泽担任名义上的主席，他们俩是实际决策人。两人都是精明的生意人，处理所有的问题带有“普鲁士作风”，除了他们自己和亲信外从不肯让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厨房基金会计划发起一个“监护职责”运动来筹款，中欧难民委员会接管了供养500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工作。我们已唤醒了所有的人，正在发掘所有救济难民的潜在资财。

十一

风声越来越急，我们面临着马上要被遣返回国的前景，在临行前我们必须为救济工作作好安排。我们赶紧召集厨房基金会、中欧犹太协会举行紧急会议，提议他们分别接管膳食和住房工作，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则以其名义借款，按照需要支付基金。会议持续了4小时，中欧犹太协会回绝了我们的要求，厨房基金会在退席商议后接受了膳食和住房两项工作，实际执行上海救济难民计划。

遣返令在临动身的那天撤销了，但我们在一周内就与厨房基金会发生了摩擦。在所有的银行存款转给他们后，他们表示不需要瓦赫纳了，并把我们打算留任的百来名雇员全部解职。我们指出原来说定移交后须在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同意的基础上展开工作，但对方一意孤行。鉴于没有别的组织会出来接管，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必须承认，他们有志于救济事业，工作非常努力，确实在当地募捐到比以前募集的更多的钱。不管怎么说，救济计划仍然在执行。

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仍然在募款。1942年秋，阿什肯纳兹社团的J.施里罗先生来找我们谈借款的事，我们从他那里以大大低于官方汇率、仅3元中储券兑1瑞士法郎的代价借到了相当于10万瑞士法郎的中储券，因为除他之外无人可借这么大的数额给我们，而救济资金已日趋枯竭。

12月5日，英美侨民一清早醒来吃惊地发现日本人已开始拘留敌国侨民。我们估计在一两天内也会遭拘留，就委托比特克先生代替我们，继续与施里罗先生谈判再借贷40.5万瑞士法郎。我们把上海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借款限额定为21万美元。使我们极其惊愕的是：当天傍晚得知施里罗也被拘留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向他借钱了。

当月，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出资建立的新厨房正式开张，由厨房基金会出面举行开张仪式，许多日本官员出席了仪式。面对日本人反英美情绪的激化，我们被劝说不要出席，当时我们作为敌国侨民臂上戴着红袖章。

西格尔于1943年1月3日被捕，幸而我尚是自由之身，可以处理完借款事宜。我以6元中储券比1瑞士法郎的比价借到了相当于40.5万瑞士法郎的中储券，并与当事人商定不让社团和委员会知道此事，由比特克先生拿去投资，用投资收入作为无名氏的捐款送给美犹联救会，让难民得到每一分的利益。因为当地社团已收到鼓励就地募款，为了免得助长他们的依赖心理，还是不告诉他们为好。

十二

1943年初，我们通过机密的消息来源获知有一个把犹太难民隔离的计划，这是日本在沪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

果。2月6日，《上海时报》上登载了一篇极丑恶的典型反犹文章，点了亚伯拉罕家族、海伊姆家族、维克托·沙逊爵士和许多上海著名的犹太富豪的名，提到他们如何靠贩鸦片和其他不光彩的手段致富，把这些人作为国际犹太人的典型例子。2月18日，报纸和电台都宣布了设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的通告，从1937年起来沪的所有无国籍者必须限期迁入指定地区[1]。通告在猝不及防的上海犹太人中无疑是扔了一颗炸弹，这意味着那些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商业上已立足的人必须清偿产业，搬至不到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平方英里的“隔离区”去，我们的难民营和厨房正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对于经过了如此之多的苦痛的难民来说，这似乎是最后一个难关，有趣的是难民团体对通告泰然处之，远较俄国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镇定，这两种人首次面临威胁。有些难民变得很歇斯底里，但大部分难民只把它看成是经受重重打击后的另一次打击，他们总的态度是，盟国已快赢得战争胜利，只要勒紧裤带捱过这段时间，就能盼到胜利之日。我必须对大多数难民所持的态度表示赞扬。

23日晚，主管搬迁事务的日本官员久保田在犹太俱乐部召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团开会，告诉几百名与会者，发布这一通告并不反映日本人民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住房与食品供应问题严重，必须对几千名无国籍者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他呼吁俄国犹太人与他合作，实际上他的讲话是一份最后通牒，要么与日本人合作，要么由日本人用他们的方式来处理。我接到的报告是日本人将把这个计划推行到底。

久保田同意厨房基金会继续活动，允许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如同以前一样，以总部的名义贷款。然而，日本人不

1_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在虹口设立“无国籍难民”特定居住区，限令1937年以后来抵沪的“无国籍难民”（即来自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在一个月内迁入该地区。

想与除了俄国犹太人社团外的任何其他组织打交道，为此组成了一个上海阿什肯纳兹社团救济会[1]。日本人只跟这个救济会打交道，该救济会转而与厨房基金会和上海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打交道。

上海阿什肯纳兹社团救济会感到必须单独从该社团里募款，用以建造营房和修葺房舍，为搬迁到“隔离区”的人员提供额外的住房设施。至1943年8月，该会已募捐到一笔150万元中储券的钱款。救济会营建的房屋净赚到一笔极可观的收入，因为迁入“隔离区”的人员至少90%都付得起房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房产的收益减少了，难民穷困，难以付租。9月间，久保田下令所有供难民用的经费都要转交阿什肯纳兹社团救济会，这就是说，厨房基金会在当地募到的所有经费必须转交给救济会。这时厨房基金会已成功地争取到900宗“监护职责”，每宗“监护职责”的捐助款从每月50元中储券增加到100元，的确干得相当好，显示了当地社团在救济工作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同时，上海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募集的经费也必须交给阿什肯纳兹社团救济会。阿什肯纳兹社团又向其成员推行了一种税收制度，规定每人要向社团救济会交纳税收，为维持难民的生活作出贡献。

据统计，在8月1日时有16 000人住在“隔离区”，其中至少有1万人需要全面救济或补助，但当时的经费只够供给3 600人每天一餐，阿什肯纳兹社团救济会计划在短时间内增加到5 000人。此外，还有约2 870人住在我们5个营地内。有4 669人每天领取6盎司面包的救济（包括一些每天可供给一餐的人和住在我们营地中的人）。阿什肯纳兹社团救济会估计，若要继续维持上述开支每月将需要100万中

1_上海阿什肯纳兹社团救济会，简称SACRA，系日本当局设立“无国籍难民”特定居住区后建立的救助犹太难民组织，以阿什肯纳兹（俄国）犹太人为主，在与日本当局打交道时发挥了协调各救济组织的作用。珍珠港事变后，因日本与苏联签有中立条约，俄系犹太人仍享有“中立国公民”地位，所以可发挥“敌国侨民”英美籍犹太人和“无国籍难民”德奥波犹太人无法发挥的作用。

储券。他们预计每月能筹集40万中储券，希望上海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能提供余下的预算。

从1942年8月8日厨房基金会开始运作至1943年6月30日止，基金来源情况如下：

厨房基金会本身（监护职责和一次性捐款） 17%

来自难民的收入（某些难民交付最低限度的面包费和食品券费） 14.75%

上海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 59.5%

中欧难民委员会 8.75%

让所有无国籍侨民在5月8日前迁入“隔离区”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把截止期拖长到1943年8月8日。在此日期之后，有特殊情况还可有例外，最多再延长3个月。1943年8月中，仅有170个家庭、60名医生、30名病人和老人以及80名其他身份的人得到例外对待，可暂时住在“隔离区”外。难民如能向无国籍侨民办事处证明有特殊需要且不违背“大东亚利益”，可取得通行证在白天离开“隔离区”去办事。8月份有7 000人申请通行证出入“隔离区”，只发放了3 000张有效期为3个月的通行证，700张有效期为3星期的通行证，上面注明可往何地、何时必须返回。发放通行证成了“勒索”，通行证可以用钱买到，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后不发任何通行证。

1943年2月25日以后的事态发展是我间接获悉的，这时我已在拘留中。在我被遣返离沪之前，比特克先生终于同意正式成为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委员，希夫林先生也进了委员会。至此，上海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共有6名成员：主席布拉恩，秘书格卢克曼，财务主管比特克，委员兰格、希夫林、瓦赫纳。但实际工作都是比特克、格卢克曼、兰格做的。他

们往往冒着自身的危险，忠于职守，不知疲倦地工作。

战争结束之时，这些历尽劫难的人们终于冲破长夜迎来了曙光。战后，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和红十字会是最早进入远东地区展开救济工作的，但我坚定不渝地相信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将在救济上海的难民中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一委员会已成为上海21 000名难民生活中的一支有生力量，所以我们被再次召回上海，继续向他们伸出援手，积极帮助那些准备离开上海的难民。

十三

希望这份报告提供的情况能对当时愁云密布、纷乱复杂的局势有所澄清。我真诚地觉得，为拯救尽可能多的难民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不利条件太多了，除了日本占领者，上海的一些犹太人社会觉悟不高，对社团无责任感。加之还有一批吃不饱、营养不良、意志特别消沉的难民。如果战争再持续两年，我想其中的半数将再也不能恢复过来。不过，谁知道日本人在不断打败仗后会怎么对待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呢。出于对日本人的了解，我敢斗胆说“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们的唯一希望，诚如各国人民的希望一样，都寄托在盟军的胜利上。

（摘译自劳拉·马戈利斯所写“在中国上海活动情况报告 1941年12月8日—1943年9月”[Laura Margolis: *Report of Activities in Shanghai, China, from December 8, 1941 to September 1943*]，编者加了若干注解。）

柴田回忆自己因暗中支持犹太人而被捕的经历

我与犹太社团以及上海的其他外侨如英国人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因此有人一直指责我对“敌对人士”太“友好”。在犹太社团中，我与亚伯拉罕 (Rubin Abraham) 和海伊姆 (Ellis Hayim) 关系较密切，来往也较多。

在上海的日本官员中，比较了解犹太问题，并与犹太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是海军陆战队的犬冢大佐，因此许多涉及犹太人的问题往往请他处理。他与亚伯拉罕和海伊姆的关系也不错。在他离开上海调往海军后，宪兵队填补了这个空白，对犹太人的态度明显变坏。

1942年夏，德国人来到上海，向我们提出了“解决”犹太人的计划。我记得，是约瑟夫·梅辛格 (Josef Meisinger) 和普特卡莫 (Putkammer) 提出了具体的细节。大家都知道梅辛格，因为他在东京工作过，但不太知道普特卡莫，我也不太清楚此人的详细情况。他们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先把上海的犹太人“控制”起来，然后把他们丢到无人居住的小岛上“自然消亡”。后来又有各种说法，如在崇明岛建立集中营关押犹太人，将犹太人送到黄浦江上游的废弃盐矿做苦工等等。这些说法我都听到过，但我并没有看到过书面的计划。不过，我可以肯定存在这个计划，因为对我讲这个事

情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而且他们中有人还参加了与梅辛格等人研究“计划”的会议。

后来，情况更趋严重，因为宪兵队对波兰犹太人“闹事”[1]十分恼怒，准备对犹太人“采取措施”。我不清楚他们是否要按照梅辛格的计划做，但这种可能无疑存在。于是，我就把梅辛格来沪策划屠杀犹太人的事偷偷告诉了我的犹太朋友。我们还在斯皮尔曼家里开了一个会商议对策。参加会议的有托帕斯、比特克、佩雷茨、卡迪格、考夫曼。

几天后，我们都被宪兵抓了起来。据说，有人走漏了风声，听说此事的人便去向宪兵首脑询问，结果把我们私下开会的事泄露了出来。宪兵首脑对尚未确定的计划过早曝光勃然大怒，下令把我们抓了起来。当然，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我的“罪责”最为严重，被指控犯了“叛国罪”。我在提篮桥监狱被单独关押了40天，还遭到了拷打。听说参加会议的其他人都被抓了，托帕斯也遭到了拷打。我在监狱中还见到了海伊姆，我们当然不敢说话。他并没有参加会议，不知为什么被带到监狱，也许他们要询问他与我的关系，甚至他与犬冢大佐的关系。

最终，我被押解回日本。他们警告我，50年内不得回到中国，否则将被处决。也许，他们认为50年后日本还在统治中国。实际上，3年后战争就结束了。所以，我当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中国。

这里还要告诉你，我的夫人是中国人。战争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没有举办婚礼。直到战后，我们才举办了正式婚礼。我想，这也许是宪兵队一直对我“另眼相看”的一个原因。

(摘自美国学者马文·托克耶采访日本原驻上海副领事柴田 [Mitzsugi Shibata] 的记录，采访日期为1976年5月14日，地点是东京。感谢马文·托克耶将此材料提供给本书编者使用。)

1_波兰犹太难民一直坚持自己不是“无国籍难民”，因为有波兰流亡政府存在，日本当局对此十分恼火。

“满洲国”外交官为犹太难民发签证

王替夫[1]

（一）

1939年5月1日，与往年的这个日子一样，纳粹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劳动节游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游行队伍中看不到任何佩戴黄色六角星的犹太人了。在游行者们的叫喊中，“打倒犹太吸血鬼！”“把犹太猪赶出去”之类的口号比过去喊得更响了。

这时，我刚刚从西班牙回到柏林。当晚，吕宜文公使便用电话通知我翌日及时到公使馆去，说有重要工作向我交代，我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在第二天上班了。公使要求我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为离德的犹太人办理“伪满洲国”的入境签证，同时详细地讲述了此前两天里宾特洛甫[2]和外交国务秘书威兹萨克召见他的经过。外交部召见“伪满洲国”外交使节是不常见的事，特别是在德国的外交事务成堆的繁忙时刻，两位国家外交大员同时与“伪满洲国”商量问题更不寻常。

这次召见名义上是两国共同协商德国境内犹太人的转移问题，好像德国政府的排犹政策是与“伪满洲国”共同制

1_王替夫1938—1944年曾在“满洲国”驻德国公使馆任外交官。

2_里宾特洛甫是当时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部长。

定的。软弱却不乏狡黠的吕宜文知道这是他们有求于人时的说辞，实际上不过是要我们执行他们单方面制定的排犹计划。为此，德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出境办事处”，专门负责与有关国家驻柏林外交机构协商由这些国家接纳德国犹太人问题。但是这一工作并不顺利，许多国家不愿意承受这份负担，甚至不允许私自逃离的犹太人在自己国土上滞留，所以在没有明确犹太人出境后的最后归宿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使领馆拒绝给他们办理入境签证。只有美国政府在当地犹太公会的斡旋下同意接纳。[1]援救办法是由德国犹太人在美国的亲友出资400美金，充当一名犹太人的旅费，由美国犹太公会转到德国，发放给出境者本人。当时，已被德国人剥夺得一贫如洗的犹太人无法拿出这些资金，可能受到救助的人也仅限于在美国有亲友关系的人。应该说，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开明而富有远见的，它知道这些难民中的许多人的价值，他们将为美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补充新的血液。事实证明，这种效果很快就发生了，某些世界一流的犹太籍科学家赴美国后，促成了原子武器在美国的早日诞生，成为迫使轴心国投降的巨大威慑力量。

由于海路漫长，德国方面计划让出境的犹太人通过苏联进入满洲，再从海路前往美国。苏联方面已经同意合作，里宾特洛甫谦和地说：“就看你们有什么意见了。”

德国人的诚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战时的经济萧条使德国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已经被纳粹榨干了油水的犹太人不但不再能创造财富，反而需要他们供养；当时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排犹情绪，作为中立国的瑞士也无力接纳大批涌入的犹太人口；德国的排犹政策招致美国不满，使德

1_美国起初是同意接受犹太难民的，但后来也对犹太难民关上了门。所以拿到“满洲国”签证的犹太人大多并没能到达美国，而是去了其他地方或是滞留在哈尔滨等地。


伪满外交官王替夫

国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把犹太人驱赶到美国也与它要把犹太人赶出欧洲的目标不谋而合。使吕宜文不满的是德国方面此前从未就这个问题与“伪满洲国”协商，按照程序，他必须向国内报告，征得同意。但事情已摆在眼前，他已明知国内不会对此持有异议，只好不计荣辱了。他向两位德国外交大员说：“我个人认为敝国应在这件事上予以合作，但是尚须容我报告敝国政府，现在不妨先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他知道，一旦国内答复，签证就成了公使馆的本职工作，想推也推不掉。

“伪满洲国”未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另设领事馆，签证工作只好集中在柏林公使馆。吕宜文考虑再三，最后当着德国人的面把我推荐出来，让我兼任领事，全面负责为出境犹太人签证的工作。由于我精于俄语，又有与苏联人交涉的经验，当时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协调，所以他认为我是理想人选。里宾特洛甫与威兹萨克对我印象较深，对吕公使的推荐十分满意。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工作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一旦被它撞上就会陷入没有尽头的忙碌中，很难分身再去做一些轻松的工作了。所以公使对于在我没有回到德国的时候便决定交给我这个苦差事表示歉意，特意向我作了这番解释。

虽然我长期受到国外不健康环境的影响，并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自己人格的事，但是从小就进入我内心的仁义观念并未泯灭。亲眼看到纳粹的倒行逆施早已使我对德国的仰慕之心破碎。当时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我已经感到他们对犹太人的做法十分过分。我也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如果犹太人继续留在德国，处境只会越来越糟，为他们寻求自由而尽一份力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于是，我的内心受到鼓舞，痛快地接受了这份签证工作。它可能是我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唯一可以感到宽慰的事。

公使馆很快就得到国内外交部的批复，我急忙带朗格尔小姐持批件到德国外交部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商讨签订这一跨国行动的议定书事宜。德国外交部亚洲司对我们的工作效率表示满意，立即起草议定书文本，并于翌日签字。与苏联方面的交涉，涉及越境人数、安全保证及卫生检疫等具体事项，须认真协商，办理颇费时日。当时苏联正往德国运送大量的煤炭、矿石、木材及毛麻原料，铁路交通线十分繁忙，好在德国运往苏联的物资有限，两国政府在犹太人过境问题上已达成意向性协议，所以最后还是在议定书上签了字，只是在过境名额一项不能及时澄清，代之以"视接收国的安置能力和苏联铁路客运计划所允许的运输量而定"这句笼统的话。剩下来的问题就是与美国驻柏林外交代办和美国犹太公会的代表讨论具体的操作办法了。

这时，柏林市对犹太人的大清理正日甚一日，反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犹太人在白日已不能外出，活动只限于早晚，即便在晚间，带着黄色六角星标志的犹太人也越来越少见了。美国犹太公会派到德国的代表托马斯匆忙地往返于美国代办处和"伪满公使馆"之间。根据德国外交部的要求，犹太人离境时不准携带任何财物，只准携带10马克现金和除了身穿的衣服之外的一套替换衣服和一双鞋。托马斯先生接受了这一条件，那时的德国犹太人已经一无所有了。双方约定，出境犹太人的护照由德国犹太公会或美国犹太公会驻德代表集中起来，分批到"伪满洲国"驻柏林公使馆办理；经"伪满洲国"驻柏林领事馆验证，见有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签证即可给予签证，并注明途径"满洲国"的字样。

还约定，过境犹太人不得在“满洲国”滞留；“满洲国”方面不得克扣过境犹太人的财物。

6月初，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我立即请朗格尔小姐通知柏林犹太公会和托马斯先生，6月10日开始办理签证。从此，我的主动活动便转移到办理过境犹太人签证方面来，偶然遇到上司派下来的其他临时性工作，也在办完之后立即归来，并保证不误出境犹太人的行期。在公使馆一楼的套间，朗格尔小姐在外面的一间受理签证，遇到疑难问题便到里间向我请示处理意见。

在开始的几天，托马斯先生每天只拿来10本护照，柏林犹太公会带来的也不多。我曾为此感到诧异，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怎么会这样？托马斯耸着肩膀说：“领事先生，以后会多起来的！”果然，很快就从每天三四十本增加到五六十本，到6月底，已经办理了1 000多份。由于我的催促，从7月初开始，每天都受理100多份签证。下班前办不完时，我便征求秘书的意见，问她是否同意加班工作，朗格尔小姐从未拒绝过。我不知时局会发生什么变化，只知道街上已有运兵车隆隆开过，不时有犹太人被逮捕，不知押向何方。因此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我只有一个想法：争取多办一些签证，放走一个是一个，我无暇记取那些犹太人的名字，而只顾在护照上签字和盖章。一晃两个月，我们已经办理了近7 000份签证。

9月1日，德国军队冲破德波边界，向波兰发起猛烈的攻击。这一天也没有犹太公会的人到公使馆来办理签证。吕公使通知我，里宾特洛甫曾召见并暗示他不必再给犹太人办理过境签证了，政府准备有步骤地建立一些犹太人居住区；日本人也要求按德国人的意见办。这样，一直担心

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种屈辱感骤然涌上我的心头，心里想：你们德国人催办时我们就得照办，你们让停下我们就得停下，这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吗？我向吕公使说：“我们并没有得到国内的通知，我们国家能替他们背上拒绝签证的黑锅吗？”

吕公使听了我的话，收起了笑容，他没有忘记自己是“满洲国”的外交代表，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道：“这样吧，在我们未接到国内的指示之前，继续办理签证，但是从现在起要悄悄地进行，尽量不让德国外交部、秘密警察和日本人知道，我则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德国人出尔反尔是理亏的。”

为了避开江尊纲一参事官的耳目，我暗中指示朗格尔小姐在每日外出或下班后，到犹太公会去取护照，在晚间办理签字后，第二天送回并取回新的护照。托马斯先生对我们此举十分感激，又担心我们遭遇不测。当朗格尔把他的这种担心转告我后，我又让朗格尔转告他，让他放心，因为我毕竟是一名受保护的外交官，盖世太保也奈何不了我。但是托马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一次带几百本，而是一天几本、十几本，有时一周才带回几十本。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也不再强求。这样，从1939年10月初开始，到1940年5月末，我们又断断续续地签了近5 000本护照。

德国的战争政策已经大白于天下，种族迫害也更加明目张胆起来。德军在1939年9月17日完成对波兰西部的占领后，东部已由苏联红军进驻，波兰的政权便宣告结束。于是由党卫队直接执行的对波兰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的迫害便开始了。10月初，有30万犹太人从刚刚被合并到德国版图的波兰西部省份迁移到维斯杜拉河以东，成为

纳粹灭绝计划的牺牲品。由于枪决和绞刑已经不能满足纳粹所期望的效率，奥斯维辛集中营于1940年2月被建立起来。众所周知，后来仅在这里就有250万犹太人惨死，另有50万人在饥寒交迫的转移途中丧生。与此同时，在德国国内的慕尼黑等地也建立了集中营，成为集中残杀德国犹太人的场所。

4月初，德军开始从西线进犯邻国；在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之后，又迫使荷兰与比利时于5月份先后投降；德军的炮口已指向法国。在海上，德国与英国于1939年末就开始了交火。英国除了在本土的沿海布防外，还以巡洋舰队和鱼雷封锁了北海，并控制着地中海，德国则在波罗的海布防。欧洲大陆与海外的交通完全断绝了，通向西伯利亚的铁路成了欧洲犹太人逃亡的唯一通道。而美国在波兰受到德国进攻后便宣布对欧战持中立立场，所以去美国成了犹太人的主要选择。[1]在1940年5月末以前的一段日子，是我们竭尽全力办理出境犹太人签证的日子。由于对犹太人的恐怖屠杀漫及东欧，“伪满公使馆”也不敢一意孤行了。刚进6月，吕公使接到国内命令，赴新近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递交国书，他便立即要求我与他同往，结束签证工作。于是，我在办理了大约1.2万名犹太人的过境签证之后，被迫放弃了这一工作……

（二）

在1940年之前，从德国直达中国东北的铁路并不是欧洲犹太人逃离德国的唯一通道。当时海岸线尚未封锁，也有不少犹太人是通过海路辗转逃离的。其中既有波罗的海国家的犹太人，也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犹太人，还有德国

1_实际上此时美国已对犹太难民关门，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美国。

犹太人通过中立国家瑞士再到沿海港口逃走的；有的办理了合法签证，也有私自越境的。尽管如此，能够逃脱灾难的仅仅是少数人，大多数犹太人仍然只能听凭德国占领者把他们驱向死亡的深渊，特别是那些生活贫困，在国外没有亲友又得不到救助的人。

我所能做到的仅限于加快签证的速度，打电话催促犹太公会尽可能多带一些护照来。我知道有许多求救无门的犹太人将会因没有护照而不得不留在德国，并为自己无计可施而苦恼。尽管如此，也出现过某些个别的例外。我尚能比较清楚地回忆起下面的一件事。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正在加班工作，朗格尔小姐来到我的房间说施洛特太太想见我，我示意她请施洛特太太进来。施洛特太太是公使馆的佣人，一位很能干的德国老太太。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没请过假或提出过什么要求，总是尽力地把自己应该做的和别人没做完的事做好。平时她遇到我，除了问候之外，从未说过别的。

她轻轻地走了进来，小声问：“王书记官，您还在忙啊？”我见她那忧伤的样子，知道她绝不是来提醒我下班休息的，看来她早已知道我们每天下班后在做什么。

“施洛特大妈，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我问。

她不好意思地说：“我有件事情想求您，不知您现在有没有时间。”

我欠起身，请她坐在办公室桌旁的沙发上说：“有事就说吧，我会尽力帮助您。”

这时，老太太低下头，一边用披肩擦着眼泪，一边说：

“说来这件事已经在我心里憋了很长时间了，只是见您特别忙，没敢进来打扰您。王参事官，有一位犹太人，一位老

太太，我到公使馆以前在她家里当佣人，整整在一起生活了20年。那可是个好人家，从来没有把我当仆人看待过。现在，她家的财产被政府没收了，老头子被抓走了，儿子逃跑了，听说去了美国。现在只有老太太一个人，还不准出门，生活太困难了！有时我偷偷送些吃的和用的东西给她。”

施洛特太太哭得越来越伤心，抬头看着我，继续说：“这样下去怎么办啊！盖世太保还三天两头地去找她的麻烦，她不饿死也得被他们折腾死啊！王参事官，您是位善良的人，帮帮她吧，我求求您了，上帝会保佑您的！”说着，她的一条腿已经跪在地上。

这使我不知所措。老太太的话确实打动了我，我也知道她在求我为她过去的主人办理出境手续。可是这太难了，一个在逃犯的家属，还牵涉一个在押犯，即使是吕公使也无能为力。可是我又不能这样回答她，便急忙把她扶到沙发上说：“施洛特大妈，不要这样，我们坐下来谈。不过这件事很难办哪。”

“这我知道，但是只有您才能救他们！您帮帮忙吧，上帝会保佑您的！”看来，除了上帝，老太太说不出别的了。我心里想：“犹太人的上帝在哪里呢？现在德国人的上帝是希特勒，他是要让犹太人下地狱的，怎么才能撬开这地狱的门缝呢？”但是我还是安慰她说：“施洛特大妈，您不要这么伤心地哭了。我答应您，但只能去办办看。如果只是办理去“满洲国”的护照，这没问题；可是她丈夫的事就麻烦多了，我要与公使谈这件事，您看行吗？”

听了我这番话，老太太惊喜得不知如何是好。她猛地站起来，大步走向房门，像是急于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往日的主人。但是走到门前，她又突然停下，想到自己还没有

谢过我，便转过身来，用她那因看到希望而发亮的眼睛望着我，嘴角也激动地抖动着，用右手在胸前划着十字，语不成声地说：“谢谢您，我……谢谢您！”

施洛特太太走后，我关上房门，靠在门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想着，是什么力量让我作出那不理智的回答呢？是人类的情感，是各个民族善良的人们共有的怜悯之心，它的力量竟如此强大。可是，我能办得到吗？

这件事让我过了一个沉重的星期天，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总是想着这件事。星期一刚上班，我就向吕公使谈了这件事，请他帮助想想办法。公使听后，有些不高兴，表示在这多事的国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真拿你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但是他说后马上把伊吹参事官找来，让他与德国外交部交涉，请他们与党卫队地区负责人协商释放那位在押的犹太老人，理由是他们这对老夫妻继续留在德国于当局无益，而且是负担。这个理由当然很不充分，而且不宜由“满洲国”公使馆出面交涉。但是吕公使似乎不太在乎这些，原因是日本人在德国人面前比我们有面子，德国也曾有赖于“满洲国”公使馆办理犹太人过境签证，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局曾通过“满洲国”公使馆的日本人伪造的护照给向苏联派遣的间谍办理签证。

此事果然如愿，老人被释放了。吕公使又指示我向国内外交部发报，请求外交部与满铁协商，对这对犹太老夫妻的过境给予特别关照。外交部的批复是，将他们所需旅费由外交部拨到满洲里车站，保证他们到达美国所需数额。这样，只剩下我与美国犹太公会驻柏林的代表托马斯先生办理美方接收的许可了。待这手续完备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为两位犹太老人办理了签证。我尽心操办此事，令朗

格尔这位日耳曼姑娘十分感动，我见她在办理这份签证时眼睛里噙满泪花。至于施洛特太太，她不再流泪，也不再欢愉，而是显出一种虔诚的表情，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在我面前站了很久。作为一名还未满30岁的年轻外交官，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我不知这两位老人是不是平安地到达了美国，只能为他们默默地祝福。后来德国战败了，日本也战败了，我在严寒的西伯利亚战犯营中，还不时想起那位身材高大的施洛特太太——我的良心的导师，猜想着那两位犹太老人是不是还在人世。在后来的年月中，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罪行被逐渐披露出来，每当我面对着一些文献影片中那令人发指的镜头，就会浑身战栗，看到那些穿着我曾十分熟悉的纳粹服装的德国人，不动声色地把成群的犹太人赶进煤气室，让他们惊恐地望着吐射着毒气的管道口发出的末日惨叫，再把那些泥污的尸体从坑穴里挖出来烧成灰烬，我才真正体会到我所做过的工作的意义。它使我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自我愉悦，成为我如此长寿的一个原因。

特别让我欣慰的是，近年来通过媒体，我得知在那个悲惨的年月里，在遥远的欧洲，还有一些人做过与我同样的工作。这虽然是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却使我感到当时并不孤独，人类的良知所向，迟早要归于一处的。

报载1938年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后不久，原中国驻奥公使馆一等秘书何凤山改任驻维也纳总领事。不到一个月，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就已有一批被送到集中营。许多奥地利犹太人想到美国，但美国只收有财力担保的人。英国政府在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下，严格限制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1938年7月，参加法国埃维昂会议的32国，一致决议

拒收犹太难民。何凤山暗地与美国的教会和慈善团体接触，尽己所能地广发犹太人到上海的签证，从1938年5月到1940年5月，使数千名获得签证的犹太人逃离德国到上海另谋生路。[1]何先生于1997年以96岁高龄在美国去世。

这些报道揭示了某些我所不知道的情况，譬如埃维昂会议的决议、阿拉伯国家向英国施压等。也许是由于那时我还未去欧洲之故，而关于英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犹太人出逃这一点我是有所体会的。另有报道称欧洲学者认定何凤山先生只给犹太人签发了1 900多张签证，“是个人拯救犹太人最少的”。我不知那些在犹太人受难时退避三舍惟恐不及的“欧洲学者”们根据什么得出这个数字。我不想为已逝的何先生辩解什么，因为当时连我自己也没有心情统计签证的数字，但是根据报载何先生做这件事比我要早一年，当时纳粹的政策尚以驱逐为主，而具备出境条件的奥地利犹太人又何止数千，“尽己所能”帮助他们的何先生怎么会只为1 000余人签证？在我这个年岁，早已把世间的荣辱置之度外，何况何先生已不在人世，但是作为一名曾经驻欧洲外交官的中国人，本来无须欧洲人鉴定何先生的作为。

我们不是什么“中国的辛德勒”。辛德勒是一位了不起的德国人，但也不必称其为“中国的何凤山”。我们是在数千万同胞遭到侵略屠杀的情况下去帮助遭受同样命运的另一个民族的，倒是有数不清的像施洛特太太那样的中国老百姓解救过无数遭到末日厄运的日本人。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从未把这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功绩。现在，中国人还不时听到来自那个屠杀过他们并被他们原谅了的国家的以怨报德的声音，但是他们仍然不会放

1_此处有误，拿到何凤山所发签证的犹太人均是逃离奥地利，而非德国。他们中部分人去了上海，也有许多人去了其他地方。

弃他们引以为自豪的道德观念。

另一项来自欧洲的报道是，1940年夏天，日本驻立陶宛考纳斯的副领事杉原千亩为从波兰出逃的犹太人签发了8 000到10 000份日本过境签证，因此回国后被解职。当时日本政府从“安全”角度考虑，继美国、英国和法国之后，拒绝给犹太人办理过境签证，苏联占领当局又下达了关闭领事馆的命令。杉原千亩违背本国政府的命令，在自己的居所发放签证，直到他离开立陶宛的最后时刻。

杉原先生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驻哈尔滨外交公署的副特派员，是我1932年投考外交官时的主考官，也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人。他曾亲自将我送到“新京”外交部报到，我们在火车上交谈甚笃。但是从那以后，我便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不知他是何时被派到欧洲去的。虽然他在战后没有经历流放岁月，却在国内陷于穷愁潦倒，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余生。他大约比我长10岁，在十几年前便去世了。现在，除了在他的家乡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园外，没有更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倒是西方人，又是办展览，又是写书，并把他的故事搬上了好莱坞的影片，把那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搅得沸沸扬扬。

（摘编自王替夫口述，杨明生执笔:《见过希特勒与救过犹太人的伪满外交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编者对少数有误处作了修改，并加了若干注解。）

在天津的欧洲犹太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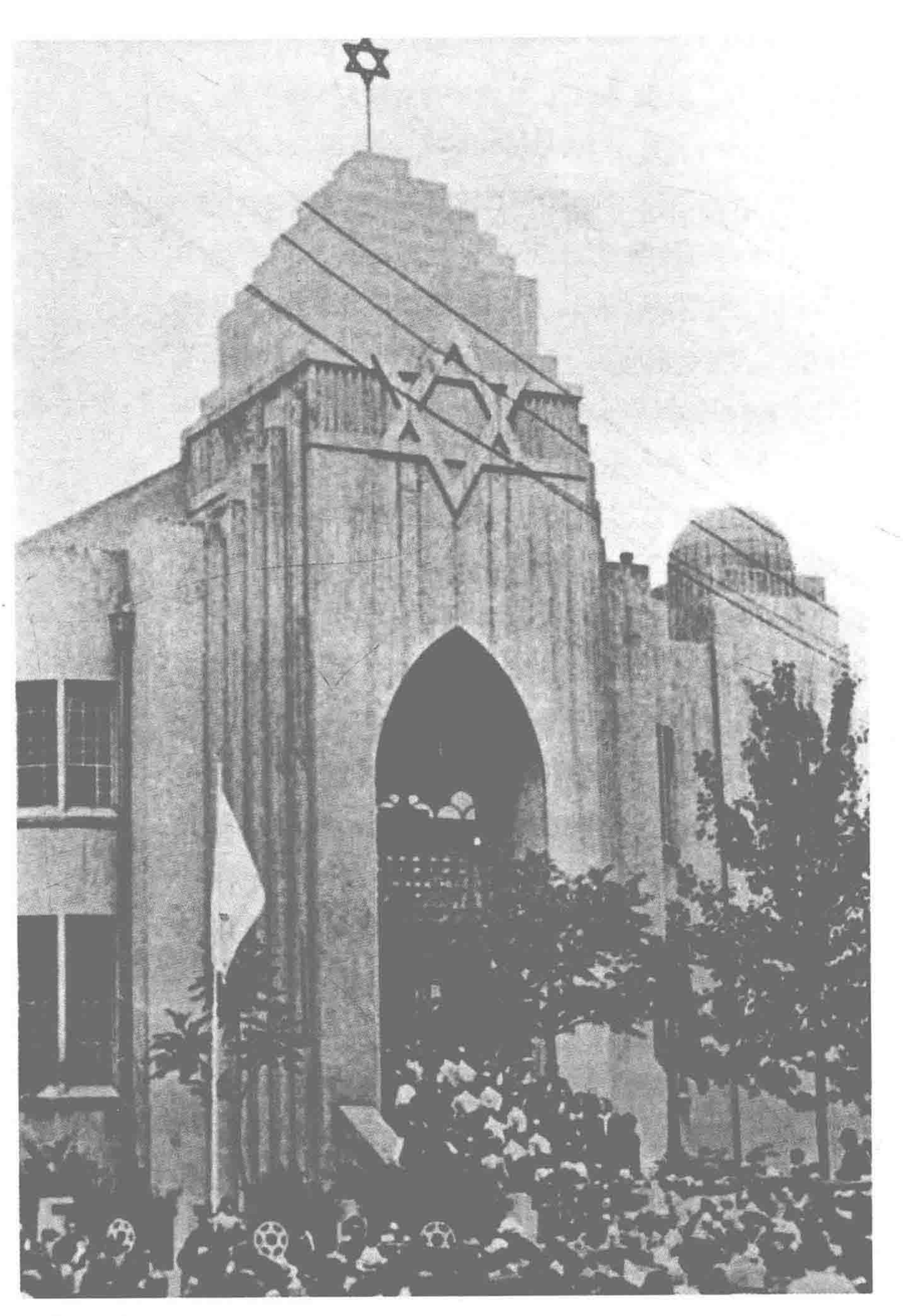
M.W. 贝克曼[1]

1901年，居住在天津的犹太人大约有100人。1920年时，大约有200人。到了1930年，已有500人。到1935年以后，犹太人的数量达到了1 500人。特别是1938年以后，200多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来到了天津。这1 500多人，由大约600个家庭组成，这说明天津犹太社团不大可能成为一个逐渐扩大的社团。除了那200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以外，其余的都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也有少数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不过，他们在天津犹太社团里并不以此来界定他们的国籍和身份。

天津犹太社团里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来津通常是经过两条路线，1940年7月以前，欧洲和上海的海上交通还没有完全割断[2]，许多犹太难民先到上海然后再北上来到天津。他们之所以离开上海来到天津，原因是上海当时已经有太多犹太难民，谋生比较困难；另外，1937年以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犹太人可以从日本占领当局获得许可离开上海到同样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天津等地。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后，犹太人要离开上海变得越来越难。第二条路线是在犹太人进入上海变得不可能以后，柏林某些机构给犹太人

1_M.W. 贝克曼 (M. W. Beckelman)，此人长期研究天津犹太社团，本文摘自他关于天津犹太社团的报告。

2_1940年6月，德军大举进攻法国等西欧国家，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地中海和大西洋均成为战场，犹太难民来华的海路被完全切断。



天津犹太会堂

签发了一些前往圣多米尼哥的临时签证，部分犹太人手持这样的签证离开德国，经由苏联、“满洲国”来到日本人控制下的中国北方，其中一些人来到了天津和青岛等地。开始，手持这些签证的犹太难民只被允许短期居住以便和亲戚朋友短暂见面。后来，他们的签证获得延期，这些犹太人才得以永久居住。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对持证旅行控制得更加严格了，犹太难民几乎不能进入天津或在上海、天津两地来回旅行。所以，1941年以后，天津犹太社团的人数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这200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也先后参加了天津犹太人的主要组织——天津希伯来协会。不过，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名字叫欧洲犹太移民协会，这个协会吸收了所有为逃离纳粹迫害而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德奥犹太难民中大约有20名犹太人接受了天津希伯来协会的帮助，他们所接受到的来自天津希伯来协会的帮助每月大约130 000元国币。

1943年，人们获知大约有7个欧洲犹太难民家庭接受了德国驻天津领事馆的资金帮助，于是难民组织内部发生了矛盾。受援者声称，德国驻天津领事给犹太人援助是因为他是反纳粹人士[1]，因此对犹太人表现出一些同情。不过，大多数欧洲犹太移民协会里的犹太难民认为德国领事的用意十分险恶，不应接受他给的钱。到底谁对谁错，确实很难判断。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那7个犹太家庭被开除出了协会，后来又被开除出了天津希伯来协会。直到1945年，在那7个犹太家庭保证不再接受德国官方的援助以后，他们才被协会重新接纳。其中两个家庭未能实现承诺，后来再一次被开除出去。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否继续接受德

1_有文章称当时德国驻天津领事是反纳粹分子，但也有一些著述否定这一说法。

国领事的援助。在天津犹太社团的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因政治问题将若干家庭开除出社团组织的事件。

除了这次意外事故以外，天津犹太人所经历的困难要比人们想象的在战争期间经历的困难小一点。和上海犹太难民不一样，天津犹太人在日本占领期间的生活相对好一点，因为包括天津在内的中国北方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以后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并没有经历淞沪战争那样激烈的战事。同时，日本人的占领对天津的外国租界破坏不是很大，而大多数的犹太人当时就住在那些外国租界里。到珍珠港事变为止，日本人在天津的统治是文人统治，而不是军人统治。即使在珍珠港事变以后，文官治理在天津仍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在天津的欧洲犹太难民人数很少，纳粹也没有想到要日本人在天津搞什么“最后解决”。所以，上海犹太人经历的虹口“隔离区”那样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在天津犹太人身上。

天津犹太人在日本人占领时期生活相对稳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苏联驻天津临时代表的态度。天津的俄籍侨民(包括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大多在1917年俄国革命前后离开了苏联领土，此后都变成了无国籍侨民。不过，他们均有办法获得苏联领事馆的保护，俄籍侨民可以向苏联领事馆申请苏联国籍。虽然战争期间这些申请没有正式办理，但是苏联领事馆给每一位申请人发了一张证明，证明他们已经向苏联申请了国籍，并且苏联政府将考虑给予申请人苏联国籍。这些证明实际上是把这些俄籍人士，包括俄国犹太人置于苏联政府的保护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也就不能对他们有所伤害了。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虽不属于这一范畴，但无疑也因此获益。

战争结束以后，苏联政府继续执行这个政策，并邀请在中国的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俄籍侨民申请苏联国籍，其中有不少人的申请也被核准了。

(摘编自贝克曼 [M. W. Beckelman]："天津犹太社团"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Tientsin]，载《犹太中心》[*The Jewish Center*]，1946年6月号。部分资料摘自福尔曼 [Leora Shluger Forman] 和斯沃茨 [Monica Morris Schwartz] 所写报告："中国天津的俄国犹太人1900—1950" [*The Russian Jews of Tientsin, China, 1900—1950*]。两位作者是当年居住在天津的俄国犹太人。编者作了若干注解。感谢美国马文·托克耶拉比将此报告提供我们参阅。)

我们的犹太老邻居

李惠荣、葛政荣[1]

从大连到虹口

问：李老师，欢迎您！您是提篮桥附近的老居民，那里曾是犹太难民的聚集区。您好像很早就和父母搬到了提篮桥，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李惠荣：我1938年出生于大连，父亲是一名船员，在船上工作，专门开着从大连到日本的航线。大连，我的故土，是一座繁华而热闹的城市。然而，自1904年日俄战争后，大连先后被沙俄和日本殖民统治，虽繁华依旧，但暗潮涌动。在战争的影响下，父亲的航线也不得不中断了。为了生计，父母带着年仅两岁的我，来到了上海，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问：在您的记忆中新家是什么样的？

李惠荣：我们的新家，在提篮桥地区的唐山路599弄，又名三益村。现在的唐山路看起来其貌不扬，只是坐落在黄浦江边，夹在东余杭路和昆明路之间的一条小路。然而在当年，这条小路还是相当高档的，我们所住的这条弄堂干净整洁，有专门负责卫生的部门做清洁；安全有序，弄堂口竖着一道闸门，闸门外立着带链条的石墩子，不给外来车辆

1_李惠荣、葛政荣，虹口提篮桥唐山路599弄三益村居民，犹太难民的老邻居。李惠荣是1940年随父母从大连来到上海迁入提篮桥的，她与犹太邻居共同生活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有许多有趣难忘的经历。葛政荣是1948年搬来的，时间较晚，但那些与犹太伙伴为邻的愉快往事，却一直深深留存在他的记忆中。两位老人的回忆共同见证了中犹人民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患难真情。

进入。小弄堂里的石库门、铁制的闸门，还有红砖尖顶的楼房，围成了一方乐土。我和父母，以及许许多多不认识的外国人在此避居，躲避门外纷飞的炮火。

唐山路的邻居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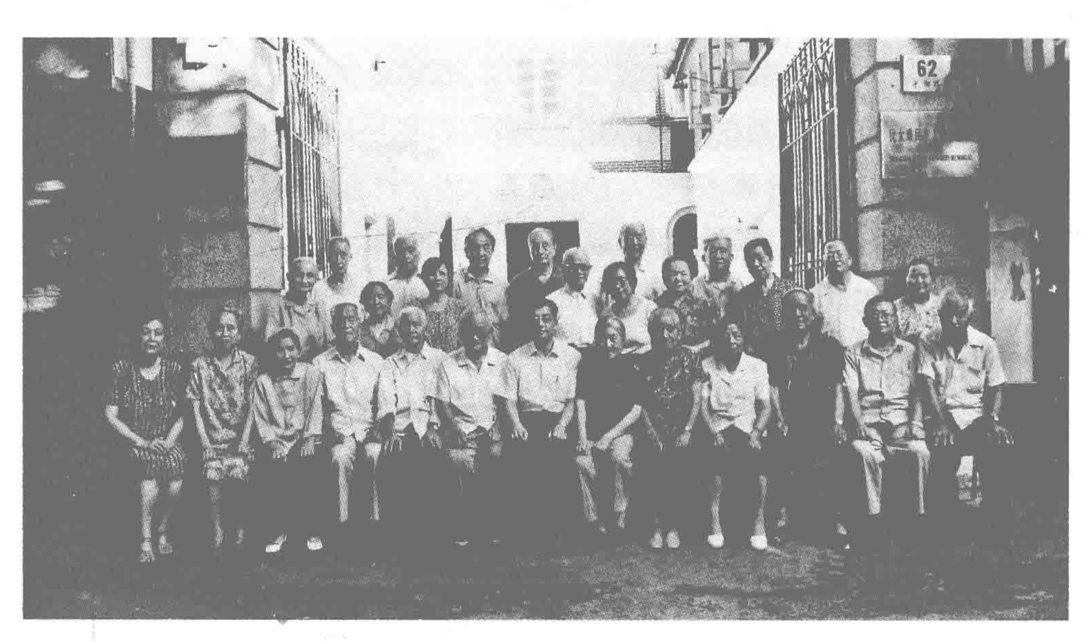
问：您在三益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李惠荣：当时唐山路的弄堂，几乎清一色都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没错，我们所住的这条小弄堂，据说是外国人在1929年建造的，因而在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就有不少外国人住进来了。粗略算算，百户人家中只有不到十户是中国人家，其他的住户都是陌生的外国人。

年幼的我与这些外国人为邻时，并未感到任何不适。他们大多衣着得体、礼貌待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一个点头、一脸微笑就足够消融年龄或者种族之间的差距。弄堂里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外国邻居还开了家面包房，每天在巷口闻到面包的香气，对还是幼年的我无疑是最大的诱惑。

问：有没有您特别喜欢或者相处特别融洽的外国邻居？

李惠荣：与我关系最好的还是我家隔壁的一对外国夫妻。男主人是牙科医生，我时常溜进他们的家中，好奇地摸着家里摆放着的奇怪的椅子（应该是牙医所用的治疗椅），听他用我不懂的语言耐心地给我讲着什么。女主人没有孩子，对我这样的外国小女孩异常地感兴趣。当年的我和其他几户中国人家的小女孩一起在弄堂中玩耍嬉闹，隔壁的女主人看到我们，就会挥手招呼我们，陪着我们一道玩。尽管弄堂外烽烟四起，但是在这个弄堂里我们幸运地得到了可贵的和平和安宁。



2004年，当年犹太难民的虹口邻居与潘光教授合影

胜利后的离别

问：1945年的时候，战争胜利了，当时犹太邻居是不是特别开心？抗战胜利前后，弄堂里的犹太邻居，有什么变化吗？

李惠荣：194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还在家中吃饭的我，突然听到门外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那声音太喧哗、太振奋，我跟父母不由得探出窗口去看个究竟，只见我的那些外国邻居们全都从家里出来了，在小小的弄堂里肆意宣泄他们的狂喜，载歌载舞，好不欢快。这种发自肺腑的喜悦和巨大的欢呼声浪，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欢呼之后的第二天，外国邻居们依旧不改笑颜，弄堂里洋溢着欣喜的气息。光是手舞足蹈已经无法表达他们的激动之情，很多外国邻居拉着我们这些中国小孩合影。跟我关系最好的牙科医生太太也是，她兴奋地带着我和另外两个中国小孩，让我们在台阶前摆好造型，与我们合影多张，之后又自己摆弄相机帮我们拍照。可惜的是，跟她的合影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她专门为我们几个小女孩拍的珍贵照片。

1945年夏天他们的集体狂欢让我毕生难忘，直到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他们都是犹太难民。在欧洲受到纳粹的迫害后，各国避难无门，唯有上海对他们敞开了怀抱。多年的困难窘迫和胆战心惊，终于随着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烟消云散，饱受摧残的犹太难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世人的面前，可以回到他们渴望已久的故乡了。

问：回想起这段与犹太人为邻的岁月，在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您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李惠荣：回想起我与这些犹太难民们为邻的岁月，我不

由得为他们骄傲，在当年艰难的环境中，他们虽为难民，却不改容色，仍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主动融入新的环境，用各种办法为自己的沪上避难生活增添色彩。但是，我更为我们中国人感到骄傲，在世人都视犹太人为洪水猛兽之时，我们以一颗包容和善良的心接纳了他们，为他们提供了一片躲避风雨的小天地。每当我看着隔壁女主人离开前给我和别的小女孩拍的照片时，她的笑颜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时局虽艰，我们曾一同走过。虽不知你现在何处，但是我们的情谊从未消断。

三益村和“外国弄堂”

问：葛老师，欢迎您。今天想跟您聊聊70年前那些往事。首先，想请您先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和父母搬到三益村犹太聚居区的？

葛政荣：1948年，八九岁的我同三个弟弟，跟随父母以及祖母等人搬到上海唐山路599弄三益村。我们在唐山路的新家是一幢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前有天井，入内依次是客堂间、后房间和厨房，厨房上方还有亭子间，亭子间上面本来有一个晒台，后来被我们改装成一个小房间，成为三层楼中的一个小阁楼。二楼分为前楼后楼，这也是石库门的典型构造。唐山路的新家是父母从一个白俄犹太人[1]手中买的。战争结束后，他匆匆离去，留给我们不少家居用品，比如床、大橱、沙发、各式家具，甚至还有放留声机的柜子。

问：三益村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如何？

葛政荣：我们唐山路三益村里的公共面积很大，弄堂宽敞干净，常有汽车进出，与周围普通弄堂相比有明显区别。从

1_“白俄犹太人”一般指反对俄国十月革命而来华的俄罗斯人。1917年前后来华的俄国犹太人并非都是反对革命的，主要是为了逃避俄国的反犹暴行，所以说“白俄犹太人”并不确切。这些俄国犹太人比德奥犹太难民早来20多年，经努力均已成为中产阶级，因此拥有房产。

三益村出去，东边就是舟山路。舟山路上有一个两层楼的菜市场，是钢筋水泥建造的，这个菜市场听说还是防空避难的好去处，因为有坚固的水泥房顶保护。每当敌机来袭时，听父母说一般居民都会到此处来防空避难。舟山路上还有各式各样的店面，我时常看到同住三益村的外国人在店面间闲逛，挑选着生活所需品。自我搬进唐山路这条弄堂，我就见到了不少外国人，尽管年幼的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哪里来的，但是住在一条弄堂里，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让我们成为和睦相处的好邻居。

“外国弄堂”的战后光景

问：葛老师，您搬进三益村后，原本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就陆陆续续回国了，这段经历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葛政荣：唐山路三益村始建于1929年，外国人设计建造，得益于良好的居住环境，始建之初就有很多外国人前来安居。20世纪30年代后欧洲反犹主义日盛，面对日益缩小的生存空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签证宽松的上海避难。当时，三益村聚集着一批外国难民，被称为“外国弄堂”。

父母搬来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法西斯主义的气焰已消散，本是难民的犹太人开始纷纷外迁。我家的前屋主人是一个白俄犹太人，正是在犹太人回国潮的背景下，他将房子卖给我的父亲。我年纪小，跟我打交道的外国人并不多，但是我仍记得，刚搬进来时，外国人还是挺多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搬离三益村。刚搬进来的时候，我时常跟同龄的外国小朋友一起玩，等我稍大点，就不常见到他们了，想来是陆续搬走了，回到自己的国家了吧。

问：同龄的外国小朋友，您和他们是怎么相处的，还有

印象吗？

葛政荣：尽管与外国小伙伴为邻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和我的弟弟，都对一个邻居小女孩还有些印象。那个外国小女孩只有四五岁，和我三弟年纪相仿，他们曾在一起玩洋娃娃，我还记得那个洋娃娃有一处破了，见到里面填充的木屑。我们还一起去向外国邻居索要邮票，不分彼此。不久，外国小伙伴们纷纷离开了。“文革”前后我们兄弟几个念书、工作、结婚，也都先后离开了这里，只剩下我的大妹妹和父母还住在三益村的老家里。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几位原住在此屋的犹太老人带着翻译来到我家旧地重访，父母和妹妹接待了她们。听妹妹讲起，犹太老人们又是拍照又是询问，对三益村这片天地很是留恋。我们根据年龄等线索回忆，很有可能这其中的一位就是当年与我三弟一起玩的邻居小女孩。可惜当时我三弟不在上海，未能与几位犹太老人谈起往事，而我妹妹又将她们留下的地址遗失了，至今我们也没有再取得联系，非常遗憾。

一幅值得一生珍藏的画

问：战争胜利后，三益村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外国邻居中，有没有什么让您记忆深刻的人或事？

葛政荣：我至今仍对遗失地址深为遗憾，还好我家还保留着一幅画，聊表纪念。这幅画是前任屋主，那个白俄犹太人留给我们的。当年犹太人匆忙离开，每个房间都有他们带不走的家具或物品，其中就有这幅画。这幅画不同于那些因为沉重带不走的物品，它是前任屋主特意留给我们一家的，作为纪念礼物，既是对他在三益村居住岁月的留恋，也是为恭贺我们的乔迁之喜。多年来时过境迁，房屋修整之后犹太人留下的家具物品几乎都被处理、变卖或损坏丢弃了，唯有

这幅画一直保留至今。因为我们非常珍惜它，喜爱它。

问：这幅画您能详细为我们说说吗？

葛政荣：这是一幅水粉画，相当有异国情调。木画框的两个下角对称地各刻有一个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每个人面像都头顶一棵热带棕榈树，右上角好像有个特殊的阿拉伯符号，形似月亮。画的主体是连绵四个山峰的高山，山下是一片碎石沙漠。再仔细看看，沙漠中还有一队牵着骆驼的队伍在行进。我仔细看了画幅的右下角，写着几个英文字母：EUGEN BROCH，不知道是否是作者的名字。我曾经在犹太难民纪念馆的犹太难民名单墙上搜寻，没有找到此名字。这幅画的镜框玻璃曾不慎破损过，我借此没玻璃反光的机会拍到了一张较为清晰的照片。日后我特地为此画框配装上一块轻而不易碎的软玻璃。

我的父亲尤其珍爱这幅画，甚至在他99岁突然去世前的半个月里，还曾对人介绍过这幅犹太人留下来的画作。记得当时他老人家还提醒我们小辈要好好保护它，希望我们在他百岁生日前把他的房间装修一新，把这幅画挂在他房间的墙上，方便他天天看到画。可见他是多么珍爱这幅画，也反映了他对犹太人难忘的友情。现在，这幅画一直挂在父亲房间的墙上，我们遵循他老人家的嘱咐，好好地保管着它。现今，从这幅画里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我们和犹太人相依为邻的友好情谊。可以说它是战争年代我们上海人民与犹太难民患难之交、真情相待的一个历史见证。

(摘自中共四大纪念馆编：《来者勿忘：虹口抗战记忆口述实录》，上海，2015年。编者对少数有误处作了修改，并加了若干注解。)

关于犹太难民邻居的回忆

全富荣、张招娣[1]

1942年，我们家搬到了虹口提篮桥地区的霍山路，当时这儿的犹太人还不是很多。到了1943年2月，日本占领军下令，凡1937年后来上海的犹太难民必须迁入他们设在提篮桥地区的"隔离区"，这里的犹太人就越来越多了。

我们家的房子是英商建造的，从外表看颇有点欧美风情。我们当时买下了一幢，还租借了隔壁的一幢。我们全家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买下的那一幢就用来出租。一共有6家犹太人租借在我家的房子里，两对犹太夫妻、一个中年妇女、一个姑娘和一个老太太。他们似乎都没有小孩，或者有可能孩子没有一起逃到上海。

记得当年有个犹太男人长得胖，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fat man"。他们一般一早就出门上班了，早出晚归，平时见了我们也就点点头算打招呼。他们吃得很简单，就是面包、土豆之类的，再弄个汤，用的是珐琅瓷盘，还有高脚玻璃杯，都是自己带过来的，跟我们中国人起油锅、炒菜不大一样。穿着也很平常，就是他们的西式服装。

1945年日本人战败后，租住我家房子的犹太人基本上都还留在这里，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租我们房子的犹

1_本文系黎犁根据当年犹太人的邻居全富荣、张招娣夫妇回忆整理。

太人才陆续搬走，走的时候，还送了几样东西给我们，有一只木桶我们一直用到现在。

我们现在房间里用的这套家具也是出自犹太人的手艺，用了70多年了。当时我家对面有一家犹太人开的木器店，我父亲花了1 000美元定制了这套家具（当时1 000美元绝对是大价钱），包括一个五斗橱、一个大橱、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还送了两把沙发椅。橱上刻的花到现在看来都非常精致，富有犹太人特有的风格。木头很坚固，除了床，其他东西都一直用到现在。

从我接触到的所有犹太人（包括邻居和朋友）来看，他们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勤劳和刻苦。

我们家是做服装生意的，当时开了家女子成衣店，有时需要一些小零小碎的东西，就由犹太人提供，比如纽扣等。中国人的传统纽扣都是布制的，市场上没有西式纽扣。犹太人想出了办法，用木头锉成圆形的纽扣，再一层层漆上油漆，看上去非常亮。一粒纽扣看着小，其实要许多工序，但他们不怕烦也不怕难。我们要什么颜色，他们就漆成什么颜色，我们说好什么时候要，他们到时一定会交货，非常讲信用。

迁到这儿的犹太人，没有工作的，就自己在胸口和后背上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木匠”“漆匠”“泥水匠”等等，在街边找工作。我们家有一次就找了一个50多岁的犹太人来粉刷房间。那个人真的很勤劳，从早干到晚，基本不休息，闷着头干活，手脚特别快。

我有几个犹太朋友，其中有一个是做珠宝生意的，我常常到他那儿坐坐。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房间，吃饭、休息、工作都在这个屋子里面。我有时早晨到他那儿，他就已经开

始干活了。记得他曾经跟我说:“一个人随便做什么工作，第一就是要勤劳，第二是要信誉好，一定要做出自己的规矩来。”另有一个犹太朋友曾对我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手艺，那样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工作，可以依靠手艺生存下去。”

(摘自冯金山等编著:《情系虹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回忆与犹太邻居相处的日子

李阿好[1]

我叫李阿好，1927年出生，抗战时我住在虹口新建路一所房子的前楼二层阁楼里，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很艰苦，经常吃的就是六谷粉、豆腐渣。我的弟弟还小，由于珍珠米粉糊和豆腐渣难以下咽，家里就经常摊六谷粉饼给他吃。邻居住着一个犹太家庭，夫妇俩，他们能吃上白米饭，但也很愿意吃六谷粉饼。于是，便常常把他们家的白米饭、面包之类送到前楼来给我们吃，还对我说："你妈妈摊的饼很好吃。"于是，我母亲就摊了六谷粉的饼送过去，他们很高兴。当时我年纪轻，心想，犹太人怎么要吃粗粮？现在想想，可能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苦了，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更艰苦，所以对我们很同情，就用白米饭、面包来换我们的粗粮，对他们来说，是调调口味；对我们来讲，在吃的方面可以难得地稍稍改善一下。

我靠做小生意糊口，好的时候，也就是推一部小车子出去，支起一顶帐篷，下面放一张桌子，两张长凳，早晨卖鲜牛奶，中午卖清咖啡，晚上卖吐司面包、牛奶、咖啡，面包是用钢炭烘的。情况不好的时候，也卖萝卜、洋葱、卷心菜、洋山芋（土豆）等。犹太人很喜欢红萝卜和洋山芋，但他们一

1_本文系熊建民根据陈云发《虹口往事》书稿中对李阿好的采访记录整理。

般只买很少的几只。我呢，生意也很随便，不瞎开价，他们愿给多少钱就收多少，不与他们斤斤计较。因为平时中国人与犹太人相处很友好，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犹太人也一样，问清了价格后，也不还价，就给钱。

我们弄堂38号前厢房住着一对犹太夫妻，有一个女儿，我们叫她玛雅，很小，漂亮又可爱。犹太丈夫皮肤黑黑的，有点像巴基斯坦人。不久，他被日本人抓走了，也不知关押在什么地方，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再也没有见到他。犹太妻子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过得很艰难。后来，她找了个男朋友，曾带来过我们家。这个男朋友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晚上她经常跟男朋友出去，第二天早晨再回来，于是，有的时候她便托我们照料玛雅睡觉。有一次我妻子过去，帮玛雅洗脚洗脸，但找不到脸盆，只好回家把我家的脸盆拿过去用。第二天当我们问起此事，那个犹太女人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忘记关照了。我们经常照料玛雅睡下后，才回自己家睡。尽管语言不完全相通，彼此的生活习俗也不相同，但我们两家的关系却很好。

我们家对门住着一位犹太人，名叫麦唐姆，据说过去是医生。老夫妻有一个小儿子，平时没有事做，我们也没见他公开挂牌行医，生活也是靠犹太总会接济，每天领面包。有一次，我妻子胃痛，病得很厉害，当时也就以为是一般的肚皮痛，没有去请医生来看。弄堂里有个当翻译的中国人发现了，便把对门的犹太医生叫来了。犹太医生仔细给我妻子作了检查，然后通过翻译对我说，这不是胃病，最好去手术。见我们家穷，没有钱去住医院，他便回家取了一粒药丸，又黑又大，亮晶晶的，叫我妻子囫囵吞下去。吃了药以后，我的妻子就睡了。第二天，犹太医生又来给她作检查，

并告我，胆里的病好多了，不肿了，并安慰我说这病不要紧张的，他又让我的妻子吃了一粒同样的药丸。第三天他再来检查，便说："没关系了，很快就会好的。"这个犹太医生医术很高明，可惜在战争年代，又被限制在"隔离区"，他是有本事没地方用。

当时我们弄堂里中国人和犹太人混杂着居住。我的印象中，犹太人很好相处，也比较友善，我们一般中国老百姓待他们也像对中国人一样，从不歧视或害他们。

现在的霍山小学，过去环境很好，房子都是圆顶的，是由一位聂姓中国华侨造的，他常做一些善事、好事。热天时，他烧一大缸茶水，免费让人喝，还给穷苦人发沙药水、膏药等，救济穷人。弄堂里有的穷人过不起生日，他就发票子，让他们到他家里去吃面条。后来这个华侨聂先生出国去了，这座房子就让给犹太难民住了。犹太人走后，才变成了小学。

（摘自冯金山等编著：《情系虹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虹口的中国人和犹太人患难与共

王发良[1]

当时的舟山路一带起初属于公共租界，老热闹咯，街道两旁霓虹灯很多，30号开的是杂货店，32号是野味店，34号是修钟表店，46号是帽子店，一时间德文招牌林立，好像是德国或奥地利的一个小镇，甚至被戏称为"小维也纳"。

后来，不仅是舟山路，周围那一带住的几乎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们开了越来越多的小店店铺，如饭店、杂货店、药店、面包铺、理发店、裁缝店、鞋帽店、服装店等等，当然也有维也纳人不可缺少的奥式露天咖啡馆。后来，一些犹太难民甚至建起了小型作坊，生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及欧式食品——腊肠、糖果、软饮料、冰淇淋……

这些商店和工厂起先主要是面向犹太难民的，但后来在中国百姓中也发现了广阔的市场，一些欧式食品越来越受中国人欢迎。我记得，当时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冰淇淋、可口可乐、奶油蛋糕、欧式面包等都是很贵的，但在虹口犹太难民开的商店里，它们相对来说价廉物美，所以很多虹口中国居民逐渐也开始去购买、品尝这些食品。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最喜欢冰淇淋、糖果、可口可乐和奶油蛋糕。

在这样的气氛中，中犹人民的接触更趋密切。在虹口

1_王发良是虹口地区犹太难民的中国邻居，由于会讲英语和一些德语，他与犹太难民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情谊。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在虹口的犹太难民纪念馆等处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向他们讲述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及中犹人民同甘共苦的难忘故事，直至去世。

一带，许多中国人学会了讲德文，也有一些犹太难民学会了讲中文，甚至上海话。我当时会讲一些英文，德文也大致能听懂，后来还可以讲几句，现在年纪大了都忘记了。我的许多犹太朋友都能讲中国话，甚至上海话。我的一个犹太朋友非常聪明，到上海后向任何一个碰到的中国人求教所见的事物的中文叫法和上海话说法，去看中国电影，还学写汉字。后来，在电话通话时，人们都认为他是中国人，甚至认为他是上海本地人。他大体上已能看懂中文报纸。有一次他请我去他家中坐坐，但事先用道地的上海话声明：家里"嘎小嘎脏，勿好意思的。"在他家中，我看桌上都是上海人喜欢的大饼、油条、豆浆，还有红乳腐和酱瓜。

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曲折，犹太难民们也逐渐熟悉并喜欢上了起初他们不太适应的中国传统与文化。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中一些人还迷上了中国戏剧，喜爱中国菜，开始试用中药，尝试按摩和针灸，试图学习中国武术和太极拳。甚至还有人起了中国名字并刻一个中国式姓名图章，例如，犹太难民画家弗里德里希·希夫 (Friedrich Schiff) 就起了一个非常吉利的中国名字"许福"。他还画了一幅漫画，用的标题是"我爱中国人"，反映了大多数犹太难民的心声。

那时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日本人迫害我们中国人，我们与犹太难民同处患难之中，大家在一起友好相处，互相帮助。记得有一年中国春节，我看几位犹太邻居孤苦伶仃的，便请他们一起来吃年夜饭。当我提议举杯祝贺中国新年时，他们眼中都饱含泪水。一位犹太老太太对我说："我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困境牟利。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另一位犹太老先



当年犹太难民的邻居王发良生前接待来访的参观者

生认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在中国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反犹情绪。

二战后，犹太邻居们一个个离去。他们离开时，我们之间都有些难分难舍了。此后几年，我们还保持着通信联系。

令我欣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以建交之后，越来越多当年在上海，在虹口生活过的犹太难民及其子女又从世界各地重返“避难地”“故乡”寻根、访友、参观、旅游、投资。我也见到了一些当年的老邻居、老朋友。

(摘自本书主编与王发良生前的多次交谈和对他的采访记录。)

上海——庇护犹太难民之城

瑞娜·克拉斯诺[1]

一天晚上，舒拉·奥尔默特 (Shura Olmert) 偶然来访，和爸爸讨论事情。奥尔默特是以色列现任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 (Ehud Olmert) 的叔叔。他和爸爸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们经常促膝长谈。那天晚上他们讨论的是纳粹在上海不断增大的影响力。几年前，一群纳粹分子入住国际饭店 (Park Hotel) 顶层一个套房。国际饭店是跑马厅对面一座16层的大楼，在当时被看作雄伟的摩天大楼，但今天许多大楼都高过了它。

爸爸呷着他的浓茶，忧心忡忡地说："纳粹分子越来越多地公开涌入上海，这已经不再是渗透，而是一条巨流！好久以前就已经相当明显了。秋季跑马会的时候，他们打开酒店的窗子，向跑马厅方向散发数百份用英文和中文印制的反犹传单。我永远不会忘记！"

舒拉放下冒着热气的茶杯，慷慨激昂地回答道：

"我也不会忘记！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的反犹示威。我不知道纳粹分子是否研究过风向，但事实是，那些传单恰好被风吹向了看赛马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观众。"

"是的，"爸爸答道，"要么是精心策划的，要么是那些罪

1_瑞娜·克拉斯诺 (Rena Krasno)，1923年出生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家庭，目睹了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的经历。中国改革开放后，她多次重返自己的"故乡城"上海，推出了一系列关于上海犹太人，特别是来华欧洲犹太难民的著述。

犯运气太好了！”

两个人非常激动，因为当天一份当地的英文报纸刊登了一篇日本人的文章，文章照搬了纳粹的一张传单《一条船上的两个人》，两个人指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文章说，罗斯福总统是“犹太人收买的奴仆”，被一群贪婪的金融家，心怀怨恨、伺机报复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无赖包围着。罗斯福以深思熟虑的谎言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

到1939年夏天，局势已经很明朗，希特勒正在准备消灭德国以及他所控制的其他国家的所有犹太人。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犹太难民无须出示签证和资产证明就可以进入的地方。到6月底，约14 500名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抵达上海；到年底，又有5 000名穷途末路的难民登陆。当时，城市的北部区域（虹口）已经被日本人接管，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蚕食整个城市。上海的许多外国人已经遭到遣返，一些商号迁到了马尼拉、香港或新加坡。

可悲的事实是，没有第二座城市为这些流亡的难民提供栖身之所。由于虹口的房租比上海其他地方便宜，所以大多数难民搬到了这个地区。一些人设法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找到了工作。虽然上海犹太人组织起了各式各样的委员会帮助身无分文的新来者，但许多人还是很沮丧。由于生病，健康状况很差。“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犹太人还能向难民提供重要的经济援助，但1941年12月8日以后，这种直接的联系就不可能了。

难民们很难适应当地的环境。他们不习惯烧开水，用热水或高锰酸钾稀释液洗菜洗水果，还总是频繁地受到腹泻、蚊虫叮咬和痢疾的困扰。另外，大多数人对注射霍乱、伤寒和天花疫苗有严重的过敏反应，而上海的华人和外国



瑞娜·克拉斯诺

侨民在孩童时就已对此习惯了。对于不习惯的难民来说，注射疫苗经常导致胳膊红肿和发烧，有些人的不适会持续好多天。舒拉和爸爸还讨论了难民们找工作时面临的巨大困难。许多人不会讲英语，而且即便愿意，也没法取代苦力去做他们的工作——这在上海是闻所未闻的。再说，靠干苦力挣的那点钱他们也难以维持生计。

1943年2月18日，"大日本皇军上海地区驻军总司令"和"大日本海军上海地区驻军总司令"签署命令，将1937年以后到达上海的欧洲难民的居住地和商业活动限制在虹口的"指定地区"。第二天，当地报纸刊发了一则通告，称一个犹太难民吞服硝酸自杀。通告的最后一句话让爸爸和舒拉尤为愤怒："此举原因不详。"

犹太人救助难民委员会热情高涨地工作，帮助他们在"海姆"(Heime，德语"家"，难民营)安家，获得最低食物保障、医药保障，并为他们开办子弟学校。新来者情绪极度消沉，给人以慰藉的是他们周围的中国人，这些人虽然有好多生活条件更为贫穷艰苦，却总是对他们仁爱有加、礼貌相待。许多难民和中国人建立了友好的联系。正如我爸爸常说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上海如何向可怜的犹太难民敞开它的大门，不能忘记中国人是如何善待他们的。"

上海的波兰犹太难民的故事与那些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逃亡难民的故事颇为不同。德国纳粹步步逼近时，约2 000名波兰人——其中包括犹太学校密尔经学院(Mir Yeshiva)的300名师生[1]——逃出波兰，越过俄国边界，逃向邻近的立陶宛。

在立陶宛的考纳斯(Kaunas)，一位名叫杉原千亩的富

1_一般认为避难来沪的密尔经学院师生有400多人。

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日本总领事违反日本政府的指示，向犹太难民签发了经日本到库拉索岛[1] (Curaçao) 的过境签证。绝望中的波兰难民潮水一般涌向杉原领事。杉原签发的过境签证有效期只有10天，只要必要，他就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延期，他的妻子杉原由纪子则夜以继日地帮助他盖章——此事史称“生命签证” (visas for life)。这些签证允许这些波兰人离开立陶宛。必须指出，去库拉索岛的签证也是考纳斯好心的荷兰领事“非法”签注的，因为这些潜在的“移民”必须首先从库拉索总督那里获得登陆许可，才能去申请日本的过境签证，而这些登陆许可波兰犹太人是根本得不到的。

犹太难民抵达神户时，没有被阻止入境日本。神户犹太人社团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但随着“珍珠港事件”临近，日本人对外国人的猜疑不断达到新的高度。密尔经学院与其在美国的朋友和支持者的紧密联系被视作危险之举，现在在日本，他们被认为是潜在的美国间谍。最终，日本政府公布了将犹太难民用船运到中国、运到日本人控制之下的上海的计划。当然了，这个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降临在密尔经学院学生的头顶：他们将再一次被连根拔起，送往一个陌生的目的地。

我爷爷的朋友、上海首席拉比梅耶·阿什肯纳兹与西拉斯·哈同[2]的家属谈判，成功获得他们的许可，将密尔经学院设在哈同家建的阿哈龙犹太会堂。密尔经学院在上海一直坚持到1947年[3]。

1944年的一天，我收到朋友海因茨 (Heinz) 的一封信，他被迫搬到了虹口的“隔离区”——直到今天许多人还常提起这个犹太人区。海因茨是个讨人喜欢、彬彬有礼的漂

1_库拉索岛当时是荷兰殖民地。

2_西拉斯·哈同是上海的犹太巨富，已于1931年去世。

3_此后他们前往纽约和耶路撒冷，现在那两个地方各有一个密尔经学院，它们仍然把上海视为“救命之地”。

亮男孩，当时只有15岁，是家里唯一一个从柏林成功出逃的人。我妈妈把他带回家吃晚饭，所以我认识了他，我们全家人都特别喜欢他。海因茨求我去看他，因为负责颁发难民离开“隔离区”许可证的日本长官合屋[1]对他大吼大叫，拒绝给他申请表。但是“隔离区”外的人可以随意进入，海因茨想我想得厉害，只好求我去看他。

爸爸妈妈不允许我独自过花园桥（也称“外白渡桥”）去虹口，最终妈妈同意陪我一起去。她也为海因茨担心。实际上，因为天很冷，她拿出了一件旧外套。她买下这件带毛里子的外套，就是为了万一需要的时候送人的。她想，海因茨因为食品摄入量减少，也许住的地方还没有取暖设施，一定冻坏了。

在花园桥上，我们乘坐的电车在日军岗哨前停住了，每个人都被迫向这些日本天皇的代表鞠躬，然后哨兵们一只手攥着刺刀，另一只手一挥，示意电车继续前行。

爸爸曾经为海因茨弄到过一份日本人要求的就业证明，凭着这个才能拿到离开“隔离区”的许可证。但是有一天，海因茨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去申请，最终来到合屋面前时，正赶上这个日本人情绪暴躁，结果遭到了拒绝。

“我不会再试了，”海因茨对我们说。“我真的不能再经历一次了！”

我们走近“隔离区”，发现它围着带刺的铁丝网，有几个控制点作为出入口。大门旁站着好几个穿军服的日本兵，还有身为“犹太保甲”[2]的难民，一个负责检查通行证、维持秩序、执行宵禁令的助理警察。当然，所谓“犹太保甲”也是处于日本军队的控制和管理之下的。

海因茨站在距大门20码（18.3米）的地方，他兴奋异常

1_合屋是日本占领军设立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的日本长官，自称“犹太人的国王”。

2_日本占领军推行“保甲”制度，由犹太难民担任“犹太保甲”，负责犹太人居住地区的治安事务。

地和我们互致问候，妈妈还拥抱了他。她端详着他的脸，发现他更瘦了。她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吃得饱吗？”

“呃，”海因茨答道，“‘厨房基金委员会’(Kitchen Fund Committee) 确保我们每人每天至少摄入3 150卡路里，孩子晚上还有一顿加餐。”

海因茨将40来个街区的破破烂烂的房子指点给我们看，这就是“海姆”——巷子里堆积着垃圾和瓦砾，小贩在卖烧开的食用水。海因茨拒绝领我们去他的房间，肯定是怕我们看见那里的惨状。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读物，他说他们有三份德文的报纸，其中一份有一个英文名字，叫《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但实际上是以德文出版的。

“真的，”他说，“我们的文化生活相当活跃。我们这里有古典音乐家，有演员，有一所成人学校，还有培养木匠、技师、电工和技工的学校。总是有演讲。有一所很棒的孩子上的学校。是的，不能说我们面临着精神上的饥饿，但我们的确有健康的问题。人们总是吃不到健康的食物，许多人患上了各种疾病，我们在德国的时候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些病。”

我从未去过欧洲，不过除了这一切贫苦肮脏，“隔离区”倒有点欧洲的味道。有一个招牌上写着“维也纳裁缝，专为品位男士服务”，另一家成衣店“皇家手套”则用德语、英语、中文和日语打招牌。妈妈问海因茨有没有一个喝茶的地方，他领着我们爬上一道狭窄的、曲曲弯弯的楼梯，到了楼顶上一个摆着几张桌子和折叠椅的小地方。一个上了年纪的小提琴手拉着奥地利华尔兹。我们吃到了一种特别好吃的德

国糕点，真令人惊讶。

海因茨对妈妈给他带来暖和的外套感激不已。我们坐在那儿聊起了许多话题，最后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可悲的是，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战争刚刚结束，海因茨得知他留在德国的家人被全部杀害，绝望之下自杀身亡。

（摘自瑞娜·克拉斯诺著：《上海往事 1923—1949，犹太少女的中国岁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版。编者对少数有误处作了修改，并加了若干注解。）

1945年美军对上海的轰炸

瑞娜·克拉斯诺

美军对上海的空袭愈发猛烈。B-29轰炸机在城市上空嗡嗡作响，留下长长的白烟，慢慢地消散。当地报纸频频刊登飞机轰炸时应采取哪些行动的注意事项，并冠以大字标题:《紧急重要通知》。一个通知是这样规定的：

1. 空袭警报

预警阶段：1声，每声两分钟

空袭：7声，每声5秒钟

解除警报：两声，每声15秒钟

2. 旗语和灯语

预警阶段：两面绿旗，或两盏绿灯

空袭：两面红旗，或两盏红灯

解除警报：两面黄旗，或两盏黄灯

空袭警报响起时，每个人都停下手头的事，开始数警报有几声。一次空袭结束后，所有报纸发表的公告都差不多：

日前空袭警报拉响，系因美军飞机实施侦察，遭日本空军正面迎击，予以重创，即仓皇遁走。

或

敌机来袭，为日军飞机侦知，匆促退却。

真相是，B-29轰炸机以极快的航速在5万英尺（15 240米）高空飞行。日本人开始研制"雷电"飞机以打击B-29，但生产速度非常缓慢，所以B-29的攻击非常短暂、非常致命。

我们在震旦大学时，一有空袭，所有学生都会冲到窗前对着天空欢呼，也不管耶稣会神父如何一个劲地让大家安静。如果空袭反复持续，当天的课就都取消了。

1945年7月17日，B-29机群轰炸了虹口的"隔离区"，日军在那里隐藏了一个海军指挥站，指挥太平洋上的日本战舰作战。那是湿热的一天，天空阴云密布，7声空袭警报刚刚响过，炸弹就已经开始倾泻、爆炸。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骑着脚踏车往家赶，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截住他，抢走脚踏车，骑上车飞快地跑掉了。许多建筑被炸毁，一些人被炸死，许多人受伤。

虹口的大多数房子没有地下室，于是，为了避免被横飞的碎片所伤，一些家庭在桌子上堆上床垫，空袭时就钻到桌子底下避难。

空袭刚一开始，爸爸就接到他所在的一个委员会的某个成员的紧急电话，马上骑着脚踏车离开了。几个小时后他脸色苍白、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了无数犹太难

民的故事，他们完全被中国人全心全意、英勇无畏的合作感动了。难民中的医生、护士和普通侨民立即组织起来，实施行动。住在同一地区的中国人迅速投入救援，搬运尸体和伤员，将布匹撕成绷带，运送饮用水。犹太难民和中国人像兄弟一样肩并肩工作。当天有31名难民死亡，几百人受伤。中国人也有数百人死伤。

轰炸过后的第二天开始下雨，雨水透过炸坏的屋顶和墙壁灌进房子里，泡坏了房间里面部分以及难民和中国人堆起来的一点物品。潮湿、灰尘和瓦砾使得数百人沦于赤贫。

当晚，一个朋友从虹口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不用着急，那里的难民和中国人的表现令人称道。

“所有伤员，无论是难民还是中国人，都得到了照料，不分彼此，”他用激动的声音说道，“诊所以闪电般的速度建了起来，连乞丐都像其他人一样得到救治。”

我把这些话重复给爸爸，他感叹道：

“*Zamechatelno! Zamechatelno!*（俄语：‘太棒了！太棒了！’）希特勒没能消灭犹太人的精神，而几百年的压迫也不曾扼杀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

妈妈立即着手从我们家的应急储备中搜罗罐头食品，再加上她从自己开的店里拿来的孩子玩具，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虹口去。

当天晚上，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印尼华侨西德尼(Sidney)到我家来，告诉我他用私藏的收音机偷偷在短波广播中听到的消息：美国人向11个日本城市投放了数千张传单，说残酷的空袭将会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在战后出版的一本书中，波多野勤子写道：

……这一带的女人对这些传单避之惟恐不及……在大多数人看来，传单并不是出于仁慈的目的投放的。然而，假如一个男人表现得宽宏大量，行为违背国家的战略需要，他就会被看作一个叛徒……

在上海，没有人真正知道实际情况是怎样的。电力短缺在加剧：

新的用电规定

所有商店必须在晚上7点之前关门……商家有违反本规定者，将受警告一次；有再犯者，将予切断电力供应并处罚款；三犯者，将处以停业10天之惩罚；第四次违反本规定者，将吊销其营业执照。

我们家、朋友们、邻居们以及上海的每一个人，都准备面对未知的、险恶的未来。至于我嘛，我拒绝改变自己的作息制度，仍然每天骑车去上大学，遇到日本人设置的路障就停下来，然后再向前冲。我继续专心准备考试，为安全起见常常坐在楼梯下面，以防有突然的空袭发生。读医学的第一年，我们要记很多东西，有时还要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论文，旁边有耶稣会士严格监督[1]，以确保没有人作弊。我们不仅要写下已经学过的知识，还要逐一画出图表。如果我在楼梯下埋头学习的时候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家人都会慌慌张张地挤到我身边。有一次，我正专心准备迎接骨学考试，妈妈坐到我身旁，大惑不解地问道：

"你怎么能专心学习呢？整个房子都在晃！"

我抬头瞥了一眼，听见玻璃叮当作响，看见窗帘在客厅

1_震旦大学为法国天主教会所办，所以有耶稣会士严格监督学生。

窗前晃来晃去，然后又埋下头继续研究分派给我们的骨头。这一刻，我只想通过考试。

（摘自瑞娜·克拉斯诺著：《上海往事 1923—1949，犹太少女的中国岁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版。编者对少数有误处作了修改，并加了若干注解。）

上海犹太难民中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

岗特·诺贝尔
基尼亚·诺贝尔[1]

我（岗特·诺贝尔）1933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纳粹上台后，大批德共党员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我也于1937年被捕。此后，我和夫人基尼亚·诺贝尔历经千难万险，终于逃离德国，来到了避难地上海。1938—1939年间，在我来到上海前后，不少德国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也逃离纳粹魔掌来到了上海，我认识的就有上百人。当然，实际人数还要多得多，但可能我不认识他们。你知道，当时德共和左翼政党的成员在德国处于地下状态，如果是犹太人更要万分谨慎，因此许多人之间互相没有联系，到上海后自然也互不认识。

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环境后，我们一些互相之间比较熟悉的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开始经常聚会，在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并交流信息，逐步形成了一个反纳粹地下小组。我们小组的成员大约有20～30人，都是犹太难民。为什么说20～30人，因为成员并不是固定的，有的人是中途加入的，有的人是参加了一段时间后离开的，还有的人仅参加了几次活动，当然大多数人是自始至终参加活动

1_岗特·诺贝尔（Gunter Nobel）和基尼亚·诺贝尔（Genia Nobel）夫妇都是犹太人，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纳粹上台后受到迫害，来到上海避难，积极参加了上海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的地下活动。



岗特·诺贝尔

的。小组虽然具有强烈的反纳粹立场，但没能与德国的反纳粹地下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也难以开展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抵抗活动，主要是组织学习和交流信息。

不过，小组的某些成员自己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如小组的创建人汉斯·希伯是著名记者，德共党员，后来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于1941年11月牺牲在山东的抗日战场。中国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这几个大字。汉斯·希伯的遗孀格图德·罗森伯格 (Gertrude Rosenberg) 是宋庆龄的亲密战友，在希伯牺牲后继续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小组的领导人之一瓦尔特·祖列克 (Walter Czollek) 也通过参加中国革命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 (Jacob Rosenfeld) 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小组的核心人物汉斯·克尼格 (Hans Konig) 等5人与苏联建立了联系，其中也包括岗特·诺贝尔的夫人基尼亚·诺贝尔。他们后来为苏联塔斯社工作，积极向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还有一些人，虽然我不太熟悉，但也应该提一下。博索尔德·玛纳斯 (Berthold Manasse) 是德国共产党在柏林的一个支部书记，在纳粹上台之后他便被关入了集中营之中。玛纳斯被释放后于1939年4月抵达上海，随即积极投入了上海犹太人中的左翼运动。海因茨·吉尔兹布 (Heinz Grzyb) 也是一位德共骨干成员，他对于上海犹太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经生活了多年，并与中国共产党以及靠近上海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还在上海发展了一个包括8～10名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并以很高的政治水准对其加以训练。

直到1941年6月，上海犹太共产主义团体的任务仍然是以发展队伍以及为成员提供教育为主，他们也为从上海返回欧洲后能立即投入到有效工作之中作了充分的准备。德国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政治局势，这一事件促使上海犹太难民中的左翼团体成员通过口头讨论和写作等多种形式表达了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即纳粹在战争开始时的胜利只是其最后崩溃的前奏。苏联塔斯社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广播站。自1941年夏末，塔斯社开始以4种语言（俄语、英语、中文、德语）播报重要信息，例如前线的每日战报，反希特勒同盟领导人的演讲，军事和政治形势分析，战争进程评论等等。来自德国的犹太共产党员积极参与了德语节目的录制工作。我们小组的汉斯·克尼格还为塔斯社撰写了一些关于政治、军事事件的评论，其中的一些文章由于观点独到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得以多次播放。

包括岗特·诺贝尔在内的不少共产党员也试图向苏联驻沪领事馆申请加入苏联红军以抗击德国法西斯，但这些请求由于犹太人的敏感身份以及当时复杂的环境而被苏联方面拒绝了。

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限制，当日本于1941年12月完全占领上海后也没有关闭苏联广播电台。但是在1944年底，由于盟军的不断胜利，日本在限制之后又封锁了所有的广播。在广播电台被关闭之后，那些曾经为其工作的员工都受到了日本秘密警察的严刑拷打。

1943年进入虹口“隔离区”后，我们小组继续进行定期

聚会，交流盟军取得胜利的好消息。我找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因此可以凭通行证出入“隔离区”，经常比别人更早得到最新的消息。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和希特勒死亡的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8月6日，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在上海流传，我感觉日本人完蛋的日子即将到来。那天，充满喜悦的我没有佩戴犹太人标志便走出了“隔离区”，结果碰上了具有反犹情绪的白俄民兵，被他们抓起来关进了监狱。虽然监狱的情况极糟糕，但几天后日本人便投降了，我们都获得了解放。我总共在监狱中待了不到10天。

从最早的犹太共产党员来到上海至1947年末，尤其是在日本对盟国宣战的1941年以及上海犹太“隔离区”建立的1943年，上海犹太难民中左翼分子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在地下环境秘密进行的。尽管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秘密警察密布街头，且有很多犹太难民为共产党员和左翼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帮助，但十分幸运的是，上海犹太难民中共产党和左翼团体的活动却始终没有被发觉，也没有一位成员因为左翼团体政治工作的缘由而被逮捕。

1945年9月后，纳粹大屠杀的可怕内幕不断从欧洲传来，令我们十分震惊。与大多数在华犹太难民不愿再回欧洲定居不同，我们这些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还是想回德国。我们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的新德国，在中国的避难生活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信念。以我们小组为核心，近300名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汇聚在一起，经过反复磋商，决定返回德国。

1947年8月，我们告别了上海和中国人民，踏上了返国之途。1947年8月21日，我们295名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及其家属抵达柏林。我们是来华犹太难民中极少的，甚

至可能是唯一的返回前民主德国的数百人群体。在柏林车站，我们受到了盛大的、热烈的欢迎。

我们回到了饱受磨难的德国，积极参加到民主德国的建设和外交事业中去。岗特·诺贝尔先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经济部、教育部工作，还担任过民主德国驻瑞典代表处代表、参赞等工作。德国统一社会党承认克尼格等人(也包括基尼亚·诺贝尔) 为苏联塔斯社工作时期的党龄。克尼格后来出任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中国领导人经常向他提起他战时在上海避难的那段经历。基尼亚·诺贝尔的中文比岗特·诺贝尔好得多，后来多次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与民主德国领导人会谈时担任翻译工作。

1988年，邓小平同志邀请曾参加过中国革命的德国共产党老同志再访中国，我们两人也有幸参加了这个访华团。时隔41年，我们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上海，会见了许许多多曾经共同战斗的老朋友、老战友、老领导。我们参观了许多地方，为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非常高兴。作为在上海度过8年时光的难民，我们找到了战时在上海住过的老房子，见到了虹口“隔离区”的老邻居。

1997年8月21日，我们这些前上海犹太难民在柏林集会，纪念我们从上海返回柏林50周年，我们非常高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能参加这次活动并作讲演。

50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度过的时光，永远感激中国人民的救助之恩。

(摘自潘光1997年8月对岗特·诺贝尔和基尼亚·诺贝尔采访的记录。)

上海欧洲犹太难民的音乐生活：初期（1939—1942）*

汤亚汀[1]

> 在18 000名逃亡到上海的中欧犹太移民中，没有一个职业群体像这些艺术家，尤其是音乐家群体那样完全靠自己谋生……他们在流亡中也不让自己祖国的丰富遗产丢失，几乎从无到有建立起一种音乐生活，这一音乐生活无疑是这些移民对上海最积极的贡献。[2]

1938年11月10—11日，德国纳粹发动了臭名昭著的排犹恐怖暴乱，即"碎玻璃之夜"，从那时起至1941年8月德国开始限制移民为止，许多被纳粹德国驱逐出境的德奥犹太难民和波兰犹太难民（均为阿什肯纳兹族群体）先后流亡到上海，形成了上海第三和第四个犹太人社区。[3]因为上海在当时是全世界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入境的地方，不少难民就把上海看作是新的家园或"第二祖国"，更多的人把上海看作等待去第三国的中转地。在上海，德奥难民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中欧犹太协会（德文Juedische Gemeinde，英文则称Jewish Community of Central European Jews）。这12 000多名难民，其中约300～400人是音乐家，为上海带来了中

1_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世界音乐文化史研究专家，长期以来对上海音乐发展史，特别是上海犹太人的音乐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著述。

2_霍斯多夫（Hausdorff, M）："移民的音乐生活"（Der Musikleben der Immigranten），《上海先驱报》（*The Shanghai Herald*），特刊，1939年。

3_在他们来到之前，上海已有塞法迪犹太社区和俄国犹太社区。



描绘上海犹太人音乐生活的漫画

欧丰富多彩的文化——戏剧、音乐生活。

1941年秋天，1 000名波兰和立陶宛难民转道日本神户来到上海，形成第四个犹太社区。他们之中有一半是正统派和哈西德派（虔敬派），甚至有一个完整的塔木德学校密尔经学院（Mir Yeshiva），有400名学生、教师和拉比，他们严格坚持传统犹太教。有的去参加俄罗斯犹太会堂仪式，加强了俄罗斯犹太教正统派；有的则在自己设立的单间祈祷室（shtiblach）进行仪式。后来这些正统派甚至完全占据了塞法迪犹太人的阿哈龙会堂的学习厅。他们的宗教优越感使他们同中欧难民保持一定距离。据说波兰犹太人是上海犹太社区中最团结的，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救济组织，组织意第绪语的戏剧演出，为上海的犹太教和意第绪语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除少数较富有的犹太难民可以住在法租界外，大部分贫困难民选择住到了地价和物价便宜的虹口——当时上海的贫困区，建立起难民营（也称Heime，德文意为“家”）和社区公共厨房。那时，从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附近延续到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临近外滩的地段，算是虹口最热闹繁华的地区了，入夜还有霓虹灯。随着犹太人1939年的入住，他们迅速在这里建立起欧式商店、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繁荣了这一地区的商业。据一位难民后来回忆：

> 整条整条的马路呈现出欧洲的景象，“小维也纳”取代了“小东京”。在汇山路（今霍山路）地区和舟山路一条街，他们开张了商店、饭店、露天咖啡馆，销售掼奶油和冰激凌。像“屋顶花园”和“白马咖啡馆”这样的夜总会每天表演音乐、滑稽，还有“上海小姐”选美比赛。他们演出意第绪戏剧，出版意第绪报纸。[1]

1_舍吉恩特（Sergeant, Harriet）：《上海：文化碰撞之地 1918—1939》（*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纽约，1990年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军将15 000至18 000名犹太难民集中于虹口“隔离区”，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难民社区。当时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但音乐生活仍未中断，而且成了难民们的精神支柱。如本文开头所引，那是当时上海的一家报纸所描述的情况。

据说，当时第一批走出上海码头的中欧犹太难民，不但对虹口的生活居住条件之差深感震惊，而且按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上海的音乐生活，也很不以为然：

在市区租界和虹口的大小马路上，有不少的酒吧、咖啡馆、舞厅，一些中国戏院和一家欧式剧场，演奏交响乐这类严肃音乐的地方极少，仅有兰心戏院……音乐家大多是菲律宾、意大利和俄罗斯人，他们垄断了上海的音乐生活……酒吧大多是水手酒吧，咖啡厅多由商人光顾，剧场缺乏必要的艺术人才，故水准不高，交响乐队水平平庸，总之缺少专业训练的音乐家。

本文拟从中欧、东欧犹太难民本民族的希伯来——意第绪音乐文化、他们居住国的西方流行音乐文化和西方艺术音乐文化这三方面，来报告1939年至1942年间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力图从音乐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持及个人创造这样三重的角度作一全面的反映。

希伯来——意第绪音乐文化

随着1939年3月初中欧犹太社区的建立，犹太教宗教生活也在上海开始了，除负责举办成年礼、婚礼和葬礼外，每周五晚上和第二天安息日举行仪式。1941年11月，这一

犹太新社区的第一座自己的会堂在麦克利克路 (今临潼路) 落成，开始了每天早晨、下午和晚上的三次祈祷。

犹太“宗教的背景……成为其音乐表演的基础。”[1] 犹太传统音乐生活见之于宗教仪式、民族节日、音乐会以及各种晚会上。当时上海犹太难民中组织这一音乐生活的社会机构主要是上海犹太领唱者协会 (Gemeinschaft Juedischer Kantoren Shanghai) 和上海犹太俱乐部 (Shanghai Jewish Club) 。

上海犹太领唱者协会成立于1940年，约有成员20人，会长是领唱、声乐教师格拉斯 (Rudolf Glahs) 。其宗旨是促进领唱的社会和文化权益。据笔者所掌握的有关该协会的材料 (通知、会议记录和信件等)，可以发现他们的一些活动情况。如他们除了会堂演唱外，也举行节日宴会、生日及其他庆典，选举荣誉资深领唱。会员们常常开会讨论工作、财政、个人事务，安排参加婚丧喜庆活动的名单，辩论拉比和领唱的不同职责，批评社区的行政管理。他们收入不多，因而大部分领唱需要兼职，如在犹太学校教英文、希伯来文或音乐，或兼社区音乐活动抄谱员，甚至从事矫正发声缺陷的工作。但他们坚持服务所得应在协会全体成员中分配，不能归个人所有。尽管有这样的团队精神，但协会中仍不时出现不协和现象，如罢免领导层中不负责任的人，批评某些领唱在某些场合不准时出席。

1941年又建立了领唱者的合唱队，指挥考夫曼 (Jacob Kaufmann)，其任务是举办音乐会，协助社区活动。这些领唱者在难民的音乐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在各个犹太会堂担任仪式领唱 (cantor，希伯来语为hazzan，亦称赞礼员，不少领唱者受过西方美声唱法的训练) 。所谓领唱颂

1_博赫尔曼 (Bohlman, Philip. V.)：“欧洲犹太音乐” (Jewish Music in Europe)，载《卡兰世界音乐百科全书》(*The Carland Encyclopedia of World Music*) 第八卷“欧洲”，纽约，2000年版。

歌，即公众祈祷时领诵，或在唱诗班伴唱下咏唱礼拜仪式乐曲。他们除了在难民营仪式中表演，也在俄罗斯犹太人会堂（如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新会堂和华德路［今长阳路］摩西会堂）担任领唱。难民常举行仪式的地方还有：虹口的百老汇大戏院（今东山影剧院）、东海大戏院（今东海电影院）、汇山路戏院（百老汇路1110号，今大名电影院）、上海犹太青年学校（嘉道里学校，在今东余杭路）、上海犹太学校（今陕西北路市教委机关）、犹太俱乐部礼堂（爱文义路1623号，今北京西路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以及一些娱乐场所如塔尔（Thal）饭店（汇山路315号）。

1938年底至1939年冬抵达上海的德国犹太难民先是参加原上海犹太人社区的宗教仪式，后来谋求独立，在百老汇大戏院举行独立的仪式。而德国犹太人中的自由派会众则感到“百老汇”的仪式还太正统，于是在拉比齐伯施泰因博士（Rabbi Dr Silberstein）的带领下又分离出去，在东海大戏院举行自己的仪式。他们按德国犹太人19世纪以来仪式改革的传统——认同西方基督教的仪式音乐，即用管风琴（在上海只能用簧风琴代替）和唱诗班的混声合唱，突破了正统犹太教仪式不用乐器以及一领众合的齐唱形式。这也是犹太民族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Haskalah）使犹太文化现代化的结果。如早在1940年春，第一次逾越节在东海大戏院举行，高级领唱是瓦尔腾伯格（Heinz Warterberger），用簧风琴和混声合唱。后来社区创始人之一——瓦绍尔（Max Warschauer）成为高级领唱。1947年3月弗鲁赫特（Josef Fruchter）继任高级领唱。这几位高级领唱都有美声训练的背景。如弗鲁赫特，其父系维也纳犹太教领袖，从小培养他的宗教意识和演唱能力，先在维也纳唱诗班唱男童

声部，后上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在唱诗班和歌剧——轻歌剧界演唱。

如1940年德犹自由派在“东海”举行的犹太新年仪式的一张海报所示：也表明仪式用簧风琴及大型混声唱诗班。仪式分两段，第一段从10月2日至3日，为新年布道；第二段从10月11日至12日，为赎罪日布道，包括吟唱著名的起誓祷文《柯尔·尼德莱》(或译“众誓”，Kol Nidre)。主要表演者有布道者、领唱者、唱诗班指挥、簧风琴手及女独唱者。

女性出现在仪式中，人类学称之为“性别越界”，即跨越社会传统的性别分工，进入异性的领域，这尤引人注目，因为按正统犹太教仪式规范，女性最多只能旁观。犹太教“正统派会堂排斥女声，这同人声的性质有关：女性的声音因其美妙，或者在某些传统中因其具有诱惑力而引人注意。因此女声分散教徒对经文意义的注意。”[1]自犹太启蒙运动以来，在犹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的音乐作用，尤其是她们参与公共祈祷仪式以及仪式中混声合唱的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上述女独唱者的出现，也许是上海犹太宗教法庭和中欧犹太协会之间的一场斗争的结果。虽然前者在1940年6月和7月两次宣称，这样改革的仪式是违背犹太教教义的——乐器演奏不能用于安息日和某些仪式；“听女人声音是性的引诱”。但后者坚持，按照大多数德奥犹太难民的世俗趣味需要，仪式要有乐器伴奏和女性歌唱。这场争论甚至导致后来半宗教仪式性质的女声合唱团朗格克雷曼(Langer-Kleemann)女声合唱团的诞生。

至于最后到达的波兰犹太人，其中正统派加上最保守的虔敬派(哈西德派)占了大多数，他们的仪式比德奥犹太

1_引自博赫尔曼文。

人的要规范得多。但是有意思的是，在上海，他们的仪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一位波兰难民对当时一次新年仪式的回忆和体验所言：

[犹太]新年前夜[1943年]，会堂里坐得满满的。领诵人波德拉比内克[供职于上海俄罗斯会堂的波兰领唱——引者注]那雄浑的嗓音，加上他非凡的祈祷吟咏，令教徒们激动无比，他们有些人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仪式结束时，人们显然还处于激动之中。一位妇女比喻道，领诵人的表现与其说是在主持一场宗教仪式毋宁说是在演出歌剧，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我也感到，这场仪式是来自家乡那种曾经熟悉的仪式的遥远呼唤。[1]

领唱者及其唱诗班也在其他节日、仪式庆典场合表演，他们擅长于东方犹太人歌曲，合唱混声效果很好。如由玛克特(Heinrich Markt)和爱泼斯坦(Martin Epstein)指挥的自由派礼拜的会堂“哈斯米尔”(Hasmir)男声合唱团，据说当时在上海首屈一指。还有：

瓦绍尔(Max Warschauer)，活跃的指挥家，不仅是优秀的男高音，也被公认为音乐厅音乐家，还是我们社区会堂多年的首席领唱……会堂领唱后任弗鲁赫特(Josef Fruchter)，辉煌的歌手，真正的高音C骑士，在音乐会上也善唱威尔第歌剧中加速的结尾段(stretto)。两位声音有力的低音男中音是考塞尔(Ludwig Korsell)和贝格曼(Hans Bergmann)，还有男低音菲利浦斯波恩(Fritz Philippsborn)和莱文(Louis Levine)，他们都是我们领唱协会无价的支柱。[2]

1_基彭(Kipen, Israel)：《颠簸人生》(*A Life to Live*)，澳大利亚，1989年版。

2_费欧伯(Felber, Erwin)：“文化生活与移民”(Cultural Life and Emigration)，载《上海年鉴1946—1947》(*Shanghai Almanac* 1946—1947)。

下面是笔者掌握的材料中所反映的一些演出：

·在华德路（今长阳路）难民会堂举行过逾越节音乐奉献仪式，感恩上帝，缅怀祖先，节目有希伯来、意第绪歌曲的合唱与独唱，用簧风琴伴奏。

·1941年3月16日曾在汇山路（今霍山路）塔尔（Thal）饭店举行社区庆祝晚会，欢庆有犹太狂欢节之称的普珥节，领唱者协会参加了表演，此外还有舞蹈与演讲。

·1940年7月12日在兆丰路（今高阳路）收容所举行的纪念流散的犹太人的仪式，由会堂的哈斯米尔合唱团演出。

·庆典演出如1942年2月22日庆祝犹太科学会堂成立的演出，由“领倡者协会”主演。

除了仪式性、应景性的表演外，该协会还常举行纯娱乐性的犹太晚会与音乐会，表演会堂音乐及其他犹太音乐。演出地点多在爱而考克路（今安国路）收容所和上海犹太学校（今市教委机关），有时也在汇山路百老汇大戏院。这些犹太晚会和音乐会的赞助者是中欧犹太协会、一些商店（如欧洲面包房）和机构（如厨房基金会）以及个人。表演形式主要是声乐，有独唱、合唱、重唱，有时也有些犹太作曲家所作的犹太风格的，但属西方艺术音乐传统的器乐曲（如布鲁赫的大提琴曲《柯尔·尼德莱》[众誓]，维尼亚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偶尔穿插托莱利、巴赫、亨德尔等人的小曲）。但节目大多是《圣经·诗篇》及一些犹太教宗教经典的配歌，仪式祈祷歌曲（如安息日前夜的Kiddush），犹太、意第绪民间音乐，犹太创作歌曲，犹太教虔敬派（哈西德派）歌曲，

以及19世纪二三十年代意第绪戏剧与轻歌剧歌曲（如已成为民歌的《葡萄干与杏仁》这首著名的摇篮曲）。

犹太教宗教音乐作曲家

上述曲目的作曲家大多是19世纪以来受西方艺术音乐影响的犹太传统的经典作曲家，其中不少是欧洲各犹太会堂的领唱及合唱指挥，比较著名的如：

莱万多夫斯基（Louis Lewandowski, 1823—1894），杰出的犹太学者，犹太教改革运动的支持者。创作、改编了大量传统音乐，编写了犹太教仪式音乐，极大地影响、普及了德国犹太教会堂音乐。作品运用了德国浪漫主义技巧与和声。

苏尔策（Saloman Sulzer, 1804—1891），现代犹太教仪式音乐的创始人之一，会堂歌曲的改革者。结合犹太经文吟诵（Cantillation）改革仪式音乐，作品具有德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风格，创作以舒伯特等人的歌曲为模式。

瑙姆布尔格（Sanuel Naumbourg, 1816—1880），为全套仪式的领唱、合唱、管风琴作曲，抢救了大量快消亡的犹太旋律。

纳代尔（Amo Nadel, 1878—1943），收集、创作了许多犹太民间、仪式音乐。

罗森布拉特（Josef Rosenblatt, 1880—1943），20世纪最著名的犹太会堂领唱之一。

其他受欢迎的作曲家如阿尔曼（S. Alman）、赫许曼（M. Herschmann）、塞孔达（S. Secunda）、考尔尼策（L. Kornitzer）、弗瑞德曼（A. Friedmann）、哥尔德施泰恩（J. Goldstein），以及罗斯金（Roskin）、佩萨霍维奇（Peissachowitsch）、魏瑟（Weiser）、巴孔（Bakon）、维尔考米尔斯基（Wilkomirski）、罗

特施泰恩 (Rothstein)。还有在上海的犹太作曲家贝尔 (Hans Baer) 与领唱者协会哈斯米尔合唱团指挥兼领唱考夫曼，他们也首演自己创作的作品。

意第绪语民间音乐文化

如果说，维持德奥犹太难民音乐生活的是上海领唱者协会，那么维持波兰犹太难民音乐生活，以及连接德奥与波兰两部分犹太难民音乐生活的则是上海犹太俱乐部。该俱乐部系1932年由俄罗斯犹太人所建，常有芭蕾、合唱、演剧、音乐会等活动。20世纪40年代初也成为波兰犹太难民的活动场所，表演意第绪歌曲及戏剧，为俱乐部带了经济收益，也使娱乐多样化。俱乐部原在爱文义路 (今北京西路)，后移至慕尔鸣路 (今茂名北路)，1941年下半年又迁往涌泉路 (今南京西路静安寺)，1947年最终搬到毕勋路 (今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办公楼)。它的几次重要的音乐会如：

·1940年4月17日的意第绪民歌音乐会，由“意第绪民歌手”、“东方犹太歌曲大师”、男中音弗里德曼（Hersch Friedmann）独唱，参加演唱的是克莱娜尔（Grete Kleiner，著名的意第绪民歌手、维也纳艺术歌曲歌唱家）和摩根施特恩（Lia Morgenstem），钢琴伴奏莱茨勒（Max Retzler）。此时波兰犹太难民尚未抵沪，故演出者多是领唱者协会成员。

·1942年3月22日的犹太歌曲音乐会，由立陶宛犹太民歌手佐米娜（Raya Somina）独唱，与领唱者协会的弗里德曼合作，钢琴伴奏索嫩沙依恩（Siegfried Sonnenschein）。节目有犹太、意第绪民歌，也有创作歌曲，如为意第绪语诗人佩雷茨（J. L. Peretz，1852—1915）、琮瑟（F. Zunser，1836—1913）、曼

格(I. Manger, 1901—1969)、格比尔提希(M. Gebirtig, 1877—1942)等所作的诗歌配曲。演出赞助者众多，包括一家眼镜店、一家药房、一家皮货店、一家贸易公司以及一家夜总会等。

·1942年7月8日的犹太、意第绪歌曲音乐会，也由佐米娜独唱，领唱者协会首席领唱、男高音瓦绍尔参加演出，钢琴伴奏玛库斯(Ervin Marcus)教授。节目除民歌外，也有创作歌曲，即为意第绪语诗人佩雷茨、格比尔提希、布罗德森(M. Broderson, 1890—1956)等的配曲。此次演出主要由一些个人赞助。

·1943年2月7日，在进入虹口"隔离区"前夕，拉娅·贝尔沙德斯基(Raja Bershadsky)，联袂艾尔鲍姆(M. Elbaum)在上海犹太俱乐部举行了一次歌曲、音乐、幽默晚会，参加者中还有小提琴家里斯金(M. Riskin)，大提琴家约阿希姆(V. Joahim)和舍恩巴赫(L. Schoenbach)等。

1941年，意第绪剧人肖沙诺 (R. Shoshano) 一到上海便组织剧团演出意第绪戏剧，也举行音乐会以及包括戏剧片断的晚会。如1941年11月17日举行的"活的艺术的音乐会"，肖沙诺演唱了创作歌曲，如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俄国诗人安-斯基 (sh. An-Ski. 1863—1920) 、弗鲁格 (S. Frug, 1860—1916) 、波兰意第绪语诗人格拉德 (Ch.Grade) 及波兰诗人尤文 (J. Juwin) 等人诗歌的配曲。维也纳歌手克莱娜尔同台演唱犹太歌曲、虔敬派 (哈西德派) 歌曲，钢琴伴奏是领唱者协会乐长莱茨勒。演唱者还有林卡 (Clara Lin) ，用手风琴自伴自唱一些犹太歌曲。此外还有一些伴乐戏剧表演 (musical show) 。

西方流行音乐文化

在二战前，犹太音乐家对欧洲的爵士乐和流行乐影响特别大。犹太音乐家和娱乐业人员对欧洲的娱乐体裁卡巴莱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欧洲中心城市也有大批犹太观众，如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和华沙等。

上海开埠以后，逐渐发展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战前已经有非常兴盛的夜生活，从业人员主要是菲律宾人和俄罗斯人。犹太移民音乐家中有不少是在原居住国从事音乐娱乐业的人。这批人力量很强，生计迫使他们受雇于上海各种酒吧、夜总会、咖啡馆、餐馆、屋顶花园，因此这些演出场所便成了维持犹太-西方流行音乐文化的机构。这类工作不强调特别的音乐知识，也不难保住饭碗，但有些统称为酒吧音乐家的，其能力不亚于他们严肃音乐的同行，不能小看他们。有的夜总会爵士歌手，如克罗托勋斯基（H. Krotoschinski），后来成为虹口演出团中的轻歌剧明星。除歌手外，犹太音乐家在上海流行音乐中多担任钢琴手，其他则有担任手风琴手、小提琴手、萨克管手及打击乐手的。

犹太难民音乐家大批到达以后，尤其在法租界和虹口建立了许多娱乐场所，至1941年下半年至少已经有17个乐队，对音乐市场——包括人员与薪金造成压力。1940年2月底，首先由犹太难民小提琴家莱斯腾（Oskar Leisten）发起并成立一个移民职业音乐家的同业工会——国际音乐家协会（IMA），不久人数便达到144人，占据移民职业音乐家的98%。之后，人们又扩大这个组织，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音乐家协会，试图包括上海所有的职业音乐家，并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上海音乐家协会（SMA），参加的音乐家达300人，几乎是这一行业的90%的人员。主席是福克勒（Bob

Fockler)，代表委员会中有菲律宾人、俄罗斯人、犹太难民各2名，美国人和中国人各1名，还曾打算给日本音乐家一个席位。该组织保障了音乐家的利益，如职业介绍、工资、合同、法律权益、医疗乃至死亡抚恤等。[1]犹太难民的流行音乐演出形式主要有5种：卡巴莱表演，音乐会之后的酒吧余兴表演，各种晚会、舞会，以及推销新酒的“新酒之夜”演出。

卡巴莱表演　这是一种西方娱乐形式，即在夜总会、饭店的歌舞、滑稽、短剧的即兴表演，是中欧，尤其是维也纳的三大流行体裁之一（另两种是轻歌剧和圆舞曲）。正如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波尔曼在论述欧洲犹太人的音乐时所言：

19—20世纪的某些娱乐体裁，如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和华沙的卡巴莱，若没有犹太音乐家的贡献，是不可想象的。

……

二战前的几十年，犹太音乐家对欧洲爵士乐和流行乐的影响特别重要。犹太音乐家和娱乐业演员为欧洲卡巴莱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许多卡巴莱表演，尤其是在中欧大城市，可能主要观众都是犹太人。

同样，在战时的上海：

卡巴莱艺术在虹口的观众几乎可以说是很多。所有有助于健康的笑声和幽默的时光，咖啡馆里的卡巴莱晚会，所有那些丰富多彩的家庭晚会，都同完全的喜剧相似。无论是戈恰克（Gottschalk）的《六个人一听碎牛肉》或《一中有十》，还是施莱辛格（Erwin Schlesinger）的幽默节目主持，或策尔尼克（Herbert Zernik，也是一个成功的幽默主持人）的

1 《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0年10月13日。

滑稽模仿或他的《圣保罗的姑娘》，都会引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卡巴莱的气氛无处不在。这在卡巴莱明星7人团特别明显（即Gottschalk, Guenther, Loeschner, Kurt, Lewin, Wolff, Katznot-Cardo），不时也有些女士客串表演（如Rausnitz, Frank, Lewison, Maretzki, Thieme）。应该承认他们维持了犹太艺术，在幽默和忧郁中发现了真正的犹太情操。他们常常表演《老埃尔西格［Ersig］去跳舞》《塞莉阿姨离婚》《加拿大遗产》等节目，博得满堂的笑声。[1]

此外还有肖沙诺意第绪剧团在犹太俱乐部演出的时事讽刺剧《快乐的炸弹》亦是卡巴莱歌舞性的。

音乐会后的酒吧余兴表演　音乐会后难民们也常去霞飞路（今淮海路）1002号的夜总会听俄罗斯的巴拉莱卡拨弦乐队的余兴表演，也有去华德路（今长阳路）上的皇帝咖啡餐厅欣赏罗森讷尔（willy Rosener）演出队的轻音乐和舞蹈，并品尝来自维也纳的饭菜。

各种晚会　各种晚会演出歌舞、音乐幽默表演，常在屋顶花园、收容所，有时也在犹太俱乐部演出。如上海难民中的著名电影明星、轻歌剧明星莉莉·弗罗尔（Lily Flohr），她掌握多种语言的曲目，一再被宾馆、夜总会聘用，很受欢迎。她还在《乞丐歌剧》中客串波丽一角。

最轰动的一次大型演出是1939年6月28日在汇山路百老汇大戏院（今东山影剧院）屋顶花园莉莉·弗罗尔的上海首演——“上海之周”。联袂演出的还有歌剧女星迈尔-弗朗克（IIse Myer-Frank），踢踏舞女星施特恩（Helga Stern），轻歌剧谐星弗里德曼（Walter Friedmann）。由小提琴手韦伯（Eddy Weber）及其小乐队伴奏，韦伯还用10种语言演唱各

1_马哥林斯基（Margolinski, Henry）：“上海团体的音乐特色”（Musical Characters in Shanghai Commisions），《上海年鉴1946—1947》（*Shanghai Almanac 1946—1947*）。

国流行歌曲，乐队其他成员为：钢琴兼作曲勒瑟尔（Albert Loeser），打击乐罗伯特（Siegfried: Robert），萨克管卡茨（Max Katz），手风琴罗斯蒂（Henry Rosety）。除音乐表演外，还有上海夏季选美（由莉莉·弗罗尔和迈尔-弗朗克两位女星作评委）及拳击比赛两项活动。选美，加上3位女主演和2位女评委，为晚会增加了女性色彩；而拳击——男性的活动，似乎又在平衡活动中女性的主宰色彩。可见性别在维持一种文化方面具有特别的作用。

莉莉·弗罗尔的演唱及小品表演，有时还穿插一些器乐小品如犹太作曲家布洛赫的小提琴曲《美名大师》（Baal Shem，即Baal Shem Tov，犹太教哈西德派创始人，该曲副标题为"哈西德教徒生活的三幅画面"），萨拉萨蒂的《茨冈人之歌》。她的戏装专由"意丰诗"时装店（Modesalon"YVONSE"）定做。

又如1941年新年前夜，来自法租界、公共租界和虹口的犹太人盛装而出，早早到达了各娱乐场所，在各个夜总会、咖啡厅等处，观看舞蹈、歌唱、奏乐等表演。舞蹈如多尔（Little Doll）的《多瑙河之波圆舞曲》和索墨尔的（Lotte Sommer）《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还有莉莉·弗罗尔的流行歌曲；在百老汇和东海剧院聆听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的演出，如宋雅（Sonja）的俄罗斯舞蹈和瓦绍尔的莫扎特歌曲，以及新年颂词朗诵。但这样的狂欢气氛也触发了不少人的思乡之情，令他们黯然泪下。

有时这类晚会也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功能。如1941年3月的一个星期日庆祝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成立一周年晚会。虹口犹太谐星策尔尼克主持晚会，节目有多尔的舞蹈《1841—1941》；安国路难民营谐星戈恰克的

流行歌曲《大衣》；马戈林斯基为女歌唱家罗比切克 (Lisa Robitschek) 伴奏的《我心中响起一支歌》(选自轻歌剧《告别华尔兹》）和《我热吻的嘴唇》）；希尔达和瓦尔特·弗里德曼 (Hilde and Walther Friedmann)，以及贝尔格 (Walter Berg) 选自轻歌剧的流行歌曲；黑勒 (Fritz Heller)、戈恰克和恩格尔 (Erwin Engel) 的滑稽短剧《请小心》等。

再如1941年12月14日下午塔楼 (Tower) 夜总会乐队假温莎咖啡馆举行音乐会，为贫困的犹太儿童的光明节活动募捐。参加的音乐家都是上海当时一流水平的，如有来自哈尔滨的小提琴家菲德龙 (George Fidlon)，钢琴家赫尔伯特和伯恩哈德·鲁夫 (Herbert and Bernhard Ruff)，打击乐手高特里伯 (Fred Gottlieb)，还有舞蹈表演。

又如1942年8月2日在华德路花园，由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举办的"慈善大型表演"。节目有舞蹈和夜总会娱乐表演，演员多为名家，如杂技狐步舞和探戈，俄罗斯农民舞和吉卜赛舞，波兰玛祖卡舞（贝格尔 [Lizzi Berger]、多 [Robertson Duo]、索墨尔 [Lotte Sommer] 等表演）；各国歌曲 (莉莉·弗罗尔)，意第绪歌曲 (佐米娜)，艺术歌曲 (瓦绍尔)，滑稽表演 (戈恰克和弗里德曼) 等。由沙逊家族、白马咖啡馆等赞助。

此外，有时还在时装表演晚会上表演歌舞音乐，如1942年8月16日在汇山路 (今霍山路) 57号玛斯考特 (Mascot) 屋顶花园举行的大型时装表演及儿童时装表演，节目有瓦绍尔的演唱，阿罗 (Jolly Arro) 的口琴独奏，凯尔-巴斯夸尔 (Justus Keil-Pasqual) 的芭蕾舞，库特尔 (Klein Kurtl) 的舞蹈 (舍恩巴赫为舞蹈伴奏)，伯恩哈德 (Bernhald) 乐队演奏。艺术指导莱文斯 (Walter Lewens)。海报上特地注明，票价

5元，门票收入全部交给厨房基金会。

舞蹈晚会 如1939年11月16日在百老汇大戏院由舞蹈家弗尔斯特-布拉格 (Dutty Foerster-Prager) 举行的舞蹈晚会；1942年1月31日在今东大名路瑞克斯 (Rex) 酒吧庆祝芭蕾大师凯尔-巴斯夸尔从艺20周年的演出。他曾在德国柏林大剧院、德国剧院和德国歌剧院受过艺术舞、芭蕾、体操、音乐专业训练，最初在巴黎获得成功，后来在欧洲巡演中作为独舞和芭蕾大师而获得国际声誉。1939年到达上海时身无分文，先在索阔尔斯基学校教俄罗斯芭蕾和轻歌剧，后独立在沪创立自己的舞校，开设古典舞、杂技、民间舞、性格舞以及现代滑稽舞，尤其以教授交际舞和体操出名，该校的儿童舞蹈队演出深受欢迎。1942年3月5日犹太普珥节曾在瑞克斯咖啡酒吧举行舞会。有时也有通俗的舞曲专场音乐会 (如由难民“1939室内乐团”所举办的)。

“新酒之夜”(Heuriger Abend) 演出 如在杨浦福特街 (今福禄街) 100号的棕榈花园咖啡餐厅酒吧，在百老汇路 (今大名路) 18号考利波里 (Colibri) 咖啡餐馆，都有免费入场的奥地利新酒品尝兼维也纳轻音乐“施拉默尔” (Schrammel) 听赏晚会，由克莱恩-卡普里瑟-克莱布斯 (Klein-Kaprise-Krebs) 三重奏团或卡普里瑟 (Kaprise) 四重奏团演出，也有歌舞表演。这种“施拉默尔”风格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 (约1878年) 维也纳的酒馆，成为维也纳民俗和流行音乐的品牌。每逢新酒上市，必以轻松愉快的小曲歌颂之，由小提琴手约瑟夫和约翰·施拉默尔 (Josef und Johann Schrammel) 两兄弟创建的三重奏组 (另加一把吉他) 演奏。约1886年起，重奏再增加一支G调短单簧管，后来又被一架手风琴取代。两兄弟改编了许多维也纳歌曲和小曲，后来曲目中包括圆舞曲、

进行曲、波尔卡等。一种异国民间传统，以联觉形式——音乐加美酒、乐器加酒吧——被完整地移植到一块移民飞地，在上海的城市公共空间里复制了一个人们心中想象的、却也是实在的维也纳社会。以这种熟悉的五官联觉，为难民们制造了一种“回家”的错觉，一种“想象的社区”。

西方艺术音乐文化

西方艺术音乐文化是欧洲犹太难民居住国的主流文化。西方艺术音乐史离不开犹太音乐家的贡献。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音乐生活中，犹太人作为音乐家和观众支持了欧洲各种音乐会，社区外的音乐会后来又影响了社区内的音乐生活。犹太管弦乐团、室内乐团、合唱团、犹太音乐家沙龙纷纷出现，积极参加社区内和社区外的音乐会演出，这种交流形成了犹太音乐的社会流动性，也是犹太启蒙运动后犹太资产阶级社会兴起的独特标志。难民们相信，“音乐能够给欧洲犹太人一种手段，了解他们的过去，并在犹太-欧洲的文化环境中生存下去。”[1]在上海维持这一文化的机构是上海的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该协会曾一度主宰了犹太难民的文化生活。它是由虹口创作协会 (Hongkewer Arbeitsgemeinschaft) 和艺术家俱乐部 (Art Club) 合并而成的一个维护艺术家利益的组织，成员包括犹太难民艺术家以及犹太文化之友。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成立于1940年3月，它声称组织的性质是“公益的文化联合会”，宗旨是“不仅仅为我们的艺术家才能开辟一个尽可能大的活动领域，而且共同努力为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指引方向”。[2]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得到了上海犹太大亨维克多·沙逊爵士，匈牙利人保罗·科莫尔 (Paul Komor) 领

1_引自博赫尔曼文。

2_《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1年8月3日。

导的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 (KC)，以及荷兰商人米歇尔·斯皮尔曼 (Michel Speelman) 领导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 (CFA) 等的资助。

创始之初，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主要演出戏剧，包括轻歌剧，如艾斯勒的《汉尼去跳舞》，但没带来经济效益，几次失败后，于1942年终止了演剧，开始音乐演出。其实，早在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成立一周年时 (1941年)，它就把音乐会代理和戏剧代理两个机构合二为一，充分代表艺术家的利益，既为发展艺术，也为艺术家的生存而斗争。因此，它还策划成立自己的联合乐团，举行音乐会，准备演出一两出整部头的歌剧。1941年10月，它又建立了附属机构——上海合唱联合会 (Shanghai Choral Union)，联结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虹口三区的犹太难民歌手。

该协会主席是《上海犹太早报》的主编莱文 (Ossi Lewin)，他赞助了无数次演出；副主席是马哥林斯基 (Henri Margolinski) 教授，马氏在上海的音乐生活中无处不在，既是钢琴家 (有"钢琴诗人"之称)，也是受欢迎的交响音乐会常任指挥。他的助手舍恩巴赫 (Leo Schoenbach) 多才多艺，擅长歌剧、轻歌剧，以及大提琴、钢琴伴奏。1945年他去世后，人们曾在百老汇路 (今大名路) 汇山剧场举行过纪念他的舍恩巴赫上海作品大型通俗音乐会。协会艺术指导费尔伯 (Ewin Felber) 教授，任教于沪江大学，也是上海音乐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并在上海的英、德文报刊上发表乐评，同时还学习中国音乐。艺术顾问是德雷夫斯 (Alfred Dreifuss) 博士，他为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提了许多创意，也是该协会第一次音乐会的发起者。

据《上海犹太早报》1940年特号《上海音乐生活》一

文，犹太难民社团初期最重要的音乐家有4位指挥：马哥林斯基、富克斯（Leo Fuchs）、舍恩巴赫、玛库斯（Erwin Marcus）；两位小提琴家卫登堡（Alfred Wittenberg）教授和阿德勒（Guido Adler）教授（在德国都已非常闻名）；大提琴家温克勒（Ernst Winkler，具有国际声誉，前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家）；钢琴家贝尔（Hans Baer，德国伊巴赫奖得主）；男高音歌唱家克拉索（Ernst Krasso，前柏林文化协会会员）；女歌唱家罗比切克（Lisa Robitscek）、依尔瑟·玛库斯（Ilse Marcuse）博士，以及依瑞娜·塞德尔-马哥林斯基（Irene Seidl-Margolinski），领唱者协会首席男中音瓦绍尔，犹太民歌演唱家及会堂领唱弗里德曼（Hersch Friedmann）。

有意思的是，从该文中还可以看出，到此时，犹太音乐家已经意识到，上海的音乐生活并非如他们刚刚抵达时所认为的那样“平庸”“水准不高”，面对事实，他们承认：

首先是工部局交响乐团——城市最杰出的音乐机构，形成了本地音乐生活的支柱，它也会给每一座欧洲城市带来光彩。人们可以对它提出最高要求……乐团有两位杰出指挥：帕奇（一译梅百器——引者注）大师和乐队首席富华教授。两位都是卓越的管弦乐队教育家和音乐家。在10月到次年5月的演出季节期间，每逢周日都在兰心戏院举行交响音乐会，可以聆听来自世界各国的音乐家的表演。节目丰富多彩，也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遗憾的是，城市没有一支固定的歌剧团，不时地只有一支俄罗斯团体在演出歌剧。[1]

上海犹太难民的西方艺术音乐生活最早见于1939年初，当时几位最早抵沪的音乐家常常下午去上海犹太俱乐

1_《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0年特刊。

部奏乐，以娱乐客人，晚上举行音乐会。这些先到者中较出名的是钢琴家马哥林斯基教授、贝尔、瑞茨勒 (Max Rezler)、索嫩沙依恩 (Siegfried Sonnenschein)；小提琴家卫登堡教授，作曲家暨小提琴家弗兰克尔 (Wolfgang Fraenkel)，14岁的天才神童哥尔德施密特 (Bernharfl Goldschmidt)；大提琴家舍恩巴赫、约阿希姆；歌唱家瓦绍尔、弗里德曼、菲利普斯波恩、贝格曼 (Hans Bergmann)、考塞尔 (Ludwig Korsell)、爱琳·塞德尔-马哥林斯基夫人等人。

早期也曾在上海美国妇女俱乐部举行过一次特别的西方艺术音乐会，演出的曲目包括钢琴家、作曲家贝尔的东方犹太人巴勒斯坦风格的4首钢琴序曲，以及从门德尔松到科恩戈尔德等西方犹太作曲家的作品，参加演出的有马氏夫妇、贝尔、卫登堡和弗里德曼等。

音乐会与乐团　严肃音乐很难维持，但对难民意义重大，他们发现可以以此进入上海的上层社会。他们除了参加家庭音乐会和客串演出外，很快就出现在工部局乐队、兰心大戏院、新成立的上海爱乐乐团、教堂音乐会、大型晚会的节目单上。难民音乐家中的佼佼者（至少有10人）很快就被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吸收。EJAS也举办过一些独奏音乐会和室内音乐会，如马哥林斯基在东海大戏院指挥的爱乐音乐会。

维持严肃音乐的另一种机构是难民自己组织的乐团，最突出的要数“1939室内乐团”，其宗旨是“通过培植古典音乐和轻音乐而为文化生活服务”。它每月至少开一场音乐会，同第一流的独奏音乐家合作，地点是虹口大型影剧院中的某一家。此外，它也演出声乐作品、歌剧与轻歌剧，同时建立一支混声合唱团。为此，它还向公众募捐。该乐团一下子排出

了7场音乐会节目，作品出自下列作曲家：贝多芬、莫扎特、亨德尔、巴赫、科雷利、普赛尔、布鲁克纳、西贝柳斯、海顿、舒曼、舒伯特、布拉姆斯、马勒、门德尔松、梅于尔、比才、柴可夫斯基、科奥戈尔德、格里格、施特劳斯父子等。

第一场音乐会1939年9月25日举行于百老汇大戏院，指挥富克斯（Leo Fuchs），钢琴伴奏贝尔。同其业余性质相适应，节目皆是小作品：莫扎特的《巴斯蒂和巴斯蒂安娜》序曲、《弦乐小夜曲》，格里格《培尔·金特》组曲中的两段，亚当的歌剧《纽伦堡玩偶》序曲，以及男低音莱文（Louis Levin）演唱的乔尔达尼、舒曼、舒伯特、阿莱维（犹太作曲家）、尼古拉、古诺等的歌剧选段与艺术歌曲。

第二场音乐会1939年10月31日也举行于百老汇大戏院，指挥也是富克斯，节目多为乐队作品，有巴赫《勃兰登堡协奏曲》之三，格里格《从霍尔贝格时代》弦乐组曲，莫扎特《后宫诱逃》序曲，格拉祖诺夫《第二小夜曲》，施特劳斯《春之声圆舞曲》，以及由贝沙德斯基（Raja Bershadski）太太独唱的柴可夫斯基《黑桃皇后》中丽莎的咏叹调、普契尼《托斯卡》选段以及柯蒂斯的歌曲等。

第三场音乐会1940年2月27日演出于东海大戏院，由工部局乐队成员参加演出，客座指挥医学博士玛库瑟（Erich Marcuse）。节目比前两次层次更高，如巴赫《勃兰登堡协奏曲》之三（为羽管键琴与弦乐队而作），门德尔松《苏格兰交响曲》，以及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独奏勒威特[Wilhelm Loewit]）。这场音乐会很有水准。

除了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中欧音乐家协会（ACEM），以及“1939室内乐团”外，还有指挥埃因齐希（Albert Einzig）组织的一个难民业余乐团，仅举行过一次花园音乐会，同样

有职业音乐家的支持，演出古典及轻音乐作品，但不太成功。坎姆普 (Erna Kempe) 为迎合观众口味，建立过一支轻音乐小乐队。同时，独立的室内乐重奏组则有4支，即：

三重奏组：马哥林斯基/弗兰克尔/温克勒、贝尔/卫登堡/舍恩巴赫、寇讷尔/哥尔德施密特/约阿希姆 (1945年成立)；弦乐四重奏组：皮乃特-格拉斯/费德龙/希尔施费尔德/曼齐克。

其中仅有贝尔/卫登堡/舍恩巴赫这一组合在上海音乐社团中站住了脚，以室内乐晚会形式演满两个演出季，上座率较高，曲目包括古典、浪漫、现代三大类。

独唱音乐会、歌剧和轻歌剧　由于角色不全，难民中始终未成立一个固定的歌剧团，只排演过《卡门》《吟唱诗人》《浮士德》《乡村骑士》等歌剧 (据说《卡门》演出还失败过一次)，指挥是大提琴家舍恩巴赫。声乐家常常只能局限于独唱音乐会或在综合音乐会上演唱。此外，女高音朗格-克雷曼太太 (Margit Langer-Klee mann) 指挥着一支以她名字命名的、训练良好的难民女声合唱团。

独唱音乐会如：

1937年1月3日在上海犹太学校（今市教委机关）礼堂举行的巴勒斯坦歌剧的花腔女高音雅诺夫斯卡（Miriam Rap Janovska）音乐会，由亲美的“犹太圣裔社”（Bnai Bnth）赞助。

1939年10月28日在霞飞路（今淮海路）1825号成功学校（Success School），男中音弗里德曼（Hersch Friedmann）举行意第绪语民歌演唱会。

1940年4月17日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35号犹太俱乐部，弗里德曼举行意第绪语民歌演唱会，并有歌唱家克

莱娜、摩根施特恩（Lia Morgenstern），钢琴家瑞茨勒（伴奏）等人助演。

1942年2月19日在东余杭路627号上海犹太青年学校（SJYA）举行EJAS艺术歌曲独唱会，曲目选自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布拉姆斯、沃尔夫、瓦格纳、里夏·施特劳斯、马克斯、穆索尔斯基等，演出的歌唱家是女高音罗比切克，女中音拉普（Sabine Rapp），男高音贝格曼（Hans Bergmann），钢琴伴奏马哥林斯基教授。

犹太钢琴家还应邀为社区外的独唱会伴奏，如勒威特曾去兰心大戏院为女低音斯图尔特 (Mary Stewart) 伴奏。

轻歌剧这种半古典、半通俗体裁比音乐会和歌剧更受欢迎。因为：

19世纪中叶出现的轻歌剧主要是经济-社会变化的结果。随着中产阶级，以及随后的工人阶级的人数日益增长，能够表明自己的娱乐需求，要求一种能够理解的、曲调好听的歌剧娱乐形式，为他们度身定制，以适合他们没有意大利大歌剧那样高深的文化修养……歌剧和整个所谓的古典音乐领域日益复杂、艰深，其发展方向使自己精英化、脱离大众趣味。[1]

于是轻歌剧体裁应运而生。在一天辛苦之后，人们尤其是缺乏较高音乐素养的人，渴望轻松幽默的精神食粮。难民们建立了轻歌剧团，虽内部有矛盾，甚至导致分裂，但7年中 (1939—1946) 举行了无数次演出，尤其是在经济、场所、技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在影剧院狭小的舞台上或大厅

1_卡蒙德 (Gammond, Peter)："轻歌剧"(Operetta)，《牛津流行音乐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opular Music*)，牛津，1991年版。

讲台上，产生出水准惊人的演出。指挥先后有布拉格 (Fritz Prager)、舍恩巴赫等人，他们同时担任乐队乐长，他们两人都在上海俄国轻歌剧团兰心大戏院的演出中兼任指挥，故犹太难民的轻歌剧演出颇有俄国风味，后来又有哥尔德曼 (Walter Goldmann) 和魏斯 (Paul Weiss) 等担任指挥。演出过的轻歌剧有莱哈尔的《风流寡妇》(1905) 和《卢森堡伯爵》(1909)，以及小施特劳斯的《蝙蝠》(1874)。《蝙蝠》也曾由马哥林斯基指挥，在兰心大戏院演出。

尤其要提及多部轻歌剧的主演——维也纳姑娘罗沙 (Rosl Albach Gerstl)，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罗丝儿"，她的演出征服了无数观众。如1942年2月24日和29日在汇山路（今霍山路）57号百老汇剧院演出的《风流寡妇》，导演弗里德曼 (Walter Friedmann)，参加演出者中有巴鲁赫 (Inge Barnch)、希尔达・弗里德曼 (Hilda Friedmann)、贝尔格 (Walter Berg)、君特 (Max Guenther) 等，并由一支15人的乐队伴奏。

还要提及指挥布拉格，前柏林歌剧院指挥，在上海业余戏剧俱乐部成功演出过匈牙利作曲家贝尔特 (Heinrich Berte) 基于舒伯特音乐和生平的轻歌剧《紫丁香时节》(*Lilac Time*，即原为德国歌唱剧构思的《三女屋》[*Dreimaederlhaus*])，罗沙等参加演出。布拉格还把带到上海的约30部轻歌剧的钢琴谱，重新改配成管弦乐谱。在"隔都"时期他也作曲并上演了自己的一部轻歌剧。

其他轻歌剧明星有克罗托勋斯基 (Heinz Krotoschinski)、布罗依尔 (Clara Breuer) 小姐等。此外还演出过一些二流的维也纳轻歌剧，如在东海剧院演出法尔 (Leo Fall) 的《快乐的农夫》(*Der Fidele Bauer*，1907)。

难民们也演出过一些自己创作的轻歌剧，据说难民音乐家在上海创作了5部自己的轻歌剧，演出过27次，如钢琴家、作曲家索嫩沙依恩（Siegfried Sonnenschein）所作《告诉我，你是否爱我》，1946年曾在虹口首演，获得成功。

另外还演出过一些德国现代歌剧，如魏尔带爵士风味的《三分钱歌剧》和洪佩汀克以瓦格纳风格创作的《汉泽尔与格蕾特尔》（该剧1942年在爱而考克难民所由波尔［Otto Poll］主演）。还有艾斯勒的《汉尼去跳舞》（如1942年8月9日演出于唐山路145号露天剧场，用乐队伴奏）。

也举行过轻歌剧唱段的音乐会。曲目选自莱哈尔的《风流寡妇》、卡尔曼的《恰尔达什女王》（1915）和《马丽扎伯爵夫人》（1924），以及贝尔特的《紫丁香时节》（1916）等。演员是维也纳红星罗沙、男高音布罗德曼（L. Brodmann）和弗里森（E. Friesen），还有布罗依尔小姐等的独唱、二重唱与四重唱。舞蹈家弗里瑟尔（F. Frieser）上台献舞，他组织过多次明星演出，还担任轻歌剧指导。

轻歌剧尤其受青少年的欢迎，为他们童年枯燥的难民营生活增添了乐趣。如当时一个青少年后来所回忆的：

……那些令人玩味的夜晚是这样度过的，在兆丰路（现高阳路）难民营听男孩“室长”表演熟悉的轻歌剧，如《马丽扎伯爵夫人》的著名选曲和对话。男孩子们聚集在表演者的床铺前，或者天气好的时候在室外花园里，当他唱起《无钟之城》（The Town without Bells）和《风流寡妇》或者最受欢迎的《恰尔达什女王》时，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那些日子真像在天堂，听逐句演唱和讲解，时间并不比真实现场的演出短[1]。

1_瑞斯塔诺（Ristaino, Marcia）：《最后求助的港口：上海的离散者社团》（*Port of Last Resort: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of Shanghai*），斯坦福，2001年版。

轻歌剧还通过电影媒介广泛流传。如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已经有50多家电影院，当时难民最喜爱的音乐片是好莱坞1934年摄制的《风流寡妇》(珍尼特·麦克唐纳 [Jeanette MacDonald] 和莫里斯·薛瓦利埃 [Maurice Chevalier] 主演)。

除上述外，活跃在上海的难民独奏、独唱家还须提及的有女钢琴家盖尔斯特尔 (Bronislawa Gerstel，伊巴赫奖得主) 和布洛赫 (Jeanette B1och)，维也纳钢琴家勒威特 (Wilhelm Loewit) 及青年钢琴家寇讷尔 (Robert Kohner，擅长李斯特及现代作品)，严肃音乐/轻音乐两栖钢琴家索嫩沙依恩 (Siegfried Sonnensehein)；小提琴家施莱辛格 (Joseph Schlesinger)，施泰讷尔 (Adolf Steiner)；小提琴家皮乃-格拉斯 (Santa Pinettet-Glass)，以及卫登堡的学生、天才少年哥尔德施特密 (Bernhard Goldschmidt)；大提琴家温克尔 (Eugen Winkel)，泼尔格 (Max Porge) 及天才少年约阿希姆 (Walter Joachim)；歌唱家有女低音瑞塞克 (Bella Resek) 和科讷尔 (Margret Koemer)，女高音朗格-克莱曼 (M. Langer-K1emann)，男低音莱文 (Louis Levine)，男中音考塞尔 (Ludwig Korsell) 和贝格曼 (Hans Bergmann)，以及克拉索 (Ernest Krasso) 等。

媒介的作用：报刊和广播

德奥犹太难民到上海后仅仅两三个月，就创办了第一份德文报纸，不到半年就有了德语广播。在上海，他们出版了多种德语报刊，最重要的如《上海周报》(*Shanghai Woche*)、《黄报》(*Die Gelbe Post*)、《八点种晚报》(*8-Uhr Abendblatt*)、《上海晨报》(*Shanghaier Morgenpost*)、《上海犹太早报》

(*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5年11月后改名为《上海回声报》*Shanghai Echo*) 等。波兰犹太难民则出版了意第绪语报刊《我们的话》(*Unser Wort*) 和《我们的世界》(*Unser Welt*) 等。

本章乃至全书的大多数材料，均来自当时的这些报刊文章。

从报刊文章和评论看出，犹太移民对演剧、音乐会、卡巴莱演出的反应非常强烈，文化活动在他们中间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也许可以说，只有戏剧、音乐和小型演出以及同报界结合，才在难民社团内产生了一种公共性，以及一种市民－社会结构。如同弗里德兰德尔［Friez Friedlaender］所称，一次EJAS音乐会，一次歌剧之夜，就是一次一流的社交事件，使他回忆柏林和维也纳的首演之夜。得体和盛装的观众挤满了共济会大厦豪华的演出厅，其内部建筑装饰令来自柏林的移民回想起克莱斯特大街上昔日的共济会大厅里的包厢。[1]

笔者也发现，报刊关于音乐表演的报道和评论，不仅在上海制造了一个“想象的社区”——柏林和维也纳在上海的“飞地”，也制造了一种身处逆境但却乐观向上的语境或气氛。此外，我们在本章某些段落已经看到，以及在下两章也将要看到，报刊的话语也充满了乐观、浪漫的情调，包括不失时机地赞美女性的表演，看来性别话语在艰难时世的确能够鼓舞人们的精神。

电台也是移民音乐活动的一个领域。1940年夏季，上海已经有40多家电台，大多数是中国人办的，波段局限于当地，为商业性的目的而设。移民参与的电台主要是两家：

1_阿姆布鲁斯特，科尔施特鲁克和米尔贝格 (Armbruester, Georg, Koehlstruck, Michael and Muehlberger ,Sonja) 编：《逃亡在上海1938—1947，流亡中的犹太生活》(*Exil Shanghai* 1938—1947, *Juedisches Leben in der Emigration*)，柏林，2000年。

XMHA和XGDN。

XMHA电台（即西人华美电台，在跑马厅路［今武胜路］）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经营的，1939年5月2日开始了每天1小时的德语节目（有时还有波兰犹太人的专门节目）。在"德国难民项目"的指导下，委托当时才23岁的莱文（Horst Levin）来负责并参加播音。他播音的开始信号是法国作曲家古诺的歌剧《浮士德》第四幕第三场的"士兵合唱"——"上帝不朽的荣耀"，1小时后，节目以巴赫、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奏鸣曲结束。许多移民男女艺术家去电台表演，其意义是：在移民潮的开始几个月，既创造了交流空间，也让艺术家的存在得到自我证实。该电台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还能够继续播音。

XGDN电台据说隶属于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还有一说，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二战开始时在XGDN电台设立了像BBC那样的德语节目，为盟国宣传。负责的编辑是亚当（Peter Adam），他创立了反法西斯的"自由德国舞台"节目。

XMHA用600千赫的频率，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播出1小时的德语新闻、娱乐、课程以及广告节目。据说收藏有1万张唱片，包括古典和爵士音乐。因为XMHA附属于NBC，而NBC又附属于RCA，故收藏有RCA Victor几乎所有的唱片，堪称亚洲第一。在1941年12月7日的《上海晨报》上，我们发现了它一周的主要节目表，其中音乐节目有：周日的歌剧选播和托斯卡尼尼指挥的NBC交响乐团的交响音乐会，周一的独奏、独唱小曲，周五的古今舞曲，周六的听众点播节目等。去电台表演的音乐名家有：卫登堡教授（小提琴）、贝尔（钢琴）、舍恩巴赫（指挥/大提琴）、沃

尔夫(Arthur Wolff)博士(钢琴)和古特金德(Gutkind)、罗沙(轻歌剧)、爱泼斯坦的会堂合唱队，还有策尔尼克和戈恰克等人的滑稽歌舞表演。此外，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的德雷夫斯博士的音乐史讲座节目办到了XGDN电台，如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的《莫扎特其人其乐》，由女高音马哥林斯基夫人独唱，由其丈夫伴奏。

XMHA播出后几周，每天下午的节目成为虹口日常生活的一大特色。有收音机的难民可以在家里收听，没有收音机的则拥到欧式咖啡馆和饭店去收听。据说，一个德国工程师利用这一新的需求，制造并在自己汇山路上的小店里卖出几百台廉价收音机。每逢周六，莱文还播出一个听众音乐点播节目，有人甚至把自己的流行歌曲唱片借给电台，如俄罗斯犹太夜总会的美籍音乐剧女歌星索菲·特克(Sophie Tucker)那脍炙人口的《我的意第绪妈妈》(*My Yiddishe Marne*)，尤其在上海俄罗斯犹太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其深情而略带忧伤的怀旧情调词曲引起很多难民的共鸣：

我的意第绪妈妈，我比以往更需要她，
我的意第绪妈妈，我想吻她满是皱纹的额头。
我渴望如同过去那样再握住她的手，
求她原谅，我做了那些让她伤心的事。
她的欢乐那么少，她从不在乎是否时髦，
孩子的笑容就是她的金银财宝。
哦，我知道我今天的一切都来自她，
那个亲爱的小妇人，她已年迈，满头白发，
我的一切都来自她，我那个了不起的意第绪妈妈。

结　语

源于中东的希伯来音乐文化，发轫于欧洲的意第绪音乐文化，乃至犹太人居住国传统的西方艺术音乐文化和流行音乐文化，它们不但是维持音乐家生计的谋生手段，也都具有维系上海犹太难民群体内聚力的作用。因此，无数犹太音乐家在艰难的环境中，结成一个个社团——音乐的、非音乐的都有，以群体的力量来维持社群的音乐生活，这种努力也得到一些商业机构和个人的赞助。他们坚信音乐的力量能维持自己的信仰，能给予心灵慰藉，帮助人们渡过难关。

资料来源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由美籍犹太学者克兰茨勒 (David Kranzler) 博士提供，包括当时的报刊文章、广告、节目单及文件。其余一小部分资料系笔者留英期间在剑桥大学东方图书馆所得，如克兰茨勒的专著《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后得知此书已由许步曾先生译成中文出版，此书的中、英文版均给笔者不少线索。还有一部分资料来自2000年笔者访美期间的收集。文中上海旧地名翻译参照了汪之成先生的《上海俄侨史》"附录"。背景资料则参考了3种犹太百科全书：《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Judaica*, 1971)、《标准犹太百科全书》(*The Standard Jewish Eucyclopedia*, 1992)，以及《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摘编自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编者对少数有误处作了修改，并加了若干注解。)

上海欧洲犹太难民的音乐生活：虹口"隔都"时期（1943—1945）

汤亚汀

有人在评述大屠杀时期的音乐遗产时说过：这些材料，是在悲惨环境中形成的，不仅提供了无价的记忆，也为史学家形成了描述时代和事件的重要文献例证。尤其是犹太音乐的幸存因素，不应该按其美学价值的常规判断，而是应该在它们创造的起源和表现的环境里加以审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将这些材料看作是一种抗议形式，抵抗精神摧残的雄辩之声。[1]

虹口犹太难民社区的概况

虹口原先属公共租界的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起为日本人独占。当时只有提篮桥地区的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比较热闹。1939年以后，10 000万多名德奥难民先后住进虹口，这里的一些街道上开始出现了欧式商店，并出现了夜总会和酒吧，带来了商业繁荣和夜生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3年2月，日军当局将先前散居在法租界、公共租界的6 000多名中欧和东欧犹太难民悉数强行迁移到当时条件极差的虹口，在提篮桥及其邻近的杨

1_赫斯科斯（Heskes, Irene）：《犹太音乐成功之路：历史、传统和文化》（*Passport to Jewish Music: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Culture*），纽约，1994年版。

浦西部形成了一个犹太难民“隔离区”，加上原住虹口的犹太难民，使区内难民总数达到15 000至18 000名。“隔离区”一直维持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两年半即是所谓的上海犹太难民的“虹口‘隔都’(ghetto)时期”。

1943—1944年是虹口“隔都”最困难的时期，难民们行动受限制，挨饿受冻（经常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尤其是1943年春至1944年夏，美国的救济金被切断的期间，是难民们最艰难的时候。为了生计，人们只能去干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时，精神文化生活便成为他们与生存斗争的支柱。

他们经过白天的劳累后，在晚上希望看到轻松，有精神价值的东西。正如费尔伯所言，音乐尤其能使人们得到安慰，无论你懂不懂音乐，都是如此。音乐说的是一种感情的语言，是国际公认的精神治疗工具，能促进难民营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以及社区的团结。音乐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文化因素。[1]

音乐家同其他难民一样行动无自由，生活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市中心由于日本人的占领，商业大多停顿，音乐家很难去市中心正常定期演出，节目也受审查，使之符合日本人的要求。即使能演出，也常受日本巡逻队、警察干扰。尽管如此，难民社区还是渴望音乐，这样“隔都”的音乐生活才顽强地延续下来。音乐家们不顾贫困，作出无私奉献，小小的犹太社区，晚上经常有演出。难民们白天要干繁重的工作，如送面包、当酒吧招待、开杂货铺子、画卡通片，常常分文不名，饥肠辘辘，但精神生活却很充实，因为人们常去听音乐会，看歌剧与轻歌剧、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即使1945年美军空袭虹口造成难民很大伤亡后，依然无法改变人们对音乐的热爱，如一位难民在当时关于一场婚礼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

1 《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3年8月23日。

婚礼在嘉道理学校一间大房间——“隔离区”界外的临时会堂举行……婚礼很美，领唱瓦绍尔同合唱队颂唱古老的仪式曲和我们挑选的一些特别音乐（如有时也有世俗音乐，甚至《圣母颂》这样的基督教音乐），没人去注意外面尖利的空袭警报声。[1]

这一时期有两个机构在促进音乐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上海无国籍音乐家协会（SMA）和厨房基金会。上海无国籍音乐家协会不仅是难民音乐家的专业团体，经常举办音乐会，也为音乐家的利益而奋斗，如促进音乐家的就业等，为此它曾同旅店业协会签订协议。1943年11月15日，上海无国籍音乐家协会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号召帮助其处于贫困的会员度过1943—1944年严冬，具体行动是，依靠一些救济组织的赞助举行几场音乐会。[2]

“厨房基金会”是难民们1942年自己创立的一个自我救济团体。该机构在这一时期几乎担负起整个难民社区生活的60%的经济来源，并以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救济，维持了社区的文化活动。面对艰难时期对文化生活的极其需要，该组织声称，除了难民们的物质利益外，有必要升华他们的灵魂。因此基金会全力支持难民的文化事业，赞助了许多音乐会。[3]

传统的宗教音乐生活

这一时期难民们仍然保持了犹太教的节日，遵守教规仪式。据说，当时单单在虹口，就有大大小小不下14处祈祷的地方，包括剧场、难民营和犹太学校，为正统派、改革派和自由派的各种教派服务。[4]传统的会堂音乐延续了犹太文

1_哈帕纳（Heppner, Ernest）：《上海避难所，回忆二战时的犹太“隔离区”》（*Shanghai Refuge: 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 II Jewish Ghetto*），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1993年版。

2_《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3年11月19日。

3_克兰茨勒（Kranzler, David）：《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纽约，1976年版。

4_《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3年10月25日。

化，得到了整个难民社会的认同。

如以下节日仪式所表明的：

· 1943年9月的新年仪式，有5个拉比，来自社区5个合唱队的60名歌手（其中约20名领唱）参加。合唱队认真排练了一周。百老汇大戏院（今东山电影院）的仪式由来自俄罗斯会堂的高级领唱安特曼（Antmann）主持，合唱由爱泼斯坦（Epstein）指挥；东海大戏院合唱则由马克特（Markt）指挥，由领唱者协会首席瓦绍尔（Warschauer）担任领唱。两处全部爆满，盛况空前。

· 1943年10月的转经节[1]，分别在摩西会堂、兆丰路（今高阳路）难民所、百老汇大戏院、东海大戏院、上海犹太青年学校等处举行。可口的食物提高了人们的兴致，美妙的歌唱更使人们的情绪达到高潮。如犹太青年学校的庆典仪式，从头至尾都由俄罗斯会堂的安特曼领唱员和犹太难民哈斯米尔（Hasmir）合唱队表演。之后，仪式移至花园，由耶胡达（Raw Jehuda）唱《祝酒颂》（*Kiddush*）。

· 1943年12月的光明节[2]，由以色列联盟（Aagudas Jisroel）上海支社在汇山路（今霍山路）难民所举办，该组织以严守犹太律法和传统而著称。参加仪式演唱的有上海领唱者协会的卢可维茨（Lewkowitz）、沙拉玛赫（Schallamach）、阿中多夫（Aschendorf）等领唱。

· 非节日的宗教仪式演唱，如1943年9月26日的捐献《经卷》（*Sefer Thom*）的仪式，开始由俄罗斯会堂领唱哈特曼（Hatmann）和爱泼斯坦（Markt Epstein）指挥的难民哈斯米尔合唱队演唱（Ma Tauwn）。后来在虔敬的哈西德派的狂热舞蹈中达到高潮。

1_转经节（Simhat Thora），庆祝会堂全年颂读《摩西五经》的完成。

2_光明节（Hanukkah），庆祝公元前164年民族英雄马喀比打败希腊人、收复耶路撒冷。

·1943年11月的某日，庆祝难民自己的麦克利克路（今临潼路）会堂建立两周年，由领唱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及其学生表演。

·1946年8月4日，纪念1945年7月17日美军空袭虹口的遇难者，在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举行哀悼仪式，由领唱们合唱莱万道夫斯基的哀悼曲（Ennausch k'chozir），拉比和圣葬社代表致悼词后，4位领唱分别演唱了《诗篇》（第121首）等4首哀悼曲，最后是诵读《卡迪什》祈祷词。仪式后全体去周家嘴路墓地悼念。

关于犹太教会堂诵唱的渊源，乐评家费尔伯教授认为，犹太音乐历来善于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所以在德国犹太会堂诵唱里，我们看到了基督教路德新教赞美诗和众赞歌与犹太教传统诵唱的混合形式。16世纪以来，吉卜赛式的炫技演唱，尤其是东方犹太吟唱诗人的演唱，把歌曲甚至西方歌剧的因素带入会堂诵唱之中。而同时，要求挖掘、改造会堂诵唱的宝贵遗产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仪式和炫技之间，产生了争论。历代的会堂领唱家，后来又有音乐学家（如伊德尔佐恩 [A. Z. Idelsohn] 等），都作出了努力。如维也纳资深领唱苏尔策（Solomon Sulzer, 1804—1891）改编了古老的犹太旋律，配上欧洲的和声，使犹太教诵唱很像基督教新教的众赞歌。虽然风格尚不完美，但创作得非常自然，有节日庆典的辉煌，而非宗教的纯洁和虔诚。[1]

二元文化的文艺晚会音乐生活

难民的文艺晚会音乐生活——有民间音乐，有西方音

1 《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3年9月29日。

乐，也有二者混合的轻歌剧及卡巴莱式的流行音乐，体现了犹太文化与欧洲文化的二元并存。这类晚会也带有社会功能，而即使娱乐性的亦有强烈的民族性。社会功能性的又可再分为经济与慈善性质的和政治与教育性质的。

经济与慈善事业 面临1943—1944年严冬的艰难困苦，难民社区的艺术家们以“艺术家犹太冬季大救援晚会”的名义，发动了在东海大戏院的周末日场和夜场义演，为处于赤贫的难民募捐衣物和食品。12月25日夜场献演的艺术家很多，包括艺术音乐、民间音乐、流行音乐、歌舞综合艺术表演（Kleinkunst）四方面的人员。如钢琴家马哥林斯基教授和索嫩沙伊恩（Siehfried Somenschein），小提琴家施莱辛格（Josef Schlesinger），领唱者协会的歌唱家弗鲁赫特（Josef Fruchter），女歌唱家拉普（Sabine Rápp），维也纳轻歌剧明星罗丝儿（Rosl Albad-Gerstel），民歌手佐米娜（Raja Zomina），谐星策尔尼克（Herbert Zernik），维也纳电影、轻歌剧明星莉莉·弗罗尔（Lily Flohr），戏剧演员梅尔希奥（Fritz Melchior）等，一些手风琴演员，以及帕斯夸尔（Pasqual）儿童舞蹈团。

总的来看，是高文化水准的晚会，不亚于欧洲任何大都市的同类演出，充分展示了其艺术价值。中场休息时，在大厅里设立了一个临时酒吧，由厨房基金会的女士们义卖咖啡、蛋糕和热狗，所有收益归入冬季救援基金。26日社区委员会、厨房基金会及150名志愿者还上街募捐。

为了筹款供应安息日的伙食，“以色列联盟”（Agudas Jisroel）举办义演。如1944年1月23日晚上在东余杭路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举行的音乐会。参加者有小提琴家卫登堡（Wittenberg）教授，钢琴家贝尔（Hans Baer）教授、马库斯

(Erich Marcuse) 博士，俄罗斯会堂高级领唱波德拉比瑞克 (Podrabirek)，领唱者协会的男高音贝格曼 (Hans Bergmann) 和男中音弗里德曼 (Hersch Friedmann)。曲目包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亨德尔、海顿、威尔第等的艺术歌曲与咏叹调，以及犹太民歌。

政治与传统教育　政治性质的演出反映在上海犹太复国运动组织 (ZOS) 举办的演出里。如1943年11月14日在百老汇大戏院日场演出的“歌曲与绘画”，打出了鲜明的口号“现在就谈以色列国” (Erez Israel in Wort) 和“如果你想要，那就不是童话”（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赫兹尔 [Theodor Herzl] 的名言）。节目包括爱泼斯坦指挥的难民哈斯米尔合唱队的合唱，佐米娜的犹太民歌，俄罗斯会堂高级领唱安特曼的《永远的徘徊者》，领唱者协会首席瓦绍尔的巴勒斯坦歌曲，佐默尔 (Lotte Sommer) 欢呼以色列国新生的舞蹈，音乐改编及钢琴伴奏是瑞茨勒 (Max Rezler) 乐长，手风琴是杜伯 (Oscar Dub)。此外，还有巴勒斯坦绘画即兴表演。

另一个例子是该犹太复国组织在光明节（1943年12月23日）假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举行的纪念民族英雄马喀比的三次晚会之一。观众坐满了整个礼堂。点燃象征光明的九枝灯台的仪式后，由节目主持人温策 (Alfred Winzer) 配乐朗诵表演自己创作的《光明节歌谣》，赞美马喀比英雄气概对人们灵魂的熏陶，号召人们完成复国大业，点灯仪式和诗歌朗诵均由领唱阿龙佐恩 (Aronsohn) 用簧风琴伴奏。接着马克特 (Heinrich Markt) 指挥的会堂合唱队演唱莱万道夫斯基的《赞美诗第150首》（哈利路亚）和门德尔松为拉辛悲剧《阿达莉》配乐的终场合唱。然后是施莱辛格 (Josef Schlesinger) 技

术辉煌的小提琴独奏，艾德施泰因儿童芭蕾舞团的表演（儿童歌舞也是这个节日的民族特色），犹太滑稽双簧，手风琴四重奏。最后是温策的终场配乐朗诵，号召建立以色列国。全场担任钢琴伴奏的是领唱考夫曼（Kaufmann）。

犹太复国组织1944年4月2日在百老汇大戏院的逾越节作日场演出，大部分节目也带民族与政治色彩，缅怀历史与传统，宣扬复国思想。开场是爱泼斯坦指挥的难民哈斯米尔合唱队的无伴奏合唱，接着是温策自己创作的配乐朗诵《逾越节幻想》，俄罗斯会堂领唱安特曼的希伯来、意第绪民歌，拉普的《复国之歌》，佐米娜的犹太民歌，弗里德伯格（Kurti Friedberg）的独舞及与佐米娜的双人舞，策尔尼克的独角戏及与佐米娜的二重唱，艾德施泰因儿童芭蕾舞表演，约阿希姆（Walter Joachim）教授的大提琴独奏，最后是温策的终场朗诵。钢琴伴奏是瑞莰勒（Max Rezler）和索嫩沙伊恩。

还有一类表演是鼓舞精神、促进教育的。如1943年11月8日在罗伊（Roy）咖啡馆屋顶花园的慈善演出，其目的是“帮助精神创造”，由EJAS和《上海犹太早报》负责人莱文（Ossi Lewin）主办。节目主要是佐米娜的民歌，其他还有罗伯特森（Robertson）和佐米娜的双人舞，弗里德曼夫妇（Hilde和Walter Friedmann）的轻歌剧二重唱，伴奏是瑞莰勒（Maz Rezler），最后的舞会伴奏是奥施莰基（Oschitzki）乐队。

犹太民族很重视教育下一代，以延续其传统。乐评家费尔伯教授也指出，文化发展中的第一步是教育年轻人。此类性质的表演，如1943年9月12日在百老汇大戏院，会堂合唱队专为14～20岁的难民青少年的日场演出。指挥是马克特（Heinrich Markt），独唱者有男中音瓦绍尔和女中音拉普。

娱乐性表演　此种表演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可分为两大类：犹太民歌晚会和犹太-欧洲风格混合的表演。

如1944年3月12目的普珥节（亦称犹太狂欢节，也是儿童表演歌舞的节日），在犹太青年学校举行，节日非常世俗化。由芭蕾大师艾德施泰因（Erdstein）帮助排练，学生表演唱歌、朗诵和舞蹈。学校合唱队演唱了犹太歌曲、英文和德文民歌。孩子们还穿着漂亮的衣服表演了犹太教狂热的哈西德派舞蹈，12人分成6对的小步舞，浓郁俄罗斯风味的集体舞、摇摆舞，以及轻歌剧《玛丽扎伯爵夫人》中的舞蹈选段。

立陶宛犹太艺术家佐米娜能歌善舞，善于演唱希伯来、意第绪、波兰、俄罗斯民歌，是虹口“隔都”时期最受欢迎的民歌女明星，举行过多场演出，尤其是同著名节目主持人、喜剧演员、能歌善演的德国犹太人策尔尼克（Herbert Zernik）的联合演出，被观众称为Z-Z（Zomina-Zernik）晚会。佐米娜富有魅力的优雅表现在她那柔和迷人的音色中，她在意第绪歌曲中表现了真正的犹太艺术和犹太灵魂。如那首著名的摇篮曲《葡萄干和杏仁》，出自“意第绪戏剧之父”戈尔德发登（Avrom Goldfadn）1880年的轻歌剧《牧羊女舒拉米斯》，其伤感的旋律已传遍全世界，成为一首真正的意第绪民歌。歌词如下：

圣殿内一角，坐着寡居的锡安女。
看着摇篮里的儿子，摇啊摇，
唱着摇篮曲。
哎噜噜噜……
“宝宝的摇篮下，

有一只雪白的小山羊。
小山羊注定要去流浪，
你的命运也一样。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我的小犹太人……”

这首歌从女性的角度，描述孩子的人生，折射出整个犹太民族的坎坷命运。歌词表现了犹太民族历来没有祖国、四处流浪、寄人篱下的伤感和迷惘情绪，尤其是被希特勒赶出欧洲，流亡遥远的上海的经历更使这首歌曲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百听不厌。

佐米娜的曲目除了意第绪民歌外，还包括哈西德派的歌曲，东方巴勒斯坦犹太歌曲，甚至吉卜赛歌曲。此外还有她与多才多艺、幽默机智的策尔尼克的意第绪歌曲二重唱。策尔尼克的演唱曲目除意第绪歌曲外，还有轻歌剧选曲和维也纳歌曲。他们表演的地点多在爱而考克路（今安国路）难民所、罗伊咖啡厅的屋顶花园、华德路（今长阳路）公园等地。

虹口“隔都”时期另一个流行的意第绪歌星是克莱娜(Grete Kleiner)，她是著名的意第绪民歌手，也是颇有成就的维也纳艺术歌曲的歌手。她的艺术趣味很高，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是《我不会成为拉比》。她也唱会堂领唱所唱的宗教歌曲，虽然当时还没有女性领唱。她常同会堂领唱弗鲁赫特 (Josef Fruchter) 在虹口外面的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联合举行晚会。弗鲁赫特的曲目则包括意第绪歌曲、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并由其夫人伴奏。

如1943年5月16日的犹太歌曲音乐会，由克莱娜独

唱，合作者是艾尔鲍姆（M. Elbaum），钢琴伴奏瑞茨勒（Max Rezler）。赞助者是一些个人及一家酒吧。

犹太-欧洲混合风格的表演见之于轻歌剧和流行音乐这两种形式。前者包括称之为歌唱剧（Singspiel，德国和奥地利轻松喜剧式的歌谣歌剧）的剧种，如1943年12月26日为庆祝光明节而上演的《人人都带着自己的包袱》（*Jede traegt seine Pinkerl*），由犹太难民作家恩格尔（Engel）和格律恩（Gruen）（话剧和卡巴莱演员）自作脚本，采用犹太题材和主题。参加演出者中有观众喜爱的犹太民歌手弗里德曼（Hersch Friedmann），以及克拉索（Ernst Krasso）等人。此外，领唱者协会首席瓦绍尔也来客串，在第三幕中演唱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中的咏叹调，比才《卡门》的“斗牛士之歌”。钢琴伴奏是瑞茨勒，手风琴是沃尔费斯（A. Wolffers），还有童声合唱。演出地点是爱而考克路（即安国路）难民营演剧厅。

流行音乐形式见之于意第绪卡巴莱晚会，即意第绪音乐、戏剧、语言和欧洲卡巴莱歌舞表演形式的结合。如1943年9月中旬在华德路（今长阳路）难民营花园举行的那次，由意第绪民歌手弗里德曼（Herseh Friedmann）演唱了3首民歌，他又协同波兰难民女演员肖沙诺及男演员瓦尔登（H. Walden），表演了两出幽默机智的意第绪小品。肖沙诺还朗诵了意第绪诗歌。钢琴伴奏瑞茨勒，他还以独奏表演了《犹太集成曲》。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犹太集成曲钢琴独奏很受欢迎，也出现在佐米娜和克莱娜的晚会上，钢琴家索嫩沙伊恩就表演过。

此前，即9月7、9、10日3天，在华德路（今长阳路）178号白马咖啡馆举行了无名者卡巴莱晚会，海报上称为“三个

笑之夜”，由岗特 (Heinz Ganther) 主持，并鼓励观众创作诗歌，奖励最佳诗作。

维也纳风格的轻歌剧演出

虹口“隔都”时期，难民建立了自己的轻歌剧团，演出了许多维也纳风格的轻歌剧，这一体裁以圆舞曲为其重要特征 (如《蝙蝠》第二幕著名的圆舞曲尾声)，混合了奥芬巴赫轻歌剧、流行的维也纳歌唱剧 (Singspiel)、音乐滑稽剧等体裁，作曲多为前奥匈帝国作曲家。这方面最耀眼的是维也纳轻歌剧明星罗丝儿 (Rosl Albach-Gerstel)，被观众爱称为“我们的罗丝儿”，曾唱红德国科隆、汉堡和波兰布雷斯劳[1]等地。剧团另外两位台柱是弗里泽 (Fritz Frieser) 和布罗伊厄 (Karla Breuer)。剧目多出自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维也纳轻歌剧黄金时代的作品。维也纳音乐在难民中的久演不衰表明了他们对所定居的故国及其文化的认同，尽管他们此时已被剥夺国籍。

轻歌剧团建团后接二连三演出了匈牙利作曲家卡尔曼 (Emmerich Kalman, 1882—1953) 的剧作，因为他的轻歌剧源于幽默的卡巴莱表演形式，非常适合犹太人的性格。而且，罗丝儿的表演才华和个人魅力也非常符合这些作品。在东海大戏院首场演出的《恰尔达什女王》(*Csardasfuerstin*)，即令人刮目相看。此剧1915年在维也纳首演，到30年代末已演出300场以上，在柏林则演出了1 200场，在苏联更名为《西尔薇亚》(*Silvia*)，也演了上千场，1917年在纽约以《里维埃拉女郎》(*Riviera Girl*) 上演，1921年演出于伦敦，又改名《吉卜赛女王》(*Gypsy Princess*)。上海首演的导演布罗伊厄 (Adolf Breuer) 是来自维也纳的著名戏剧导演。全剧持续两

1_此处有误，布雷斯劳当时属于德国，居住着许多犹太人，其中不少人来到上海避难。该市二战后被划归波兰，改名弗罗茨瓦夫。

个半小时，观众热情不减，不少唱段被要求再来一遍。舞台布景很真实，花了不少工夫。为这一两场演出，他们竟然花那么大力量作准备。由小乐队和沙因巴赫 (Leo Schoenbach) 作钢琴伴奏，剧中还有克劳斯 (Johan Kraus) 的一段大提琴独奏。罗丝儿的歌舞及表演主宰了整个舞台，布罗伊厄 (Karla Breuer) 太太的演唱常常显得随意，颇具个性，其他人的表演也较真实。演出音响效果不错。

1943年12月由布罗伊厄导演在东海大戏院又首演了卡尔曼的《玛丽扎女伯爵》(*Graefin Mariza*, 1924)，也是两个半小时，观众掌声如潮，成为虹口当时一出艺术价值极高的轻歌剧。由沙因巴赫 (Leo Schoebach) 创立的小乐队伴奏，演出服装非同凡响，合唱与童声引人入胜。罗丝儿演玛丽扎女伯爵，亦舞亦唱亦演。布罗伊厄有很大进步，展示出他的舞台才能和个性魅力。弗里泽 (Fritz Frieser) 既当编舞，又是主角之一，表现出非凡的舞台才能和永不枯竭的幽默。

1944年2月，由于几个艺术之友的赞助，人们又在虹口百老汇大戏院听到了轻歌剧迷喜爱的匈牙利作曲家莱哈尔的经典之作《风流寡妇》(1905)。这次演出的音乐指挥戈尔德曼 (Walther Goldmann) 系前德国德累斯登国家歌剧院乐长，导演弗里德曼 (Walther Friedmann)，舞台布景包里克 (Paulik)，主演还是罗丝儿，男高音弗里泽 (Erwin Frieser)、费尔莱森 (Adolf Feuereisen) 等参加演出，大乐队伴奏，还有大型合唱队伴唱。

同年3月底又在百老汇大戏院上演施特劳斯 (Oscar Straus) 的《华尔兹之梦》(*Ein Waltzertraum*, 1907)，仍是罗丝儿主演，基本上以上述原班人员上场，只是增加了爵士乐歌星克罗托勋斯基 (Heinz Krotoschinski) 等。4月底还邀请EJAS

的声乐家去东海大戏院演出《蝙蝠》，导演是弗里泽 (Fritz Frieser)。1945年4月15、22日在东海大戏院首演维也纳轻歌剧后期作曲家格莱尼希施泰腾 (Bruno Granichstaedten) 的三幕爵士轻歌剧 (Der Orlow, 1925)，导演兼编舞也是弗里泽，参加演出者有弗里德曼 (Hilde Friedmann) 夫人、劳斯尼茨 (Jennv Rausnitz)、布罗德曼 (Leopold Brodmann)、弗里泽 (Erwin Frieser)、戈恰克等，伴以人数增加的合唱队，以及由柯林斯 (Hans Collins) 指挥的15人的爵士乐队。

其他如1943年11月28日在爱而考克路收容所上演的三幕喜剧轻歌剧——艾斯勒 (Edmund Eysler) 编剧的《汉尼去跳舞》(*Hanigeht tanzen*)，指挥瑞茨勒 (Max Rezler)，导演弗里德曼。1944年2月5日在东海大戏院上演的最新四幕爵士流行轻歌剧——捷克作曲家贝纳茨基 (Ralph Benatzky) 的《着魔的小姐》(*Bezaubendes Fraeunlein*, 1933)，导演布罗依尔，主演是莉莉·弗罗尔，参加演出的有：布罗依尔太太、弗里泽 (Fritz Frieser)、策尔尼克等。1945年6月3日在百老汇路1110号汇山剧院演出米勒克尔 (Karl Milloeker) 的维也纳早期四幕经典《乞丐学生》(*Der Bettlstudent*, 1882)，由俄罗斯歌剧团女主角佐里希 (Sophia Zorich) 客席主演，导演弗里德曼，指挥魏斯 (Paul Weiss)；参加演出者：弗里德曼夫人、劳斯尼茨、策尔尼克、克罗托勋斯基和戈恰克等。

这些轻歌剧的主角多为女性，说明男性主宰的社会多要求年轻女性作为表演者，尤其在艰难时代如此。也许，对艰难时世的观众来说，通过这些生动活泼的通俗体裁，女性性别特征（即所谓的性征，sexuality）较之男性性征更能抚慰、温暖他们的灵魂。

1943年10月，罗丝儿还同男歌星布罗德曼 (Leopold

Brodmann）联合举行了一次维也纳轻歌剧选曲和艺术歌曲晚会。金发、面带微笑的罗丝儿为艰难时世中的难民带来了昔日维也纳的温馨和欢快，演唱了一系列维也纳轻歌剧选段；她还穿着19世纪20—40年代维也纳比德迈式的服装，演绎舒伯特的旋律，唱得很有那个时代的风格。她演唱的《葡萄花开时节的多瑙河畔》等维也纳歌曲令难民们想起了故国奥地利。布罗德曼以其丰富的舞台经验很好地衬托了罗丝儿，他们最后和谐的两首二重唱选自阿舍尔（Leo Ascher）的轻歌剧《殿下跳华尔兹》（*Hoheit tanzt Walzer*）。钢琴伴奏利伯曼（Felix Liebmann）的技术娴熟，又不喧宾夺主，华尔兹伴奏活跃有力，舒伯特旋律伴奏诠释了贯穿的主导动机。

女性性征，加上维也纳-舒伯特旋律及家乡的历史服饰所带来的怀旧、伤感的中产阶级家庭温情，激起了观众的想象，使他们暂时脱离了严酷的现实，回到了昔日的美好时光。可见性征在维持一种文化中能够起到不小的作用。

1945年6月10日在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举行歌剧和轻歌剧选曲音乐会，由作曲家索嫩沙伊恩组织，曲目选自玛斯卡尼、普契尼、蓬基耶里、罗西尼、斯美塔那、威尔第等的歌剧和格兰尼希施泰腾、卡尔曼、莱哈尔、施特劳斯、策勒等的轻歌剧。演唱者为女高音罗比切克，男高音洪格莱德（Fritz Hungerleider），钢琴伴奏索嫩沙伊恩。

欧洲音乐会生活

难民的欧洲艺术音乐的音乐会也异常丰富，声乐和各种器乐方面都是人才济济。既有独唱独奏音乐会和室内音乐会，也有交响乐音乐会。后者主要由上海无国籍音乐家协会和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举办，也包括有10多名难民

音乐家加盟的“上海爱乐乐团”(即前工部局乐队)的演出。这类音乐会中有些也还有其社会功能。

“隔离区”内，炎热的夏季，晚上人们没处娱乐，因此上海无国籍难民音乐家协会便在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今东余杭路627号)草坪上举办了几场夏季音乐会，受到难民的欢迎。因该校已在“隔离区”外，因此要得到日本占领军当局批准，持有上海无国籍难民事务所盖印的证明，人们才可自由进出，这样这些夏季音乐会名义上的主办者便是该事务所了。

第一次演出是在1944年7月15日，称为“舒伯特之夜”，指挥是曾活跃在流行音乐界的小提琴家约阿希姆(Otto Joachim)。因为要得到日本人的批准，故前两曲演奏《日本陆军进行曲》和《海军军舰进行曲》，后面才是舒伯特的作品：《罗莎蒙德》序曲、《“未完成”交响曲》《军队进行曲》《音乐瞬间》，以及一些声乐小曲如《在海上》和《我的歌，轻轻地祈求》，由虹口当时的犹太歌唱家，从前的酒吧爵士歌星克罗托勋斯基独唱。

第二次是1944年8月2日，称为“施特劳斯和莱哈尔之夜”，指挥温特尼茨(C. M. Winternitz)，音乐会由汇山路(今霍山路)糖果店、咖啡馆及欧洲面包房赞助。开头两曲也是日本陆、海军进行曲，接着上半场都是施特劳斯作品：《蝙蝠》序曲、《皇帝圆舞曲》、施特劳斯轻歌剧音乐连奏、《无穷动》《吉卜赛男爵》序歌及选段，由布罗伊尔(K. Breuer)太太演唱。下半场都是莱哈尔作品：《笑乡》序曲、《金银圆舞曲》，《笑乡》和《帕格尼尼》中的二重唱，还有莱哈尔作品集锦曲。

第三次音乐会由于日本占领军发放通行证的官员合屋的拒绝而无法举行。自称虹口“犹太之王”的日本人合屋，是个音乐和戏剧爱好者，尤其爱好小提琴，他还让一个难民

音乐家定期为他授课，然后用茶点款待这位难民。虹口“隔都”里的音乐会和演剧，他都要去观看。但他非常霸道，他不到演出便不能开始，他一到观众必须全体起立，他点头后，演出才能开始。他说：“在虹口，由我说了算！”

还有一场音乐会不能不提，即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1943年11月27日以所谓“欢迎外国保甲”[1]的名义在东海大戏院举行的联欢音乐会，均由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名家演出。1943年11月27日，在东海大戏院举行的这场带有政治性质的特殊音乐会，表明了难民为生存而对日军当局做出的一种微妙姿态。演出轰动了虹口，乃至整个上海。这是一场为虹口外国保甲筹款的义演。保甲精于组织，这次音乐会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它几乎召集了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难民音乐家中的所有精英。观众不仅有官方要员，也有“隔离区”外的音乐爱好者。音乐会发起人是犹太保甲负责人卡代格(Felix Kardegg) 博士。艺术指导是马哥林斯基教授，他负责协调所有节目，花了较长时间准备，同演员们商量安排节目，而且演出中在台上连续4小时也不觉疲劳。共有10位音乐家出场15次，演出20位作曲家的30首曲子。演出4小时，观众仍无倦意，因为他们太需要音乐营养了。这场音乐会也是虹口“隔都”欧洲艺术音乐演出季的开端。

节目中有小提琴大师阿德勒 (F. Adler) 教授表演其拿手的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春天》和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由马哥林斯基教授伴奏)；克劳斯 (J. Krauss) 教授的大提琴独奏，节目有格拉祖诺夫、波佩尔、斯甘巴蒂、戈恩斯等人的作品。独唱节目更多，如马哥林斯基太太爱琳的莫扎特、布拉姆斯、理夏德·施特劳斯的歌曲；弗鲁赫特(J. Fmehter) 演唱的威尔第《茶花女》及普契尼《图兰多特》

1_外国保甲：其中包括几百名犹太人，是当时日军设立的辅助警卫队，协助日军维持治安。

中的咏叹调；罗比切克 (L. Robitchek) 演唱的普契尼《贾尼·斯基基》、瓦格纳《汤豪舍》中的咏叹调；拉普 (S. Rapp) 演唱的沃尔夫的艺术歌曲；瓦绍尔 (M. Warschauer) 演唱的科恩戈尔德《死城》、古诺《浮士德》中的咏叹调；马库斯 (I. Marcuse) 夫人演唱的乔尔达诺的独唱作品、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普契尼《托斯卡》中的咏叹调；维也纳轻歌剧女星罗丝儿演唱的莱哈尔《艾娃》中的选曲、施特劳斯的《伟大圆舞曲》。此外还有两首二重唱，马哥林斯基夫人与弗鲁赫特演唱的普契尼《蝴蝶夫人》第一幕中的二重唱；罗比切克和拉普演唱的威尔第《阿依达》第二幕中的女声二重唱；舞蹈家佐默尔 (L. Sommer) 表演鲁宾斯坦作曲的舞蹈《皮埃罗》以及一支印度舞。

纯娱乐性的音乐会如1944年1月下旬，犹太难民社区文化委员会和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联合在东余杭路的上海犹太青年学校恢复了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乐队每月一次的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音乐会。其详情见之于费尔伯教授如下的乐评：

这是艺术指导马哥林斯基教授克服重重困难的结果。音乐会上新的钢琴弦乐三重奏组首次亮相。约阿希姆(Walther Joachim)的大提琴声发自内心，很有温情，合奏中显出低音坚实的力量。虽然他在艰难的生存斗争中每夜都要为轻音乐服务，但他的技术没受到损害，仍可在琴上狂想、即兴，如在德沃夏克的《杜姆卡三重奏》中。小提琴家施莱辛格(Josef Schlesinger)开始有点怯场，进入合奏后更是如此，直到舒伯特小奏鸣曲时才有点自然，最后在德氏三重奏中才感到得心应手。因有马哥林斯基的钢琴引导，演出精确

和谐。贝多芬C小调三重奏表现得非常贝多芬化。在马氏的魔指下，钢琴音色丰富，断奏、琶音、炫技、经过句都演奏得非常浪漫。他的《坎蒂莱那》也很吸引人。舒伯特的小提琴钢琴小奏鸣曲(Op.137)特别美。后面是首无词歌。第一乐章，可以听到水中精灵的歌唱，出现异常美的大小调对比、混合；末乐章是热情的进行曲，演奏得很自然。最美的是最后德沃夏克的《杜姆卡三重奏》，一种节奏自由，狂想式的波兰-俄罗斯民间叙事曲，较难演奏。但马氏是天生的乐长，领导了这个重奏，精细地引出各种音响。他还为瓦绍尔(Max Warschauer)演唱做伴奏，先是意大利作曲家斯特拉德拉的一首咏叹调，再是亨德尔清唱剧《弥赛亚》中的咏叹调及威尔第《安魂曲》片段。总之，这是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1]。

就在这次室内音乐会后，

2月19日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又在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举行了一次艺术歌曲晚会，演唱了从舒伯特到穆索尔斯基的艺术歌曲。拉普太太开场第一个节目朴实无华、一如既往，用内心的情感演唱瓦格纳的“韦森当克歌曲”、舒伯特的歌德诗谱曲《伽尼墨德》、门德尔松的《威尼斯船歌》，以她天鹅绒般柔和、均衡的声音打动听众；伯格曼(Hans Bergmann)也唱得朴实、热情，以他那金属般的嗓音演唱了舒曼的《莲花》、沃尔夫的《隐居》和《思乡》；罗比切克(Lisa Robitschek)太太的节目特别有趣，如她演唱的布拉姆斯《茨岗人之歌》，以及舒曼《少年魔角》中的《小螵虫》(*Marienwuermchen*)，唱得纯朴，然后在德国诗人艾兴多夫的诗歌谱曲《林中谈话》中用优雅的头部发声传达温情；最

1_《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4年1月28日。

后是穆索尔斯基的白俄罗斯-乌克兰风格的《戈帕克舞曲》（未完成的歌剧《索罗钦集市》选曲），唱得也很果断。马哥林斯基的伴奏决定了这一“艺术歌曲之夜”的成功。[1]

3月19日，犹太社区文化委员会在犹太青年学校举行了拉普(Sabine Rapp)独唱音乐会。乐评家费尔伯教授作了如下描述：

她是虹口严肃音乐之友喜爱的女歌唱家……以高难度的花腔演唱亨德尔的咏叹调，以意大利的古老情调演唱戈尔迪加尼的咏叹调，极其戏剧化地演绎古诺，以充满痛苦的表情表演多尼采蒂《宠姬》中的咏叹调“哦，我的费尔南多，人间的至宝”，之后是两首很少听到的布拉姆斯的中提琴助奏的歌曲（Op.91）。施泰讷尔（Adolf Steiner）以温暖、忧郁的音乐在中提琴上歌唱第一声部，有时乐器声部主宰歌唱声部。第一首描写甜甜的忧郁、沉思、金色的夜；第二首是一首摇篮曲的传奇音调，混合了15世纪一首古老的圣诞歌曲。接着演绎舒伯特歌曲简单自然的感觉，出自内心深处。最后是法国牧人歌曲，一首轻松迷人的闲聊式的尚松。她用3种语言向观众展示了各种音乐风格。小小的不足之处是：处理舒伯特歌词有时有点随意，演绎法国尚松的Parlando（说话似的）不够流畅。全场由马库斯（Erwin Marcus）钢琴伴奏。[2]

在艺术歌曲里，我们再次看到女性及其性征主宰的景象，不仅在表演中，也在媒介充满浪漫褒扬的评论中。可以说，媒介的话语强化了这一主宰。毕竟，在艰难时世，人们

1_《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4年2月22日。

2_《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1944年3月21日。

更加需要浪漫与情爱。

还有其他一些独唱音乐会，如：

·1943年2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的男低音莱文（Louis Levine）音乐会，钢琴伴奏富克斯（Leo Fuchs），节目包括乔尔达尼、阿莱维、布律尔、弗洛托、尼古拉、柴可夫斯基、舒曼、舒伯特、威尔第等的歌剧咏叹调与艺术歌曲。

·1943年3月20日，在爱而考克路（今安国路）举行的室内乐男高音库特讷（Max Kuttner）音乐会。

·1944年3月11日，在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今东余杭路）举行的拉普女士的艺术歌曲与歌剧咏叹调音乐会。

1945年美机的空袭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据德雷夫斯 (Alfred Dreyvfuss) 博士后来的回忆，那天他们正在虹口家中演奏布拉姆斯C大调弦乐四重奏 (No.51)，恰逢空袭，但他们继续演奏，结果一颗炸弹击中他住的房屋，炸断了一个小孩的大腿。德雷夫斯博士是德共党员，当时曾在上海任塔斯社上海播音员，曾为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举办过几次顶尖艺术家的音乐会，并兼任沪江大学的音乐讲师，为学生开音乐讲座，并让难民音乐家在其讲座上奏乐作为实例。社区内有很多这样的音乐讲座，很多是以西方犹太音乐家为主题的，如在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举办的“门德尔松生平与创作，作曲家逝世100周年纪念讲座”，由乐评家费尔伯教授主讲，还放了作曲家作品的唱片《小提琴协奏曲》(克莱斯勒演奏) 和《仲夏夜之梦》中的谐谑曲 (托斯卡尼尼指挥)。还有社区文化委员会在安国路难民营举办的犹太音乐及音乐家系列讲座，第一讲由作曲家、评论家豪斯多尔夫 (Martin Hausdorff)

主讲，难民音乐家现场表演相关曲目。从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代犹太人的音乐意识开始，讲到17世纪意大利宫廷犹太音乐家罗西；然后讲到作曲家门德尔松，由汉斯·贝尔弹奏其《无词歌》和《织工之歌》；再论及科隆领唱员之子、轻歌剧作曲家奥芬巴赫，由拉普夫人演唱其歌曲；接着谈到当代犹太作曲家马勒和勋伯格，分别由约阿希姆 (Josef Joachim) 及其学生和贝尔演奏；最后介绍魏尔等其他当代犹太作曲家。

俄罗斯犹太人的作用

最后必须提及没有进入“隔离区”的俄罗斯犹太人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1943年12月12日，上海阿什肯纳兹 (俄罗斯) 犹太人合作救济会 (SACRA)[1] 赞助在东海大戏院举行了另一次义演，收入捐给厨房基金会和上海无国籍音乐协会。俄罗斯犹太人没有被迫迁进“隔离区”，故他们以这种方式支援德奥和波兰犹太人。演出由36人的上海无国籍音乐协会乐队担任。两位独奏家——大提琴家约阿希姆 (Walther Joachim) 和钢琴家辛格 (Gregor Singer) 参加演出，在冰冷的戏院里给观众带来了温暖。约阿希姆演奏的布鲁赫大提琴协奏曲《众誓》(*Kol Nidre*)，音色好，高潮处很有力，像是与上帝的虔诚对话和欢乐的节庆。而辛格则既要对付钢琴音色不好，又要克服滴水成冰的温度，但这些都阻碍不了他成熟的演技。他热情洋溢地弹奏了肖邦的波兰舞曲，多赫南伊和约翰·施特劳斯的小曲，如《春之声圆舞曲—随想曲》(陶西格改编)。由于特邀了上海爱乐乐团的成员，上海无国籍音乐家协会乐队面貌焕然一新，弦乐辉煌，管乐也不错。指挥约阿希姆 (Otto Joachim) 仅为这支年轻的乐队安排几次排练。曲目主要由浪漫主义作品组成，

1_该委员会于1943年2月28日建立，以协助处理“无国籍难民”进入虹口“隔离区”的问题，成员主要是不必进入“隔离区”的俄国犹太人。

除上述外，还有《赫布里底序曲》《阿莱城姑娘组曲之二》、伊万诺夫的《高加索素描》。在乐队丰富的音色中，描绘出南欧的阳光。

在整个“隔都”时期，俄罗斯犹太人的文艺活动也非常活跃，除了上述“救济会”外，俄犹的上海犹太俱乐部也举行了许多音乐演出，将演出赢利中的一部分来帮助虹口的兄弟姐妹，另外一些则维持俱乐部日常活动。如1945年三四月的俱乐部活动报告所示，就有如下音乐演出：

·3月4日传统晚会，为上海希伯来救济会（Shanghai Hebrew Relief Society and Shelter House）募捐活动经费；

·3月7日俱乐部成员轻歌剧晚会，演出卡尔曼的《玛丽扎女伯爵》；

·3月11日音乐会，俄罗斯歌剧团女歌唱家奥罗夫斯卡雅（E. A. Orlovskaya）太太的演出；

·3月23日俱乐部成员轻歌剧晚会，演出《玫瑰香》（*Spice Rose*）；

·4月10日轻歌剧《哥伦比亚》，上海犹太教育援助协会，为救济上海犹太学校贫困学生而演出；

·4月19日音乐会，俄罗斯歌剧团男歌唱家斯罗伯德斯可伊（A. Slobodskoy）演出；

·4月26日俱乐部成员轻歌剧晚会，演出《印度舞女》（*Boyaderka*）。

结　语

在日本占领下的“隔都”时期，许多独立的业余音乐家沦为街头音乐家，但职业音乐家出于职业荣誉感，生计

再贫乏，也很少去街头卖艺。正如当时上海犹太人所编的《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 1946—1947) 所言：

上海的犹太理想主义并没有被任何艰难险阻所压倒，热爱艺术的大旗仍然高高地、荣耀地飘扬着。[1]

如同上海“隔都”的状况，有人在描述捷克泰雷津集中营的音乐生活时说过：

随着1942年末泰雷津集中营状况的恶化，[生活似乎]无法维系，但合奏、独奏音乐会，歌剧、清唱剧表演仍在继系。音乐家的排练和表演，作曲家的写作和指挥，音乐教师的教学和讲课，也都在继续。那个特别的集中营成为从前繁荣的欧洲音乐社会的一个怪异的缩影。音乐维持精神，麻木焦虑，短暂的娱乐，能够加强个人的生存决心。甚至，音乐表达成为一种坚定的藐视[暴力的]行为。[2]

在虹口“隔离区”日军当局的高压下，面对日本人对文化的审查制度，他们采取一些灵活的策略来坚持演出。在恶劣的生活状况中，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发挥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既成为难民生存斗争的手段、救济的来源，也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和支柱，乃至维系着他们复国主义的理想，延续着他们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并在上海虹口凝聚起一个实实在在的犹太社区。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本文材料大多取自1943年7月至1944年3月的《上海

1_费尔伯 (Felber, Erwin)：“文化生活与移民” (Cultural Life and Emigration)，载《上海年鉴1946—1947》(*Shanghai Almanac* 1946—1947)。

2_赫斯科斯 (Heskes, Irene)：《犹太音乐成功之路：历史、传统和文化》(*Passport to Jewish Music: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Culture*)，纽约，1994年版。

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这是德奥犹太难民在20世纪30年代末办的一份德文报纸，是虹口“隔都”时期唯一为日本占领军当局准许发行的难民报纸，恐怕也是今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唯一犹太报纸。该报全面反映了当时犹太难民的生活，也大量记载了他们的音乐生活，甚至反映了当时日军占领下上海音乐生活的某些方面，颇具史料价值。

《上海犹太早报》的主要音乐撰稿人是犹太音乐家费尔伯(Ewin Felber)，他是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的艺术指导，上海沪江大学的音乐教授(开设音乐史、和声、曲式、音乐美学等课程)，上海音乐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和评论者。他的乐评主要涉及犹太难民社区的欧洲艺术音乐生活(评述交响音乐会、独唱独奏音乐会、轻歌剧演出)，也评述“上海爱乐乐团”(即公共租界工部局交响乐团在“孤岛”时期的称谓)几乎所有的音乐会，介绍大作曲家和演奏家(柴可夫斯基、格里格、维也纳钢琴大师格律恩费尔德)。此外他还介绍犹太教会堂咏唱的风格渊源。他的不少文章更是跨越到音乐以外的文化艺术领域，论述戏剧、造型艺术、文学，甚至社区的文化建设。因此，本章欧洲音乐会生活的部分，可以说是从费尔伯乐评的视角来反映的。

(摘编自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编者对少数有误处作了修改，并加了若干注解。)

战后初期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

N.A. 帕尔阔维茨[1]

战争结束后不久，大批中国人回到了虹口区为欧洲犹太难民设立的若干避难区域，这反映出近两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所面临的新压力。

这些中国人并未试图闯入避难营区的房屋，而是在路边搭起了帐篷，开始了简易的家庭生活。他们的代表声明，他们是来要回他们自己的财产的。实际上，他们是战争爆发时逃离虹口，或被日本人赶出去的原虹口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回来了，却无法在住房短缺的上海找到安身之地，于是只能回到虹口原居住地寻求解决办法。

中国人帐篷旁的这片避难营是由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为欧洲犹太难民设立的，收容了几千名最贫穷的欧洲犹太人，他们的境遇比那些中国人更糟。显然，两个不幸的群体在为同一块地盘而争吵。政府官员和警察则都不想去干涉，因为看起来与外国人站在同一战线可能激起民愤，这是很危险的。他们花了两个星期制定了一个方案：在市长房屋分配委员会官员能取得土地所有者同意的前提下，中国人可以在难民区的空地上搭建棚舍暂时居住。这种折中方案是战后初期上海不得不采取的一系列临时措施之一。

1_N.A. 帕尔阔维茨 (N. A. Pelcovits) 参加了战后初期解决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上海外国居民安置、去留等许多方面的具体工作，此文综述了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底这方面的情况，具有史料价值。

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的遭遇是中欧近85万难民问题的一个缩影。1946年的问题不再是救援和修复，而是要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并为他们安排永久的居所。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摩擦使得他们的尽快离开变得更加迫切。起初，并没有任何政府或政府间机构愿意承担界定他们的身份或对他们目前的状况进行再安排的责任。而且，战争刚结束时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打算接收他们，这是国际难民组织那时在世界各地都面临的严峻问题。[1]

当时，在上海的15 511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2]注册难民是整个远东难民问题的代表。虽然并没有一个固定机构为他们的福利、地位和未来提供全面管理工作，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衣物，并着手将那些希望返回欧洲的难民遣送回国。但是，不少人担心，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否会在很多被遣返者能回国之前就被解散。

中国成立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3]承担着为难民寻找更多住处以缓解难民营拥挤状况的责任，并利用其办事处为具有职业技能的难民寻找工作。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救援、福利和修复工作，并把用于现金救援、营地维护、房屋改良、医疗服务和成人再教育等方面的拨款从战时的每月10万美元提高到了战后的13万美元。

难民生活的政治真空

这幅救援画面看起来令人鼓舞——如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决定继续这些工作的话。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上海的难民，就像在欧洲难民营的难民一样，都生活在政治真空下：没人对他们的地位、居留和离开承担政治责任。从

1_这是战争刚结束时的情况。此后，随着纳粹大屠杀的暴行不断披露，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许多欧洲国家都开始接收犹太难民。以色列建国后，更是积极动员犹太人去以色列定居。

2_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UNRRA，中文简称“联总”）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其名称内之“联合国”并非指后来于旧金山组成的联合国组织，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成立目的是在战后统筹重建二战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其中，受害最严重的中国成为最主要被帮助国家。

3_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hinese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CNRRA，中文简称“行总”），是代表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的对应机构，负责接受和分配“联总”提供的救济物资。“行总”的总部初在重庆，后迁南京。在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设立15个分署。与此同时，在延安相应成立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董必武为会长。“解总”于1946年7月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1945年冬季开始，中国政府将他们作为临时居民来对待，但并没有与任何相关国际组织进行磋商，为他们制定出未来蓝图。国际救济难民机构为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无国籍者移民费用提供了一些补偿。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扮演着它在中国的法律代表的角色，并且设立了移民运作机构。但作为一个自愿救援机构，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无法界定难民的政治地位或处理再安置问题。让局面更加异常的是，作为从前的德国和奥地利公民，大部分欧洲难民都受到1945年11月27日颁布的一项法令的影响而被隔离直至被遣返为止。[1]只有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全面担保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注册难民才能免于这一法律条款。欧洲难民就在如此脆弱的保护下在上海生活着。

大多数难民最终要离开

观察家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两个无法回避但又相互矛盾的结论。第一个是：除了少数技工和专业人员以外，其他上海的欧洲难民都得离开中国，而且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他们必须开始很快地离开。紧张局势的暂时缓解，仅仅是因为当局再次向群众承诺，随着难民的不断离开，虹口区的住房和工作机会将增加。同样无法回避的第二个结论是：在那样的局势下，至少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尽管那时签证和运输都遇到了不易通过的瓶颈，但大约1 000人还是得在1946年底离开。这就使迫在眉睫的形势逐日清晰起来：只有当中国和某个政府机构之间达成关于确定欧洲难民的地位并为他们提供有序的再安置服务的协议后，上海才能在即将到来的1946年冬季避免紧急事态的发生。

1_这里指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1945年11月27日颁布的《处理德侨办法》，规定德籍、旧奥籍及德籍犹太人未犯有帮助日军罪行的，除经特别批准外，应予遣送回国。这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所以并无“德籍犹太人”。

在日本投降以后，上海相关机构对欧洲难民的处理方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刚刚解放后，特别是1945年冬季至1946年，人们通常认为，大多数难民会永久定居并融入上海经济社会。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下事实：在1943年2月他们被迫进入虹口“隔离区”之前，16 000名欧洲难民中的半数以上已经相当适应上海的经济生活，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找到了工作。人们认为，更多的难民将为预期的战后繁荣所消化。但这些预期与战后上海动荡不安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不相符合。而且，他们也没有考虑到中国政府在处理外国人利益时必须服从本国国民的利益和需求，这是世界上任何政府的既定政策。

由于这些压力，救援组织的代表推翻了他们先前的观点，并开始相信犹太难民在最短的时间内大规模迁出上海才能解决问题。1945年11月27日发布的法令将难民们与在华德国籍人士同等对待，使得他们面临隔离和遣返的命运，这个法令以及难民同当地居民的摩擦都加剧了他们迁出中国的紧迫性。尽管后来中国政府重新解释说将保护合法难民，中国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注册难民的担保也缓解了情势的紧急性，但这一法令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虹口难民心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都加快了欧洲难民的注册，来应对中国的遣返和再安置措施。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将他们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了移民上，并设计出了一个短期再安置计划。

然而，到了8月中旬，人们越来越清晰地发现，移民进程再怎么样都会很缓慢，移民和再安置工作不可能在两年内完成。与此同时，法令颁布后，难民的政治地位仍然未界

定，仍然像以前那样不稳固。当地局势的缓解仅仅是因为政府承诺欧洲人会很快离开虹口区以供中国人居住。实际上，这种矛盾只能在政治层面上解决，但目前没有机构自愿承担这一工作。

救援问题的出现

尽管中欧犹太难民早在1933年就来到了上海，但大批来华的犹太难民出现在战争初期。那时，上海是没有护照的犹太人心中的“麦加”。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占领上海时，难民总数已超过20 000名。其中，半数过得还不错，他们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找到了称心的工作，其他的拥入虹口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个地方性的欧洲犹太难民救援组织来生活。

当救援的担子变得更为艰巨时，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开始承担难民救助管理工作。救援计划的调整就在日本军队登陆上海的当天开始进行。到1943年2月，当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的驻沪代表被当作敌国国民时，一个用于提供集体食品的基金和财务运营委员会被设立了，并得以在战时运转。1943年前期，日本的相对容忍态度发生了变化。2月6日，一篇恶毒的反犹太主义文章发表在《上海时报》上。几天后，报纸刊载了日本的公告，宣布从1937年开始到达上海的所有的“无国籍人士”都得迁入虹口区，只有得到日本官方的特别批准后才能离开。这种隔离措施被严格地执行，大约8 000名[1]被希特勒法案剥夺国籍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被迫“处理”了他们的企业并迁入已经过分拥挤的虹口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投降后发现上海的难民问题

1_实际进入虹口的德奥犹太难民的数字远远高于8 000人。

成为主要问题之一。与1941年只有约7 000名欧洲难民相比，1945年的数字上升到了约15 000名[1]。1945年11月，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的一项估计显示，前德国国籍的有8 807人，前奥地利国籍的有3 700人，前波兰国籍的有1 156人，其他的大多数都是持有南森护照[2]的无国籍者。按宗教分类，有13 927名犹太人，603名新教徒和420名天主教徒。大约4 000人居住在8个拥挤的营地里，剩下的11 000人住在同样拥挤的虹口区营地里，绝大多数人都一贫如洗。

曼努埃尔·西格尔(Manuel Siegel，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驻沪代表)对抗战胜利后几个星期的局势做了估计，他认为，中国当局必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除了加快救援，帮助那些流亡者和被剥夺财产的人重新开始生活直至一大部分人能最终安置下来，重点在于将重新居住作为鼓舞难民的士气，为他们到新定居国生活作好准备。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暂时融入上海生活。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希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能够马上接手食物和房屋供应工作，而事实上，救援资金却从11月的11 175元减少到了12月的9 711元，大约2 000个工作岗位主要是为美国军队服务的勤杂、文秘工作。同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援物质开始向欧洲难民分发。

通货膨胀、住房短缺

人们很快发现，这个问题显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工作机会是临时性的。日本投降后3个月，大家普遍看出，难民在上海的再安置并不像9月时以为的那样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上海的经济状况仍陷入停滞，政局不稳定，通货膨胀加快，中国人的生活成本在一周内上升了100%，外国人

1_这里指的是在虹口的犹太难民，没有包括在虹口以外的犹太难民。

2_“南森护照”是由国际联盟推出的一种被国际承认的身份证，当时是面向没有国籍的难民而设置的。在1922年由挪威人弗里德托夫·南森首创，因此被称为“南森护照”。直到1942年，有52个国家承认该护照，总共发出了大约45万本，帮助了数十万无国籍人士移民到了其他国家。

的生活成本则上升了150%。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难民回到上海和许多想进入内地的中转客在上海滞留，上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住房短缺。美国的不断撤军，则减少了难民唯一而重要的工作机会来源。

难民面对如此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中国政府却又投下了一枚法律炸弹——动摇了欧洲难民在上海曾经享受过的政治地位。1945年11月27日颁布的法令将难民与前敌国德国国民归为同一类对待：德国人、前奥地利人及德国犹太人需被遣返，在这个恢复自由的中国，不管内务和外交事务部是否允许他们在中国继续停留；不过，他们在遣返前，可以递交一份由中国人或外国人提供的实体担保，并向省市政府提出继续停留上海的申请；那些无法提供担保的难民将在有关省市政府的管理下隔离，私人或公共机构可以向内务和外交事务部申请雇佣德国人、前奥地利人或德国犹太人（在他们是诚实可信的技术人员的前提下），这将使他们免于被遣返。

这个条例在虹口居民中引起了震动。根据3月份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注册数据，15 511名欧洲难民中，有7 380名是德国国籍，还有4 298名为奥地利国籍。不过，他们早已被纳粹当局剥夺了德国国籍。

政府政策的实行

国际救济难民机构的助理执行官贝克曼（Moses W. Beckelman）曾来上海为欧洲难民争取政治地位和未来生活。他赶到重庆，并收到了外交部的保证：把那些为限制德国人而设计出的条款强加于那些曾遭受过纳粹迫害的善良难民身上并非中国政府的意图。然而同时，中国官方清楚

地指出，政府保留拒绝难民永久居留的权利，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希望大部分难民能尽早离开中国。在向媒体提供的通稿中，贝克曼先生强调，中国官方政策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希望未取得在中国居留许可的难民一有机会就离开中国，或是遣返至其原住国，或是移民至其他国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协助遣返工作，政府间委员会也会尽力为不愿意被遣返回原居住国的难民寻找其他接受移民的国家。

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担保

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总执行官T. F. Tsiang博士声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将为注册难民提供全面担保以使得他们免于法令下的立刻隔离威胁，他清楚地指出，尽管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乐意提供担保，中国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担保，但我们无法保证这些德国人、前奥地利人及德国犹太人的永久居留权，关于他们遣返的问题迟早必须由合适的机构处理。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担保的发出和接受，并未使该法令被撤销，而只是被重新解释。中国政策只考虑少数难民的永久居留权——主要是那些拥有技能，从而对国家重建格外有用的人。显然，这种变化的目的与其说是针对欧洲难民，还不如说是为了将对难民未来安排的责任加至各国政府的身上。中国采取的是将难民问题转移给美国处理的方法，这在3月份变得更加明显。上海政府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公告：根据11月的法令，留在上海的许可申请必须在4月15日之前递交。3月26日，贝克曼先生会见了外交部驻上海机构负责人，后者再次确保，那些声明过将离开中国的难民（大多数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注册时声明过）都将受到保护。根据公告的条款，只有那些表示希望留下的人才须进行许可申请。他重申，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最终是政府间委员会，将对那些将移居他国的难民负责。

移 民 潮

这样，磋商、协调和谈判持续了整个夏天。各类机构的工作人员想尽办法帮助难民，但是没有明显的进展。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虽然负责遣返任务，但遣返3 000名打算返回欧洲的人困难重重，难以克服。尽管遣返在夏天已经开始，但是核心难题依然存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并没有开放它在上海的组织，却把许多事丢给了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到8月份，已有13 500人在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登记，希望移居其他国家。在这些人中，38%的人把美国当作他们再住地的第一选择，同时，大概20%的人选择了澳大利亚。但是结果令人沮丧，美国的移民当局几乎不能满足这些申请。[1]几百名持有澳大利亚批准文件的人坐在他们的行李上等了好几个月。截至7月中旬，不超过300人能够离开上海，截至8月中旬，原来15 000人中的仅有5%能从虹口离去。年底前，另有800名难民乘船离开了上海，200名去了澳大利亚，还有600名去了美国。

延长居住的计划

截至1946年夏末，很明显中国政府拒绝就原来宣布的难民政策作出让步，而重新安置欧洲犹太难民将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2]于是，不得不制定一个临时的过渡计划：增加帐篷和医院，既是为回到虹口的中国人服务，也为了延长

1_后来，美国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之下改变了政策，开始接收大量犹太难民。

2_1946年下半年，中国的内战已经开始，专注于打内战的南京政府已无暇顾及许多繁琐的涉外问题。作者在本报告中始终没有提到这一点，也许是他不了解中国政治，也许是他故意避开了这个问题。

犹太难民离开前的逗留时间。计划重点是通过各种途径为儿童教育和成年人的康复提供帮助。这些措施仍难以平息舆论界在难民问题上的不满，反对外国人的偏见也没有完全消失，但是程度并不严重，而且逐步在减轻。实际上，在虹口之外，关于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居住问题上的摩擦早已无人关注，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归根结底，这个难题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随着护照、签证的加快发放，美国也开始采取合作态度，英国则为有亲戚在英国的500位上海难民提供帮助。很显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退出时，必须由一个跨政府、负责任的组织承担起责任来。在上海的难民需要安全保护。上海的情形也为国际难民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新范例和新思路。

(摘译自N.A.帕尔阔维茨关于战后初期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的报告，编者对少数有误处作了修改，并加了若干注解。感谢马文·托克耶拉比向本书主编提供了该报告及他对报告作者本人的采访记录。)

以色列驻上海“名誉领事”的亲历记忆

伊萨多尔·马吉德[1]

一、哈尔滨和曲阜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市。1932年在哈尔滨入学注册后，我曾到山东省的曲阜生活了4年。在那里，我和数千名中国学生就读于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团创办的易文经济学院 (Yi-wen Economic College)。1940年我离开哈尔滨来到位于中国东部的上海。

自从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爆发后[2]，我就相信日本和德国之间已缔结了要进攻苏联的密约。由于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边界是进攻苏联的最佳地区，所以那时到处谣传进攻苏联的有关计划已经完成。我估计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将驱使这里没有国籍的俄裔移民去守卫中东铁路 (这是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延续)，以防中国游击队的攻击。这项措施可以腾出数万名日本士兵，以便为进攻苏联作准备。

当时那些无国籍的俄裔居民被称为“白俄”[3]，他们中弥漫着一种巨大的恐惧感。这些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无国籍俄裔居民，必须随身带着由当地警察局签发的身份证件以及由俄裔移民管理局签发的证件。俄裔移民管理局是一个由

1_伊萨多尔·马吉德 (Isador A. Magid) 曾是上海犹太社团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过以色列驻上海的“名誉领事”。他后来移居澳大利亚，成为十分成功的企业家。他关于战后时期直至新中国建国初期上海犹太人情况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_作者将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是国际二战史研究界的一种观点，也为许多中国学者所赞同。

3_“白俄”原指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而逃来中国的俄国人，相对革命的“红色”而言，后来泛指所有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来华的俄裔人士，实际上并不准确。

日本关东军第三处设立的机构，由一个名叫彼得·科尔尼洛夫的白俄上校领导。他和我父亲相识多年，对我们很不错。1940年6月，科尔尼洛夫上校毫不含糊地劝我带着我的家人及父亲马上离开中国东北。

二、上 海

如果不是科尔尼洛夫上校的帮助，我们将永远不可能离开满洲。我们从哈尔滨到达中国东北南部的港口城市大连，然后坐船到了青岛。我母亲、姐姐及其家人都住在那里，而我妻子的父母则仍留在了中国东北。

当我们1940年到达上海时，我们发现这里的犹太人总数大约在35 000至3 6000人之间。他们中大约有1 000名主要来自伊拉克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几乎一个世纪前就开始生活在这里；大约有5 000名以俄裔为主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还有大约3万名于1933年至1941年间来到这里的德国、奥地利、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难民。[2]上海当时接受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接受的犹太难民的总和还要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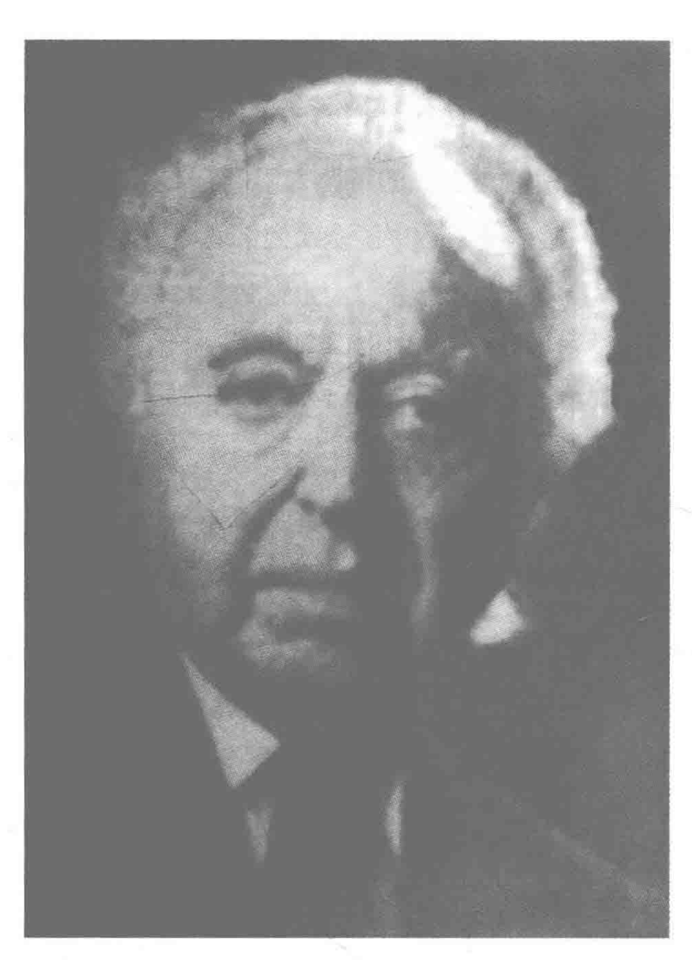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几个月，在上海的日本当局就宣布将虹口作为"无国籍难民的指定地区"[3]。他们命令所有1937年后从欧洲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在一个月内搬进这个区域。大部分塞法尔迪犹太人都是英国公民，已经被囚禁在集中营里。其他犹太人（包括我们全家）虽然没有被关押，但却随时处于日本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4]这里的人们普遍有一种恐惧感，就是害怕日本人受德国人的影响也对犹太人进行迫害，但还好我们所作的最坏打算并没有降临。尽管犹太难民们经受了种种困难和限制，但是总的来说，上

1_其中也包括来自波兰、立陶宛等国的犹太人。

2_这个数字包括了逃离欧洲途径上海又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与外部的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此后直至战争结束，在上海长期居留的犹太难民在2.5万人左右。

3_此处有误。上海的日本当局宣布将虹口作为"无国籍难民指定居住区"是在1943年2月，也即珍珠港事件后14个月。

4_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互相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这样一种态势对处于日本统治下的俄国犹太人是十分有利的：部分俄犹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领取了苏联护照，因而享有中立国侨民身份；那些正在申请苏联护照的人，也置于苏联的保护之下；到后来，所有具有俄罗斯背景的犹太人无形中都有了"中立国人员"的保护伞。



伊萨多尔·马吉德

海仍不失为一个相当安全的避难所。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东北。苏军在哈尔滨市宣布所有的犹太文化、犹太民族和锡安主义活动都是非法的。[1]哈尔滨市犹太社团领导人，同时还兼任中国犹太社区联合会主席的亚伯拉罕・考夫曼被逮捕，并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押解到苏联。

而与此同时，上海却在以极大的热情欢迎美国军队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到来。各种犹太人的、犹太文化的、锡安主义的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自1941年12月起就几乎完全断绝的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此时也恢复了。

各个犹太团体出版发行了一些报刊和杂志，有英文的、俄文的和德文的。除此以外，锡安主义主流派组织也重开了它的俱乐部“卡迪玛”。锡安主义修正派组织“贝塔”以及许多犹太文化组织也恢复它们的俱乐部。几乎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都是在法租界的毕勋路（今汾阳路）上的犹太俱乐部，它有一座能容纳400人的会议大厅，一个餐厅和许多小会议室，还有一些良好的体育设施。俱乐部的组织者和成员多数都是俄籍犹太人。

美国军队的到来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活力，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1948年5月，上海犹太人得知了以色列国成立的消息。在此之前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莫迪凯・奥尔默特[2] (Mordechai Olmert) 来到上海，他出生在哈尔滨，许多年前就已移居以色列，是为以色列的独立而奋斗的一位卓越人物。他给上海犹太人带来了热情和力量。

三、担任名誉领事

1948年12月，我们迎来了以色列外交部派来的第一位

1_此处有误。苏联当局是将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视为非法，并没有禁止一切犹太文化活动。

2_莫迪凯・奥尔默特出生于哈尔滨，早年移居巴勒斯坦，成为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是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的父亲。

代表摩西·犹瓦尔 (Moshe Yuval) 领事，他的主要任务是给所有想要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办理签证。

尽管事实上中华民国和以色列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包括警察局在内的上海地方政府都没有干预以色列领事的活动。与此同时，以色列的犹太人代办处[1]也在上海开始了由沃尔特·西特林 (Walter-Citrin) 领导的移民活动，帮助在华犹太人预订赴以色列的船票和机票。这个机构租用了诸如“伍斯特胜利号”和“安娜萨伦号”这样的轮船以及飞机将犹太人从上海运送到以色列。在1949年初摩西·犹瓦尔离职后，以色列政府任命我为驻上海的名誉领事。我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51年离开中国为止。据估计，我们几位领事共签发了7 000多份以色列护照和赴以色列签证，实际到达以色列的上海犹太人约有4 000 ～ 5 000人，其中大多数是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太人极少。

当然，还有不少上海的犹太人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国家，也有一些犹太难民回到了欧洲，但人数不多。有关战后欧洲犹太难民离开上海的具体统计数字难以找到，但对我手头掌握的各类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可得出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犹太人离开上海的大致情况。如下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1946年离沪的犹太人约为3 000 ～ 4 000人，1947年约为8 000 ～ 9 000人，1948年在5 000人左右，1949年约为5 000 ～ 6 000人，1950年2 000人左右，1951年也在2 000人上下。也就是说，从1946年到1951年，离沪犹太人总数约为25 000 ～ 28 000人，其中多数是欧洲犹太难民和俄国犹太人。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上海，此时美军已经完成了它的撤离。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

1_以色列的犹太人代表处：努力促进犹太人向巴勒斯坦（1948年后为以色列）移民的国际组织，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已建立，以色列建国后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开始从事帮助新移民融入国家主流生活的工作。

和国成立。从那时起，上海的行政管理事务便由北京政府控制。1950年1月，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以色列总理大卫·本一古里安便宣布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以色列此时却没有得到中方相应的承认。[1]在我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以色列是一个依赖美国并深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到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以色列的态度更加不友好。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一个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名誉领事，我活动的合法性就成了一个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宣布对所有在俄罗斯出生或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实行大赦，并鼓励他们申请加入苏联国籍。成千上万的俄裔犹太人不愿意再处于这种没有国籍的地位，认为加入苏联国籍可能会安全一些。我和我的家人也参加了这次申请。不久后，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公民担任以色列的名誉领事感到不满。我争辩道，苏联是最早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之一，而且它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认为他们对我担任这个职务的偏见是没有道理的。

我和上海地方当局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受到中国或苏联对以色列官方态度的影响。我和地方政府官员讨论时指出，新中国确实没有正式承认以色列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报纸曾经热烈欢呼和支持以色列国的成立。[2]我还指出，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期间，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在哈尔滨都保留着领事馆，尽管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承认日本操纵下的“满洲国”傀儡政府，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领事馆都继续行使其职能而没有受到干涉。这些领事馆继续办理到他们国家的签证，这些签证也为当地政府

1_20世纪50年代初，中以两国曾在苏联、缅甸等处举行建交谈判，几乎达成协议，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交等事态发展，谈判均没能成功或半途夭折。直至1992年1月，中以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_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后，中国解放区的报纸如《冀中导报》等均曾热烈欢呼和支持以色列国的成立。

所承认。不管怎么说，尽管压力不断增加，但是我依然继续我的工作，没有受到严重的干扰。

除了继续给那些打算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办理签证并帮助他们离开外，我做的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将上海犹太社团的财产转交给以色列政府进行谈判。1949年2月1日，上海犹太社团的主要共有财产——犹太俱乐部，由它的管理委员会赠送给了以色列政府。1949年5月4日，上海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联合会以赠与的方式，将摩西犹太会堂以捐赠和财产让渡的方式移交给了以色列政府，其他一些犹太人财产也通过这些途径移交给了以色列政府。捐赠文书由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联合会主席、秘书、会计，犹太会堂主持人，以及以色列政府授权的代表（即我本人）在上面盖章并签字。这份文件的签字、盖章和递送都是在上海律师Y.C.洛赫的监督下进行的。

在我1951年离开上海后，我的职务由阿比什博士(Dr. Abish) 接替。不久后，这项工作也就终止了。最后只有几十位犹太老人留在了上海，他们主要生活在犹太救济院里。[1]

四、对中国人民心存感激

我在哈尔滨、青岛、曲阜、上海生活过，在这些地方从事商业活动。我从来没有遭遇到任何中国团体或个人的反犹主义。我有很多真正的、值得信赖的中国朋友，我们同样都重视家庭、教育，对各种宗教信仰都持宽容的态度。在商业领域，我发现中国人有最高的道德水准，远远高出公认的欧洲人的标准。

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不了解反犹主义是不公正的。反犹

1_此处有误。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还有数千犹太居民，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也还有数百犹太人。他们还成立了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 (Council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Shanghai，简称“犹联”)，处理犹太社团的各项事务，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停止活动。

主义在俄罗斯人圈子中非常盛行，特别是在哈尔滨市，那里的法西斯组织和反犹主义组织非常活跃。当地有一个由德国人创立并资助的“俄罗斯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其领导人是康斯坦丁·罗索夫斯基，它还发行一份反犹主义报纸。这些人对哈尔滨和上海日本当局的一些人也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普通的日本商人都是反犹主义者，那也是不公正的。

我坚信，100年来受到中国人民礼遇的犹太人，应该为他们受到的友好对待和与中国人民建立的关系而心存感激。

（摘编自本书主编对伊萨多尔·马吉德的采访记录和高斯坦主编：《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编者对少数有误处作了修改，调整了小标题，并加了若干注解。）

后 记

2016年的七八月，上海特别热。我和几位副主编几乎没有休息，全力以赴战高温，终于在9月初完成了《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二卷：亲历记忆》全部统稿工作。三位副主编虞卫东、周国建和周晓霞也辛勤工作，为本书最终完稿付出了大量精力。在资料汇编第二卷完成后，第三、第四卷的统稿工作也将很快完成，陆续与读者见面。

需要说明的是：① 本书收集的中文记忆资料中有些原来用的是繁体字，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都把它们转为简体字；② 本书中的英译中名词往往在不同的记忆资料中有不同的译法，还有一些在旧时的译法与现在的译法并不一样，为了保持记忆资料的原汁原味，我们没有加以改动或强求统一；③ 本书中不同的记忆资料里可能提到同一件事和同一个人，出现重复的现象，也是为了保持资料的原汁原味，我们没有将重复内容加以删除。

历史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是为学术精品打基础的，但也是最为艰苦的工作。要将浩如烟海的文件、档案、报刊、口述记录等资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没有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坚持不懈的态度是难以取得成果的。所以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副主编外，我还要感谢为本书资料收集和整理提供了各种支持的王健、汪舒明、张忆南、沈国华、

黄崇峻、罗爱玲、戴轶尘、张健荣、陈俭、史蒂夫·霍赫斯塔德、索尼娅·密欧伯格、廖光军、陈心仪、刘夏妮、郑文韬、袁帆、赵倩倩、赵静、张健、郭晴霞等其他课题组成员、合作伙伴及各方朋友。

我特别要感谢上海交大出版社时任谈毅董事长、刘佩英社长、钱方针主任和本书的责任编辑冯媛，没有他/她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愿我们这本资料集能为促进对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

潘 光

2016 年 9 月 4 日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2卷

亲历记忆





扫描二维码
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官方微信



ISBN 978-7-313-16557-2

定价：68.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2卷　亲历记忆　第5版
作者=潘光主编
页数=179
SS号=14282695
出版日期=2017.08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号=978-7-313-16557-2
中图法分类号=K18
原书定价=68.00
主题词=犹太人-难民-史料-中国-现代
参考文献格式=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2卷　亲历记忆　第5版[M].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08.